118



ZHONGGUO YUWEN

6

1960

1960年6月号(总第96期)目录

中國語文

編輯者: 中国語文編輯委員会 北京西城端王府夹道7号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45号
印刷者: 北京京华印书局 北京虎坊桥
总发行处: 北京市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
代訂另售处: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月刊

1960年6月22日出版 每册定价人民币 0.24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1—25,260 代号 2-44

中共中央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

山西省万荣县注音識字的經驗(見附件)是我国文化革命中一項很重要的創造，应当在全国迅速推广。山西省万荣县在两个月內消灭青壮年文盲的經驗，解决了扫盲运动中的两个大問題，一个是消灭了扫过盲又大量回生的現象，一个是保証了认識一千多字的农民可以无师自通地大量閱讀注音书报，在自习中不断增加識字的数量。这就大大便利和加快了业余教育的工作，并且使农村讀书成風，真正表現出了农村文化高潮到来的气象。提前扫除青壮年文盲是提前实現农业綱要四十条的重要关鍵之一，因此，推广万荣县的多快好省的扫盲經驗是一項重要任务。現在山西省委已决定在全省普遍推广这一經驗，并且力爭大大提前实現无盲省。全国絕大多数省区（即是說，除若干少数民族地区和某些方言地区以外）也都可以而且应当普遍推广这一經驗。只要各省市区党委下定决心，抓紧时机，在今年秋前試点和訓练师資，准备教材和注音讀物，在秋后就可以大規模地推广，就有可能用跟山西相同或相近的速度扫除文盲。与此同时，应当在学生、教师和青年工人、农民、店員、職員、部队官兵中大力推广普通話，造成風气。此外，为了加速扫盲和減輕儿童学习負担，現有的汉字还必須再簡化一批，尽可能使每一字不到十笔或不超过十笔，尽可能有簡单明了的規律，使难写难认难記、容易写錯认錯記錯的字逐漸淘汰。这一任务必須依靠广大群众，广大群众对此是十分热心和有办法的。請各省市区党委指示当地有关部門在最近期間提出一批新簡化字的建議，报告中央文字改革委員会綜合整理后送中央和国务院审定。

中共中央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注音識字是加速工农群众知識化的捷徑

山西省委关于在全省推广万荣县注音識字經驗爭取提前成为無盲省向中央的报告

中央:

現将万荣县开展注音識字运动的情况和經驗报告如下:

万荣县在过去十年来，对于扫除文盲的工作是一貫重視的。从1958年以来，由于生产的大发展，人們思想的大解放，群众学习文化的勁头越来越高漲。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議論:“水利化、机械化，沒有文化不能化。”但是群众想文化又怕文化。这就是扫盲毕业之后，回生复盲的現象非常严重。到1958年10月止，全县共扫除青壮年文盲三万四千多人，而回生复盲的便有一万二千多人。这些人自称他們是“毕业了的文盲”。即使已經脫盲的人，也因識字有限，閱讀和写作都有困难，不易巩固和扩大扫盲成果。万荣县委針对这种情况，在1958年10月間便研究如何使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工作也来个大跃进，以适应生产大跃进形势的需要。于是决定在全县推行汉語拼音方案，采用注音識字的办法，高速度地开展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运动。經过几个月的重点試驗，其效果本来是很好的。但由于当时党內对注音扫盲这个办法在思想認識上不够一致，因而当1959年推广这一經驗时，在相当長的时間內，表現了时起时落、勁头不足的現象。到了1959年10月，县委进一步总結了注音扫盲的經驗，批判了錯誤的思想，并且在作了充分的准备之后，一鼓作气，便在全县范圍內掀起了万民教、全民学的注音扫盲高潮，全县二十一万人中就有十四万人卷入学习汉語拼音的运动中来，并且取得了預想不到的成效。仅仅在两个月的时間內，即到1959年12月底，全县一万三千二百四十六个青壮年文盲(包括复盲和剩余文盲)，全部脫离文盲状态，提前实現了青壮年无盲县。二万四千个老年文盲也自动参加了扫盲学习。其中有二百四十人已經脫盲，九千三百多人掌握了汉語拼音方案。并且有十万七千人可以說普通話了。

农民跳过了扫盲識字的門檻，便大踏步地向文化革命进軍。业余教育运动，就象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到現在为止，全县青壮年参加业余高小班的达到五万二千多人，参加业余初中班的达到九千六百多人。两項人数合計，达到青壮年总数的86.5%，占应参加人数的94%。轉眼之間，群众性的看書、买書、借書、写作形成了社会風气。1959年12月一个月，全县仅注音讀物一項，即銷售了十八万册，預訂了二十四万册，但仍不能滿足群众的需要。在万荣农村里，居然出現了鬧書荒这样的新鮮事。王显人民公社青谷管理区图書室原有七百余册書，过去出借的不到一半，現在有七千余册書全被借光了。过去借書是一人一本，現在一借就是几本、甚至十几本。过去借書是單人借，現在是一戶一戶的借。过去人們借書，爱借連环画、小人書，現在人民却爭先恐后地搶着借《毛澤东选集》、《論共产党員的修养》、《林海雪原》等大本本書了。在这里，迅速地涌現出了許多农民詩人、农民作家。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随心所至，出口成章。不到一年时間，全县創作了一百九十多万首詩。四十七岁的李太柏，写出了两万多字的《我的生活片断》。十八岁的青年妇女王民英，写成两万多字的《青谷村变迁史》。三个孩子的媽媽董玉香，决心要苦炼十年，爭取变成大学生。眞是才华茂密，花果滿枝，雄才大略，壮志凌云。不仅如此，現在全县已經有八千七百五十五个脫盲农民，組成三百二十二个学习毛澤东著作的小組。荣河人民公社刘村管理区，去年只有十二人学习理論，現在扩大到八百人。他們学过《毛澤东选集》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以后，大家的思想頓时开朗，懂得了如何对待新鮮事物，参加公共食堂的人数突然扩大到95%以上。毛澤东思想正在迅速地武装着农民的思想，从而越来越大地轉变为推动整个工作前进的物質力量。

万荣县的經驗証明，注音識字的办法，是多快好省地扫除文盲、巩固和扩大扫盲成果的好办法，是加速工农群众知識化的捷径。利用拼音字母扫盲，青年人一般用十五到二十小时、壮年人用二十五到三十小时的拼音教学，就可以学会汉語拼音方案；再經过大約一百二十个到一百五十个小时的閱讀和写作的教学，就可以識汉字一千五百个，达到扫盲的标准。而且在掌握了汉語拼音这个工具达到扫盲标准之后，就可以不受識字数目的限制，大量閱讀注音讀物，練习写作，就可以无师自学，举一反三，互教互学，从而使群众性的学习运动更加容易广泛地、持久地开展起来。今年1月，該县王显公社青谷管理区把1958年下半年用注音識字办法毕业的一百零一个学員进行了一次測驗，巩固住一千五百字又增識五百字左右的有四十二人，占41.6%，保持住一千五百字的五十一人，占50.5%，認得一千字左右的只有八人，占7.9%。这少数巩固較差的学員，主要是因为学习不經常、閱讀通俗讀物少的緣故。当时对沒有用注音扫盲办法毕业的学員，也作了一次測驗，回生現象竟达到64%以上。在扫盲过程中，万荣县說普通話也形成了社会風气。所以群众总結注音識字的好处是："拼音字母是鑰匙，它給汉字当老师，鑰匙好比开心鏡，所有文盲都扫尽。""注音識字好办法，一树开下两朵花，一朵摘掉文盲帽，一朵学会普通話。"

万荣县的經驗还証明，推行注音識字的办法，对于改革工农业余教育和全日制小学教育的学制，縮短教学年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去年11月他們在一些业余教育和全日制小学教育中改用了注有拼音字母的課本，在教学方法上把課本由淺入深地划成几个單元，每个單元选擇重点課进行精講，同时加强閱讀和写作指导，这样就大大縮短了語文教学的时間。过去一般用三年时間才可以学完的語文課，現在用不到一年的时間就可以学完了。語文課的时間縮短了，就能够加多政治、数学和科学技术等課程。現在該县已經在业余高小的一年制，在五个秋季始业班和三十个春季始业班的完全小学中实驗小学四年制。此外，該县在幼儿园大班中加授拼音字母和注音識字的試驗，其效果也是良好的。

万荣县采用注音識字办法，进行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工作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績，它和其他事情一样，是經过思想斗爭的。开始，有些人对拼音扫盲办法，怀疑挺多，沒有信心；对大搞群众运动的方針，也提出一堆困难，認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是，万荣县委坚决地排除了各种悲覌論調，坚决地实行政治挂帅、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的方針。各級党委由第一書記挂帅，党政軍民一齐动手，层层成立專管机构，一竿到底地組織領导注音扫盲运动。县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員会，各人民公社設文字改革委員会分会，管理区設指导小組；并且在全县范圍內組織了一支二百三十多人的專职干部队伍，运用"小田試驗，大田推广"，現場观摩，交流經驗的办法，由点到面地全面鋪开。但是，要开展这样一个大規模的群众运动，首先碰到了一个师資缺乏的問題。的确，当时万荣县只有两个拼音教师，师資力量实在太小了。这也是一切悲覌論調的一个根据。可是，这个难題，并沒有把有雄心大志的人們吓倒。他們运用了大搞群众运动，大走群众路綫的方針，采取了滾雪球的办法。县、社分工負責，层层培訓骨干，社社成立傳授站，区区成立教研組，小学教师包教群众，

教师、学生包教扫盲学員，积极分子当“小先生”，專职教师和业余教师紧密結合，边教边学，边学边教，人人是先生，人人是学生。就是这样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越滾越多，越滾越大，几个月的时間，全县便培訓了两千名教师，三千五百名輔导員。从此，一个声势浩大的“民教民”的扫盲学习运动在全县范圍內掀动起来了。“亲教亲，邻教邻，子女教父母亲，爷爷不懂問孙孙”的事例到处皆是。周王村薛振平和屈伶仙是夫妇俩，他(她)們在学习中互相帮助，互相比賽，在二十天的时間內，两个人同时摘掉了文盲帽子，变成了有文化的人。南牛池村青年妇女賈蕙苗，自己摘掉了文盲帽子，还教会四岁的女儿賈秋联四十多个拼音字母。在全省推行注音扫盲現場会議上，母女俩进行了拼音識字表演，博得观众个个贊口不絕。师資問題解决了，解决教材問題也是一件重要事。除了上級发給一部分注音讀物外，他們主要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自編了两万余冊注音教材，并发动群众自編补充教材，还創办了每期发行九千分的《万荣拼音小报》。另外，他們在农具上、标語上、牆头詩歌、机关、学校門口挂的牌子上，都加了拼音字母，形成一个遍地是教材，“注音文字包圍文盲”的識字环境。

大搞群众性的扫盲学习运动，会不会妨碍生产？就悲观泄气話的人也作了否定的答复。万荣县委采用学习和生产統一安排、統一部署、紧密結合的办法，除把扫盲学員按程度不同划分开班級，定时上課以外，又按生产中的專业队和作业組，分别編成地头学习組、炕头包教組、飼养員学习組、水利工地学习組，提倡下地生产要带一包(流动图書包)、四宝(書、水笔、抄写本、报紙)，做到書不离身，抽空就学。而且学习的方式，随着农事季节的轉换，生产活动形式的改变而改变，多样灵活。就是这样，扫盲学习不仅沒有妨碍了生产，而且人民群众学习文化的成果，立竿見影地推动了生产的大发展。事实証明，許多学习积极分子同时就是“紅勤巧俭”运动中的模范。农民当了文化的主人，表現得更聪明、更能干了。青谷村二十五岁的青年程寬牛，在过去性格迟鈍，思想落后，别人称他是“悶块”。但是当他脫掉文盲帽子以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人們都說：“悶块开窍啦。”现在的程寬牛已經識到三千多字，讀了二百多本書，还写了三万字的“自傳”。眼下他正在讀《矛盾論》和《我的一家》。他讀了《刘介梅忘本》一書以后，感到自己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心里十分惭愧，大大启发了他的政治覚悟。他学了《黑妮种棉》和一套科学技术小册子以后，自己种了一块棉花試驗田，結果創造出高于当地产量两倍的高产紀录。由于他的思想和生产双跃进，程寬牛被选为生产队長和队的紅專学校校長，并且加入了共产党。悶块开了窍的人，何止是程寬牛。脫了文盲帽子的农民，在向文化革命的进軍中，同时又向技术革命进軍，要为彻底改变落后的生产面貌而斗爭。現在結合生产組織和生产基地，全县建立了各式各样的科学技术学习組織。参加这种学习組織的，全县已有六万三千多人，其中研究棉花栽培技术的有二万六千七百人，研究土壤的有一万四千二百人，研究畜牧兽医的有二千一百多人，研究农业机械的有二千八百多人。全县七个公社設立了七个科学研究重点，共挑选出一千六百三十人，組成專业生产队(也是学习优秀班)，集中劳动，集中学习，培养科学技术的骨干。現在各公社和管理区的脫盲青壮年，在技术革命运动中已經发揮了很大的作用。如孙吉管理区土化肥厂的工人，讀了汉語注音的科学技术書籍之后，已經仿制成功了氮、磷、鉀混合肥料及其他土化肥十多种。孙吉公社綜合加工厂工人王三娃，經过十三天的苦心鑽研，仿制成功一种净麦机，一天能净麦一万多斤，比人工净麦提高工效二十五倍。从許許多多的事实中完全可以看出，万荣县文化革命的高潮，已經在促进技术革命高潮的出現。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相輔而行，双双跃进，必将把持續的、高速度的生产大跃进推向更新的阶段。

为了推广万荣县的經驗，我們于去年12月在万荣县召开了有各專、市、县的教育行政干部、共青团干部和中、小学校長教师等共六百人参加的現場会議，中央文字改革委員会、全国妇联的負責同志和黑龙江、福建、四川、甘肃、內蒙古等十四个省(区)的代表八十余人也应邀参加。这次会議，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的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目前这一工作的进展情况是良好的。据不完全的統計，全省已經訓練出拼音教师六万七千六百多人，参加汉語拼音学习的已有三百二十八万多人，其中有二分之一的人已达到会認、会拼、会写的标准。晋南專区农民参加拼音学习的已达一百一十四万人，超过全区青壮年一百一十三万人的总数。自願参加业余学习的老年人已有八万余人，比未推行汉語拼音之前，增加了四倍。現在，我們已經作出全面规划，力争大大提前实現无盲省。同时，組織了若干学制改革試点，进一步为教学革命創造經驗。并着手准备大量編印政治、技术、文艺等注音通俗讀物，以便及时供应正在迅速展开的全民性的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运动的需要。

以上报告妥否，請指示。

中共山西省委　1960年4月5日

(轉載自《人民日报》1960年5月11日)

社　論

貫徹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推广注音識字的指示

中共中央关于推广注音識字的指示提出了三項任务：第一，在全国迅速推广山西省万荣县注音識字的經驗；第二，在学生、教师和青年工人、农民、店員、職員、部队官兵中大力推广普通話，造成風气；第三，再簡化一批汉字，使每一字尽可能不到十笔或不超过十笔，尽可能有簡单明了的規律，使难写难认难記、容易写錯认錯記錯的字逐漸淘汰。这三項任务都是跟語言科学工作者的业务有直接联系的；因此，語言科学工作者有特別重大的責任来貫徹执行中央的指示。

用汉語拼音方案給汉字注音来帮助識字，这是国务院关于公布汉語拼音方案的决議所規定的。国务院的决議写道："应用汉語拼音方案为汉字注音来帮助識字和統一讀音，对于改进学校語文教学、推广普通話、扫除文盲，都将起推进作用。"从1958年春天开始，山东、河北、河南、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先后进行了注音識字試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山西省万荣县吸收了早期試点的經驗，特别是山东省平原县董王庄公社的好經驗，加以发揚，用全党全民的力量来推广这些經驗，成为全国注音識字的一面紅旗。这一面注音識字的紅旗不独推动了山西全省注音識字工作，还在山东、河北、北京、吉林、辽宁、安徽、湖北、四川、福建等省市掀起了一个学万荣、赶万荣、超万荣的注音識字运动。这个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这是文化革命的一件大喜事。

正如中央的指示所指出："山西省万荣县在两个月內消灭青壮年文盲的經驗，解决了扫盲运动中的两个大問題：一个是消灭了扫过盲又大量回生的現象；一个是保証了认識一千多字的农民可以无师自通地大量閱讀注音书报，在自习中不断增加識字的数量。这就大大便利和加快了业余教育的工作，并且使农村讀书成風，眞正表現出了农村文化高潮到来的气象。"注音識字能够有这样大的效用是因为它比过去的扫盲办法有无可倫比的优越性。第一，注音使汉字跟口語的詞联系，解决字音、字义問題，从而加快扫盲速度，把过去一般需要三百小时以上的扫盲时間縮短为几十小时（最近青島市蔬菜公司有四十八小时扫除文盲的經驗）到一百几十小时。第二，注音使复习容易，能够巩固已学过的汉字，并通过注音讀物增加識字的数量。第三，注音使識字不多的人們能够自己閱讀，把上下詞句联系起来，无师自通。这样，成人可以利用一切空隙，在田間、場地、家庭里分散自学，同时也便于个别包教包学。第四，拼音能够帮助識字不多的人們写作，提高写作能力。学会拼音以后，他們在写作的时候，遇到忘了或者未学过的字，可以先用拼音代替，然后查課文，查字典，或者請教别人，把有关汉字补上。这样，識字不多的人們可以更主动地练习写作，不受已认得的汉字的限制，只要能說出的話，就能够写出来。这对于练习写作，提高写作能力，有促进的作用。第五，拼音字母的发音和拼法都是以普通話为依据的，用这些字母給汉字注音就为学习普通話打下基础。

以上所讲注音識字的优越性已經为各省市的注音識字的經驗充分地証明了。經驗还証明了注音識字不独可以加快扫盲的速度，还可以把业余高小的学习期限从两年縮短到半年左右，使文盲和半文盲，經过不到一年的业余学习，升入业余中学继續学习。还有不少脫盲学員，一面在业余高小学习，一面通过大量閱讀注音讀物和大力练习写作，成为有社会主义覚悟、有文化、有技术的人才，并且有些在技术革新方面作出貢献。例如山东省平原县董王庄人民公社社員徐淑英

1959年6月注音扫盲毕业，現在业余中学学习，参加技术学习不到三个月，利用生产空隙，閱讀了有关农业的注音讀物，創造了“手摇药剂拌种箱”，提高了工作效率十二倍。类此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例子有力地証明了，注音識字使劳动人民初步掌握了文字，提高了他們的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的水平，实現了文化革命，促进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本刊今年5月号的社論里，我們曾經表示希望各高等学校中文系的同学們亲自到农村参加注音識字的研究工作。应該指出，部分工厂和一些城市还有扫盲和大办业余教育的任务。在这些地方，还需要大力推行注音識字的办法。高等学校中文系的同学們有很好的业务条件参加这項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如果部分高等学校中文系的老师們也能参加这項工作，那就更好了。目前特别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改进拼音教学和結合注音教学汉字，如何使劳动人民尽快获得汉語用詞造句的基础知識，以及編纂适合劳动人民使用的詞典。

中央的指示所提出的第二項任务是在学生、教师和青年工人、农民、店員、职工、部队官兵中大力推广普通話，造成風气。自从1956年2月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話的指示发布后，推广普通話已經获得了显著的成就。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普通話已經在若干地区的机关、团体和人民大众中，开始推广起来了。但是推广的成績，在各地方，在各机关、团体，有很大的悬殊，还要继續不断地努力，才能够达到全国普及的要求。

以学校来說，小学比中等学校好，而小学低年級又比高年級好；中等学校比高等学校好。但小学的普通話教学质量，也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中等学校还沒有普遍地用普通話教学，还需要作更大的努力。高等学校需要大力提倡說普通話。幼儿园也应該用普通話教学。經驗証明，幼儿能够很快学会讲普通話。为了使幼儿园、小学和中等学校的普通話教学能够提高质量，并进一步普及，关鍵在于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来培訓教师。

在社会上推广普通話首先要养成讲普通話的社会風气，对不同对象要提出不同的要求，特别要在青年中大力推广，提出比較严格的要求，由青年团、工会和其它有关机关、团体保証实現。福建省許多县，广东省若干专区和北方話地区若干县已經基本上在青年中普及了普通話，这可以作为全国各地区学习的榜样。壮年和中年以上的人們也能够学会讲普通話，但对他們的要求可以放低些。这样才能够鼓励他們学普通話，形成讲普通話的社会風气。总而言之，我們应該遵照中央的指示，在青年工人、农民、店員、职員、部队官兵中大力推广普通話，特别要以服务性行业，如邮电、海陆空交通、旅館、飯店、百貨商店等等为重点，大力推广。当然，广播員、話剧演員和电影演員也要学好普通話。

中央的指示所提出的第三項任务是再簡化一批汉字。目前使用簡化字的情况是，正式推行的四批簡化字，共五百一十七个（还有偏旁类推的簡化字約一千二百多个，因銅模沒有制好，尚未在书刊上出現），不够用，而人民随时創造的簡化字，因为沒有經过統一的整理，一时难免在使用上引起混乱。为了便于学习和使用，把現有簡化字加以整理，并再簡化一批，是很必要的。

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汉字簡化有一定的規律。归納起来，大概有如下十条規律：

1）改换簡单的声旁，如拥（擁）、灯（燈）、种（種），等等；

2）另造形声字，如惊（驚）、护（護），等等；

3）同音代替，如以松代鬆，以余代餘，以丑代醜，等等；

4）以簡单的偏旁代替笔画多的偏旁，如以又代莫（难 汉），以扌代幸和坴（执、热），等等；

5）保留字的特征部分，而省略其它，如医（醫）、习（習）、丽（麗），等等；

6）草书楷化，如东（東）、与（與）、为（爲），等等；

7）会意字，如尘（塵）、岩（巖）、丅（寡），等等；

8）輪廓字，如亀（龜）、黾（黽）、仓（倉），等等；

9）以簡單的笔画代替笔画多的部分，如兰（蘭）、闫（閻）、浐（演），等等；

10）保留字的上部和下部，而省略中部，如虏（虜）、虑（慮）、奋（奮），等等。

这十条規律以第一、第二、第三为最好。第一和第二两条都是用声旁来表示字音，能够跟口語結合，便于认讀。換句話說，这两条規律都是用形声字的办法来簡化汉字。如宙（賽）、忎（感）、实（富）、芏（礦）讠乙（譯），等等，都是群众用形声字的办法創造出来的簡化字。用这个办法还可以簡化更多的字，如礽（稻）、辺（道）、弡（彈）、趵（蹈）、泆（灌）、肤（膚）、斤（厦），等等。事实上，这些字已經有人在使用了。

原有的和新的形声字有許多声旁的标音是不甚准确的。这可能是語音的变化，声旁是用地方音来表示，沒有正确而簡單的声旁可用等原因造成的。簡化的迫切要求是減少笔画，現在似乎不必急于整理現有形声字的声旁；但是新造的形声字还是以声旁准确、照普通話的音来表示为好。

簡化汉字不仅要減少笔画，还要減少字数。为了減少字数，第三条汉字簡化規律，即同音代替，是有效方法之一。現有的簡化字有一部分是同音代替的字，如丑（醜）、余（餘）、只（祗、隻）、发（髮）、松（鬆）、干（乾、幹）、后（後）、谷（穀）、台（臺），等等。群众也很喜欢用同音代替的字，如午（舞）、予（預）、介（解）、迂（遇），等等。我們还可以用更多的同音代替的字，如以吕代旅，以乙代意。当然，在使用同音代替的时候，我們要注意到，使意义不发生混淆。这里所謂意义不发生混淆，是以詞为单位，从整个句子或者整段文章来考虑，而不是孤立地斤斤計較每个字的意义。

目前要大量創造新形声字，还有一定的限制，同时用同音代替来整理全部汉字也須进一步加以研究。为了尽快地提出一批新的簡化字，除了尽可能用改換声旁、另造形声字和同音代替等办法外，还需要适当地使用其它汉字簡化的規律，使常見和常用的汉字得到簡化，以便儿童和人民大众更容易学习汉字，更方便使用汉字。这是当前文字改革任务之一，也就是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我們希望語言科学工作者能够参加提出一批新簡化字的工作。

哈尔濱师范学院的“毛主席語言研究”活动

哈尔濱师范学院中文系师生，在学习毛澤东思想的高潮中，在系党总支的領导下，本科三年級同学和汉語教研組教师組成了毛主席語言研究組，大力开展“毛主席語言研究”活动。两个月来已取得显著的成績。

在这項活动中，人人都以毛澤东思想挂帅，反复鑽研«实踐論»«矛盾論»，深入地探討了毛主席的語言理論，并以此为指导，全面地研究毛主席的語言实踐。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了两条道路的斗争，批判了認为毛主席語言理論不成系統，研究意义不大等錯誤思想。“五一”节前，已完成了二十余万字的«毛主席語言理論研究»初稿一部，作为节日的献礼。

这部初稿包括下列九个專題：1）毛主席的語言理論中的几个問題；2）毛主席語言是現代汉語文学語言的典范；3）毛主席运用口头詞語和文言詞語的研究；4）毛主席著作中成語运用的研究；5）毛主席著作中句法結构运用的研究；6）毛主席著作中新兴語法現象的研究；7）毛主席著作中几种修辞手法的运用；8）毛主席著作中篇章結构的研究；9）毛主席的語言風格。全部初稿現已油印成册，并送交党委及院內外有关單位征求意見，以后再做进一步修改。預定“七一”定稿，向党的生日献礼。

这次研究活动提高了师生的思想水平，使語言教学更高地举起了毛澤东思想紅旗，为下学年开設毛主席語言研究專門化課程創造了良好的条件。（哈尔濱师范学院中文系毛主席語言研究組）

拥护继续簡化汉字

陈光堯

196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推广注音識字的指示»。这个指示是我国語文学界一个历史性的重要文件。文件不仅对今后推广注音識字和推广普通話指出了方向，而且对継續簡化汉字和如何簡化汉字也指出了明确的方針和方法。

这里只就指示繼續簡化汉字的精神和原則談談个人的認識和体会。

現行汉字进行簡化，主要是为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利益服务。文字工具便利，对于工农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工农业生产的持續大跃进，等等，都将起积极的作用。因此，簡化汉字的方針以工农群众容易学习和容易使用为原則是十分正确的。除了极少数的保守派，广大的知識分子本来就使用着群众通用的簡化字，他們甚至还經常同工农群众一道創造新的簡化字。所以簡化字工作走群众路綫，应該是全国广大人民群众所欢迎的。

在1958年全国大跃进以前，簡化汉字为了推行的便利起見，簡化方法着重遵循"約定俗成"原則，基本上不創造新的簡化字。不过个别的字也有例外，即如"麗"的古文"丽"字已很通行，但为了更加好写，就稍加修改作"丽"。又如"鑰"字沒有合适的簡体可用，就給它改换一个簡笔而又同音的声旁作"钥"。此外，«汉字簡化方案»还适当地采用了几十个新的同音假借字，例如以"郁"代"鬱"和以"吁"代"籲"，等等，这都是旧字新用，或者說是死字活用，比起另造新簡字在推行上是容易得多了。

这个簡化原則，本来是符合当时的实际需要的，也是十分正确的。不过，約定俗成的簡化字，数量終究是有限度的，而广大群众要求簡化的字却是越多越好。凡是过去社会上已通行的簡化字，虽然大多数都已收入«汉字簡化方案»內公布了，但是远远不能滿足广大群众的合理要求和迫切需要。如果長久只限于"約定俗成"，有时候就会有"材料缺乏"或者是"此路不通"的困难。例如"辦"字作"办"，这是很通行的，"辯"字用"弁"代替，这也相当通行；但是同一类型的"辨"、"瓣"、"辮"等字却都沒有"約定俗成"的簡体可用。而事实上"辨"、"瓣"、"辮"等字又非簡化不可，否則群众就不同意。解决这个問題，应該是我們大家的責任。

以上三个繁体字，如果按"办"字类推簡化作"从""瓜""糸"，不但形状很生僻，而且不容易辨音，对于群众学习認字是不便利的。因此，如能按照指示說的"尽可能有簡單明了的規律"的精神，訂出繼續簡化的方案，这样，过去"約定俗成"原則解决不了的問題，都将能彻底解决。比如扩大或調整簡化字中的新形声字的范圍的办法就値得注意。

有一些汉字的声旁，或者因为古今讀音的不同，或者因为各地方言的紛歧，或者因为群众很不容易了解(例如"𢦏"是"哉""栽""裁""載"等字的声旁，但許多人并不知道)，或者因为它的声母、韵母和整个汉字的讀音不很切合等等，新形声字都可以作适当的調整。例如"膩"字簡化作"腻"或"肬"，就不如改换声旁作"肊"好；"閫"字簡化作"阃"或"阄"，也不如改换声旁作"闪"好；"鯢、閲、霓、輗、睨、猊、倪"等字簡化作"𩽹、闪、兕、軏、䀮、犽、仉"，更不如索性都改换声旁作"鲵、阋、霓、輗、睨、猊、倪"較好。又如"游"作"沋"，"裁"作"材"，"愁"作"忎"，"滴"作"泜"，"摘"作"扥"，"瞧"作"睄"等等，虽然面孔較生，但学的人一看就容易讀出音来，而且也能了解它們的意义。在新出的一些簡化字当中，最受群众欢迎的如"拥""护"一类的字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还有一些繁体字，虽然按照簡化偏旁类推簡化了，但笔画还是很多，还是不好写；有的簡化字因为声旁变成了另外一个字，也更影响到群众的学习。关于前者，例如"㔷、缨、樱、鹦、瘾、骡、懒、篱、榈、樯、窦、蠹"等类推簡化字，就不如索性改换声旁作"挟、缺、楼、鹅、痹、骑、恺、笏、泪、垟、窄、男"来得直接了当。(以上"楼、鹅、痹、笏、相、垟"等簡化字现已通行。)关于后者，例如"隐"、"稳"等簡化字的声旁变成了"急"，也不如改换声旁作"阴"、"稳"好学好写。至于"龌、龊、赛、糟"等可以类推簡化的字，如能索性改换偏旁作"腥、腚、宙、纴"，那也将更为群众所欢迎。

此外，还有如以"襄"字作声旁的有关各字的簡化

問題，如果只为了占少数的知識分子便于类推，那就可以按照《汉字簡化方案》中“讓”作“让”的例子，一律以“上”字代“襄”作声旁，不必有所分歧。但如果是为多数初学識字的文盲和儿童服务，那就有必要依照各个形旁和声旁配合后整个字的讀音来分别处理。例如讀 rang 的“嚷、壤、攘、瀼、禳、穰、瓤、讓”等字，都用“上”标声作“吐、圵、扗、汢、社、秥、𨁏、让”；讀 xiang 的“勷(也讀 rang)、鑲、驤”等字，都用“乡”标声作“劝(結构和“功、劲、劲、勉”等字相同)、鄉、骖”。至于普通話讀 niang 的“釀”字，在《方案》中既已按“娘”字例类推簡化作“酿”，那尽可以不动。

为甚么搞簡化字可以考虑創造些“新形声字”呢？因为我国現有的全部汉字，只有形声字比較容易理解，也容易学习。在旧“六書”的范疇中，也只有形声字比較为群众所欢迎。过去历代流行的和近年新出的許多簡化字当中，都是新形声字占压倒的多数。例如旧有的“担，胆，响，远”和新出的“拥，护，歼，态”，等等，都是广大群众最为欢迎的簡化字。《說文解字》所收 9353 个汉字中，形声字的比例也占百分之八十三，这更說明了形声字在全部汉字中地位的重要，以及它在群众間早已造成的基础的雄厚。

在現行汉字中，有一部分是不增造新字而扩充原字用途的，古时候把它叫作“假借字”(例如“長短”的“長”借用为“長幼”的“長”之类)，《方案》中以“郁”代“鬱”和以“吁”代“籲”等，都是很好的新假借字。这种兼职省料、增义不增字的办法，在今后补充簡化字的时候还可以适当地采用。例如“彐、彳、予、太、午、欠、付、代、艾、合、沚、芮、波、匊、腌、笈、洒、羔、桃、哮”等字，我認为可以考虑兼代：“雪、街、預、泰、舞、歉、副、戴、藹、盒、滯、蕊、菠、鄱、鞠、臀、籍、龔、糕、萄、囂”等繁体字的职务。

笔画既多而又常用的字是非簡化不可的，笔画既多而声旁讀音又不明确的字更非簡化和改造不可。現行汉字有历史可查的最老的祖先是甲骨文，它距离現在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我們現在所用的楷書字，就是汉时所謂的“眞書”，它距离現在也有整两千年了。在秦代短短的四十年当中，曾进行过大篆改小篆又改隶書的文字改革和文字統一工作；到了汉代，也进行过一次隶書改眞書的工作。但自汉以后直到解放以前的反动时代，汉字改革工作就只流行于民間，得不到政府的承認。現在我們政府大搞文字改革，这不但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也是汉字本身的一大喜事。

在已公布的《汉字簡化方案》第一二两表內，共有簡化字五百一十五个；由《方案》第三表簡化偏旁类推現在的常用字，又有一千二百多个类推的簡化字，两項合計約有一千七百多个簡化字。如果再加上今后将再推荐給群众試用一定数量的新簡化字，那就是在我們日常应用的五六千个常用字当中，有半数以上的字可以得到簡化。这样，过去我們許多人經常感覺到的繁体字的难写問題，基本上就可以逐步解决。

1956 年元旦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吳玉章同志所写《中国文字改革的道路》一文，其中有关簡化汉字工作的一段指示說：

> 在一般日常应用的六七千个汉字中，第一次的《汉字簡化方案》已經簡化了1700多字，初步估計还有1000多字应該加以簡化而还沒有簡化。我們要尽量搜集并公开征求新的簡字，准备在一二年內提出第二次的《汉字簡化方案》。要在今后三年內，使得在日常应用的六七千个汉字中有一半得到簡化，这才算是汉字字形簡化工作的完成。

照此看来，如果能早日公布新的簡化字，不但可以胜利地完成上文所引吳老对簡化字工作的指示，而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的偉大时代里，对工农群众知識化，肯定地还要起着不可限量的推动作用。

目前在汉字簡化工作中，还存在以下一些問題，这还需要我們細心而周密地加以解决：

(1) 有极少数的知識分子，对已公布的《汉字簡化方案》中的簡化字还不完全熟悉，他們仍然是写弯曲繚繞的草字，而不习慣写簡單明确的簡化字。还有一些知識分子，虽然都很贊成簡化字，但不能認眞地依照《方案》去写，特别是在各种展覽館的說明文字中，随意乱写簡化字的現象很普遍。例如把“书、风、龙”等字，写成“书、风、龙”，这一类的例子很多。也有把这一个字写成另外一个字的，如将“同、停、敢、意”等字，写成“冈(岡)、仃、干、乙”之类。此外，还有在字旁乱加不必要的偏旁的，例如“恛忆、哱吵、娱娪、傢俱”，等等，这都会給簡化字工作带来不少的麻煩。

(2) 我国地区广闊，人口众多，所以供应报刊需要的簡化字銅模的数量也特别大。我国銅模厂的生产能力本来已很不小，但供应全国各地印刷厂的普遍需要，在目前还可能有照顧不周的現象。因此，在各地报刊包括北京的大小报刊上，还經常有应該簡化而未簡化的繁体字出現。这种現象在作标題用的特号大字中更为普遍。这些混乱的現象如不及时糾正，那很可能使初学識字的人要同时認識繁簡两种字体，这就同我們搞簡化字的本意不符合了。

(3) 近几年来，有不少人認为《方案》中的某些簡化字还不够方便，他們主張再加簡化。例如“两、国、

娄、钱、属、湿、磅、滩、摊、瘫、篱、获、滤、龄、磔、铄、隐、稳”等簡化字，他們主張再加簡化作：“刃、口、姜、介、屎、泆、砄、涡、捌、瘌、笏、秒、滔、岑、砌、灼、阱、敉”。此外，在《方案》的五百一十五个簡化字里面，还有十六画的“篱”字和十五画的“瘫、霉、聪”等字，至于有十四画和十三画的簡化字那就更多了。这些簡化字比起繁体字来当然好写得多，但对群众的一般要求来說，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4）有少数的汉字，笔画虽不太多，但很难写，这也是簡化工作中的一个問題。在《汉字簡化方案》內，曾經把“亞、壺、肅、淵”等字簡化为“亚、壶、肃、渊”，这确是办了一樁好事。（虽然其中的“渊”字还是不很好写。）但其他不好写的字如：“凹、凸、八、外、派、旅、商、离、、頤、夢、奥、盈、鼠、断（也写作斷）、鼎、瘼、盥、塁、餐”，等等，到現在还沒有簡化。这些难写的字，都是在笔画問題之外还兼具一个“如何下笔”或者是“如何安排笔画”的严重問題。这个“难写”的問題，最好是在今后补充的《汉字簡化方案》中加以解决。

群众热情地采用簡化字，这是很好的現象，能促进簡化字普遍推行；但是，如果乱写簡化字，对簡化字的推行就很不利。我們应該反对某些人乱写簡化字；但是，如果把《汉字簡化方案》以外的合理的簡化字，（如“亍、㘭、拡、亩”等等），也都認为不合法而加以反对，这却是不对的。关于这一問題，下面分作几部分来談一談：

（1）“部”作“阝”，“街”作“亍”，“能”作“㠯”，“面”作“凸”，“解”作“平”，“勤”作“动”，“意”作“忑”，“感”作“忑”，“靠”作“告”，“器”作“㘭”，“囊”作“亩”等等，这都是《方案》以外的很好的簡化字，我个人认为可以采用，而不应該反对。

（2）“广”也作“庀”，“风”也作“凡”，“队”也作“阦”，“导”也作“寻”，“庆”也作“庆”，“产”也作“产”，“构”也作“构”，“阶”也作“阯”，“胜”也作“肝”或“胂”，“检”也作“杆”或“柃”，等等，这虽是原来就存在的紛歧写法，但是为了正确地推行簡化字，还是以不用这些异体为妥。

（3）“家”作“宊、宋、审、宛”，“宣”作“亡”，“革”作“廿”，“商”作“芮”，“停”作“仃”（假借字），“警”作“井”（假借字），等等，这些新的簡化字現在已相当通行，究竟能用不能用，我以为可以等待它們推行一个时期之后再行决定。

（4）“意”作“乙”，“敢”作“干”，“食”（單用）作“仐”，“室”作“宇”等等，在目前来說，还不大方便，似乎应当暫緩采用，我认为“意”字可以簡化作“忑”，“敢”字可以簡化作“攻”或“耳”，“食”字單用可以簡化作“仐”。

总而言之，把現有的繁体汉字尽量都簡化到“十笔”以內，这是一个很复杂又很艰巨的任务。过去虽也有人（包括我自己）这样設想过，却从来沒有人成功。現在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导之下，在全国人民大跃进的鼓舞之下，任何困难沒有克服不了的，只要有可能的都已变成了現实；所以把繁体汉字都簡化到“十笔”以內，这只是不会太長的时間問題。最后，我預祝繁体汉字打进“十笔”以內的簡化工作早日完成。

安徽寿县方言中的几个“急讀”和“緩讀”的詞

黄家忠

在安徽寿县方言中，有些詞由于“急讀”或“緩讀”的原故，用汉字記音难于从字面上看出原意，其实稍加分析就可以明白。現在介紹几个在下面，給方言調查研究的同志們参考。

1）“团媳妇”tuánxífù，“童养媳妇”的急讀。

2）“满子”mǎnzǐ，“木椀子”的急讀。木椀子，儿童食器，用竹节或木材做成。

3）“就的”jiùdì，“就是的”的急讀，多用于对話。

4）“准家”zhǔnjiā，在寿县南乡中，旧社会农民有喊地主叫“准家”的，即“主人家”的急讀。

5）“油滋啦”yóuzīlā，指猪、羊等动物的脂肪熬煉后所剩的渣滓。“油滋啦”即“油渣”的緩讀。

6）“刻墩”kèdūn，“坑”的緩讀。

7）“普笼”pǔlóng，作量詞用，“一普龙”是“一蓬”的緩讀，即“一丛”的意思。

8）“秃鲁”tūlǔ，“脱”的緩讀，如：“看你說話不分場合，随便由嘴就‘秃鲁’出来了！”又与“脫落”諧音。

9）“孤冷”gūlěng，“滚”的緩讀，如：“东西‘孤冷’掉了。”有时也作量詞用。

問題，如果只为了占少数的知識分子便于类推，那就可以按照《汉字簡化方案》中“讓”作“让”的例子，一律以“上”字代“襄”作声旁，不必有所分歧。但如果是为多数初学識字的文盲和儿童服务，那就有必要依照各个形旁和声旁配合后整个字的讀音来分别处理。例如讀 rang 的“壤、壌、攘、瀼、穰、穣、瓤、讓”等字，都用“上”标声作“吐、圵、扗、汢、社、秙、瓞、让”；讀 xiang 的“勷（也讀 rang）、鑲、驤”等字，都用“乡”标声作“幼（結构和“功、劝、劲、勉”等字相同）、鈔、骖”。至于普通話讀 niang 的“釀”字，在《方案》中既已按“娘”字例类推簡化作“酿”，那尽可以不动。

为甚么搞簡化字可以考虑創造些“新形声字”呢？因为我国現有的全部汉字，只有形声字比較容易理解，也容易学习。在旧“六書”的范疇中，也只有形声字比較为群众所欢迎。过去历代流行的和近年新出的許多簡化字当中，都是新形声字占压倒的多数。例如旧有的“担、胆、响、远”和新出的“拥、护、歼、态”，等等，都是广大群众最为欢迎的簡化字。《說文解字》所收 9353 个汉字中，形声字的比例也占百分之八十三，这更說明了形声字在全部汉字中地位的重要，以及它在群众間早已造成的基础的雄厚。

在現行汉字中，有一部分是不增造新字而扩充原字用途的，古时候把它叫作“假借字”（例如“長短”的“長”借用为“長幼”的“長”之类），《方案》中以“郁”代“鬱”和以“吁”代“籲”等，都是很好的新假借字。这种兼职省料、增义不增字的办法，在今后补充簡化字的时候还可以适当地采用。例如“彐、彳、予、太、午、欠、付、代、丈、合、沚、芮、波、匊、腌、笈、浬、羔、桃、哮”等字，我認为可以考虑兼代：“雪、街、預、泰、舞、歉、副、戴、藹、盒、滞、蕊、菠、鄱、鞠、臀、籍、羹、糕、萄、嚣”等繁体字的职务。

笔画既多而又常用的字是非簡化不可的，笔画既多而声旁讀音又不明确的字更非簡化和改造不可。現行汉字有历史可查的最老的祖先是甲骨文，它距离現在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我們現在所用的楷書字，就是汉时所謂的“眞書”，它距离現在也有整两千年了。在秦代短短的四十年当中，曾进行过大篆改小篆又改隶書的文字改革和文字統一工作；到了汉代，也进行过一次隶書改眞書的工作。但自汉以后直到解放以前的反动时代，汉字改革工作就只流行于民間，得不到政府的承認。現在我們政府大搞文字改革，这不但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也是汉字本身的一大喜事。

在已公布的《汉字簡化方案》第一二两表内，共有簡化字五百一十五个；由《方案》第三表簡化偏旁类推現在的常用字，又有一千二百多个类推的簡化字，两項合計約有一千七百多个簡化字。如果再加上今后将再推荐給群众試用一定数量的新簡化字，那就是在我們日常应用的五六千个常用字当中，有半数以上的字可以得到簡化。这样，过去我們許多人經常感覺到的繁体字的难写問題，基本上就可以逐步解决。

1956 年元旦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吳玉章同志所写《中国文字改革的道路》一文，其中有关簡化汉字工作的一段指示說：

> 在一般日常应用的六七千个汉字中，第一次的《汉字簡化方案》已經簡化了1700多字，初步估計还有1000多字应該加以簡化而还沒有簡化。我們要尽量搜集并公开征求新的簡字，准备在一二年內提出第二次的《汉字簡化方案》。要在今后三年內，使得在日常应用的六七千个汉字中有一半得到簡化，这才算是汉字字形簡化工作的完成。

照此看来，如果能早日公布新的簡化字，不但可以胜利地完成上文所引吳老对簡化字工作的指示，而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的偉大时代里，对工农群众知識化，肯定地还要起着不可限量的推动作用

目前在汉字簡化工作中，还存在以下一些問題，这还需要我們細心而周密地加以解决：

（1）有极少数的知識分子，对已公布的《汉字簡化方案》中的簡化字还不完全熟悉，他們仍然是写弯曲繚繞的草字，而不习慣写簡單明确的簡化字。还有一些知識分子，虽然都很贊成簡化字，但不能認眞地依照《方案》去写，特別是在各种展覽館的說明文字中，随意乱写簡化字的現象很普遍。例如把“书、风、龙”等字，写成“书、𠘨、龙”，这一类的例子很多。也有把这一个字写成另外一个字的，如将“同、停、敢、意”等字，写成“冈（岡）、亻丁、干、乙”之类。此外，还有在字旁乱加不必要的偏旁的，例如“忆忆、哕吵、娒姆、傢俱”，等等，这都会給簡化字工作带来不少的麻煩。

（2）我国地区广闊，人口众多，所以供应报刊需要的簡化字銅模的数量也特别大。我国銅模厂的生产能力本来已很不小，但供应全国各地印刷厂的普遍需要，在目前还可能有照顧不周的現象。因此，在各地报刊包括北京的大小报刊上，还經常有应該簡化而未簡化的繁体字出現。这种現象在作标題用的特号大字中更为普遍。这些混乱的現象如不及时糾正，那很可能使初学識字的人要同时認識繁簡两种字体，这就同我們搞簡化字的本意不符合了。

（3）近几年来，有不少人認为《方案》中的某些簡化字还不够方便，他們主張再加簡化。例如“两、国、

娄、钱、属、湿、磅、滩、摊、瘫、篱、获、滤、龄、碌、铄、隐、稳”等簡化字，他們主張再加簡化作：“刃、口、娄、尔、屎、洪、砄、涡、拐、痔、笏、秒、滘、岑、砌、灼、阴、秋”。此外，在《方案》的五百一十五个簡化字里面，还有十六画的“篱”字和十五画的“瘫、霉、聪”等字，至于有十四画和十三画的簡化字那就更多了。这些簡化字比起繁体字来当然好写得多，但对群众的一般要求来說，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4）有少数的汉字，笔画虽不太多，但很难写，这也是簡化工作中的一个問題。在《汉字簡化方案》內，曾經把“亞、壺、肅、淵”等字簡化为“亚、壶、肃、渊”，这确是办了一樁好事。（虽然其中的“渊”字还是不很好写。）但其他不好写的字如：“凹、凸、爪、飞、派、旅、商、商、、頤、粤、奥、盈、鼠、斷（也写作斷）、鼎、瘸、盥、噩、餮”，等等，到现在还沒有簡化。这些难写的字，都是在笔画問題之外还兼具一个“如何下笔”或者是“如何安排笔画”的严重問題。这个“难写”的問題，最好是在今后补充的《汉字簡化方案》中加以解决。

群众热情地采用簡化字，这是很好的现象，能促进簡化字普遍推行；但是，如果乱写簡化字，对簡化字的推行就很不利。我們应該反对某些人乱写簡化字；但是，如果把《汉字簡化方案》以外的合理的簡化字，（如“亍、口、拁、宙”等等），也都認为不合法而加以反对，这却是不对的。关于这一問題，下面分作几部分来談一談：

（1）“部”作“阝”，“街”作“亍”，“能”作“㠯”，“面”作“百”，“解”作“卒”，“勤”作“劸”，“意”作“忈”，“感”作“忑”，“靠”作“告”，“器”作“口”，“褒”作“宙”等等，这都是《方案》以外的很好的簡化字，我个人认为可以采用，而不应該反对。

（2）“广”也作“庀”，“风”也作“凡”，“队”也作“阦”，“导”也作“孕”，“庆”也作“庆”，“产”也作“产”，“构”也作“栟”，“阶”也作“阰”，“胜”也作“肼”或“胂”，“检”也作“杆”或“枍”，等等，这虽是原来就存在的紛歧写法，但是为了正确地推行簡化字，还是以不用这些异体为妥。

（3）“家”作“冗、宋、审、宻”，“宣”作“宀”，“革”作“廿”，“商”作“冏”，“停”作“仃”（假借字），“警”作“井”（假借字），等等，这些新的簡化字现在已相当通行，究竟能用不能用，我以为可以等待它們推行一个时期之后再行决定。

（4）“意”作“乙”，“敢”作“干”，“食”（單用）作“仐”，“室”作“宁”等等，在目前来說，还不大方便，似乎应当暫緩采用，我认为“意”字可以簡化作“忈”，“敢”字可以簡化作“孜”或“耳”，“食”字單用可以簡化作“饣”。

总而言之，把现有的繁体汉字尽量都簡化到“十笔”以內，这是一个很复杂又很艰巨的任务。过去虽也有人（包括我自己）这样設想过，却从来沒有人成功。现在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导之下，在全国人民大跃进的鼓舞之下，任何困难沒有克服不了的，只要有可能的都已变成了现实；所以把繁体汉字都簡化到“十笔”以內，这只是不会太長的时間問題。最后，我預祝繁体汉字打进“十笔”以內的簡化工作早日完成。

安徽寿县方言中的几个“急讀”和“緩讀”的詞

黃 家 忠

在安徽寿县方言中，有些詞由于“急讀”或“緩讀”的原故，用汉字記音难于从字面上看出原意，其实稍加分析就可以明白。现在介紹几个在下面，給方言調查研究的同志們参考。

1）“团媳妇”tuánxífù，“童养媳妇”的急讀。

2）“滿子”mǎnzǐ，“木碗子”的急讀。木碗子，儿童食器，用竹节或木材做成。

3）“就的”jiùdì，“就是的”的急讀，多用于对話。

4）“准家”zhǔnjiā，在寿县南乡中，旧社会农民有喊地主叫“准家”的，即“主人家”的急讀。

5）“油滋啦”yōuzīlā，指猪、羊等动物的脂肪熬煉后所剩的渣滓。“油滋啦”即“油渣”的緩讀。

6）“刻墩”kədūn，“坑”的緩讀。

7）“普籠”pǔlóng，作量詞用，“一普龙”是“一蓬”的緩讀，即“一丛”的意思。

8）“秃魯”tūlǔ，“脫”的緩讀，如：“看你說話不分場合，随便由嘴就‘秃魯’出来了！”又与“脫落”諧音。

9）“孤冷”gūlěng，“滾”的緩讀，如：“东西‘孤冷’掉了。”有时也作量詞用。

从学習毛主席著作中理解語言是社会斗爭的工具

王德春

人类除了向自然界进行生产物質財富的斗爭以外，在阶級社会里还要进行阶級斗爭。不管是生产斗爭还是阶級斗爭，人們总离不开使用語言作为工具和武器。但是，我們都知道，社会各阶級使用的都是全民語言。这种全民語言不仅使人們有可能在生产斗爭中协調自己的共同活动，不断发展社会生产，而且使人們有可能在阶級斗爭中統一自己的意志、思想和行动，团結朋友，向阶級敌人作斗爭。这就是說，語言本身是全民的，它一視同仁地为社会各个阶級服务；但是任何阶級使用語言时都是为了本阶級利益去和敌人作斗爭，不会去为敌对的阶級服务。人們为了本阶級利益去和敌人作斗爭时，必須使用全民的語言。否則，敌人听不懂你講的話，看不懂你写的文章，你就达不到斗爭的目的。語言的全民性和使用語言的阶級性，是辯証統一的，①我們不能用語言的全民性来否定語言在阶級斗爭中的作用。

人們怎样用語言来进行阶級斗爭呢？主要是做宣傳。宣傳包括两方面：闡述自己的思想和駁斥敌对思想。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有意无意地做宣傳工作。毛主席說："一个人只要他对別人講話，他就是在做宣傳工作。只要他不是啞巴，他就总有几句話要講的。所以我們的同志都非学习語言不可。"②今天，我們必須使用語言这个斗爭工具，大力宣傳馬克思列宁主义，宣傳毛澤东思想，宣傳共产党的主張、路綫、方針和政策；同时要坚决駁斥敌人的謬論，揭穿他們的謊言，反击他們的誹謗。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阶級的思想家和活动家都用語言进行宣傳和斗爭。恩格斯談到达·芬奇这些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时指出："他們的特征是他們几乎全部在时代运动中和实际斗爭中生活着和活动着，参加政党进行斗爭，一些人用笔和舌，一些人用劍，而許多人則两者并用。"③用"劍"斗爭很重要，用"笔和舌"斗爭也很重要，任何阶級都沒有忽視这一点。毛主席說得好："你是資产阶級文艺家，你就不歌頌无产阶級而歌頌資产阶級；你是无产阶級文艺家，你就不歌頌資产阶級而歌頌无产阶級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III,894)

資产阶級从来不忘掉語言这个斗爭工具。从資产阶級革命到資产阶級專政的整个时期，他們用語言鼓吹自己的思想。資产阶級說的最好听的話大概就是所謂"自由、平等、博爱"。但就是这句好听的話也是用来欺騙人民和維护資本主义統治的。列宁說过："馬克思恰恰是把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間、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描繪得淋漓尽致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証明这些詞句掩蓋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資本的自由。"列宁認为，自由、平等、民主等等如果"同劳动摆脫資本的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騙人的东西"。他写道："現在斗爭具有世界規模了，因此任何一个用'民主''自由'的字眼来反对我們的人，都是站有产阶級一边，欺騙人民，因为他不懂得，自由和民主直到現在都是有产者的自由和民主，对无产者来說不过是殘羹剩飯。"列宁認为，如果不消灭剝削阶級，自由、平等、民主等等都是空話。只有实行无产阶級專政，劳动人民才能眞正获得它們。他写道："要使劳动者获得自由，首先必須战胜剝削者的反抗；既然我遭到整个阶級的反抗，那很淸楚，我不能把自由、平等和多数人的决定給予这个阶級。"④

这些例子都說明，資产阶級为了反对无产阶級和欺騙人民，一向重視使用語言武器。列宁說得好："叫囂的是資本家和他們的报刊，正是他們'在声嘶力竭地叫囂'，极力想用自己的喊声压倒別人，不讓人民听到眞理，用謾罵和喊叫的洪流淹沒一切，妨碍別人作切实的

---

① 参看《語言与政治的关系》，《外語教学与翻譯》1959年11期；《語言的全民性和使用語言的阶級性》，《解放日报》1959年12月28日。

② 《毛澤东选集》，第3卷，859頁。以下所引只注卷和頁数。

③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5頁。

④ 《列宁全集》，29卷，314—333頁。

説明。"①这段話是千眞万确的。在抗日战爭时期，毛主席就有力地揭露过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叫囂。毛主席在《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謀》一文中写道："日本和軍事进攻同时发动了謠言攻势，例如所謂'八路軍不願和国民党中央軍配合作战'，'八路軍乘机扩大地盘'，'打通国际路綫'，'另立中央政府'等等。这是日本挑撥国共关系以利誘降的詭計。国民党'中央社'和国民党报紙照抄散布，不惜和日本的反共宣傳互相呼应，其用意所在，甚为可疑。我們也应揭穿它，反对它。"(III, 825)

我国大跃进以来，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惊慌失措，一方面又大肆造謠污蔑。开动了宣傳机器，歪曲事实。把大跃进説成"大跃退"，把跃进中暫时的困难說成"共产主义危机"，把光輝燦烂的跃进年說成"最暗淡最貧困的年分"，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們正是想用声嘶力竭的叫囂来压倒别人，不讓人們听到眞理。

然而，眞理是压不倒的！眞理的声音正透过这些"謾罵和喊叫的洪流"，日益深入人心，并化为巨大的物質力量。这是无产阶級革命实踐的效果，也是无产阶級革命宣傳的效果。无产阶級也一向重視使用語言武器。不同的是：反动阶級是使用語言来造謠、誹謗、謾罵和叫囂，来欺騙人民和反对无产阶級；无产阶級是使用語言来宣傳眞理，駁斥謬論，来团結人民同敌人作斗爭。

就世界范圍来說，現在有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大陣营。我們贊成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但是我們認为，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思想意識是不能和平共处的，它們始終进行着尖銳的斗爭。革命是不能輸出的，但是我們必須用自己建設的榜样来促进社会主义思想在全世界范圍內的胜利。因此我們必須大力宣傳自己的建設成就，宣傳共产主义眞理，并駁倒資产阶級宣傳机器为資本主义制度进行辯护而散布的謊言和誹謗，从思想上和政治上粉碎他們的蠱惑性謬論。

为了做到这一切，我們的党和政府不但重視祖国語言，而且重視外国語，因为外国語同样是社会斗爭的工具。有人不明白学习外国語有深远的政治意义，主張学外語时一定要大讀外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对反映現代生活的作品，特别是无产阶級政治的文章不感兴趣。他們背誦了一些外国古詩，到处吟誦不已，贊賞不絕，自以为外国語"学到家"了；可是一談到"总路綫""大跃进""共产主义"这些話題时，这些人就只好張口結舌，开口就錯，根本談不上使用外国語来进行宣傳和斗爭。所以，明确学习外国語的意义是一个很重要的課題。比如，上海外国語学院就是一个鮮明的例子。这所学院在党的坚强領导下正确地解决了这个問題。他們在进行教育革命中，糾正了"語言与政治分离""重文艺輕政治""厚古薄今""理論脫离实际"的种种偏向，革新了教材，用无产阶級政治的文章和为无产阶級服务的現代文学作品代替了古代文学作品，因而教育質量大大提高。再如，現在新华社每天向世界各国发布中国和国际消息；人民广播电台每天都用各种外国語把眞理的声音和振奋人心的中国建設成就播送到世界各地；至于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出版的外文报刊和書籍日益增加，同各国的文化交往也日益頻繁，更不用細說了。所有这一切都說明了需要使用外国語进行宣傳和斗爭。馬克思在談到外国語时說："外国語是人生斗爭的一种武器。"②这是完全正确的。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是杰出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家，也是卓越的宣傳家。他的各个时期的講話和文章都是使用語言进行宣傳、进行社会斗爭的典范。在这些文章和講話中，毛主席用通俗的語言深入淺出地宣傳了共产主义思想，講解了革命道理，丰富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各个历史时期同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作了不調和的斗爭。毛主席在各个革命时期都非常重視政治宣傳工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說："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这几个政治口号，眞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的乡村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們的面前，一直鑽进他們的脑子里去，又从他們的脑子里流到了他們的嘴上。"又說："政治宣傳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績。很簡單的一些标語、图画和講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毛主席認为："今后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种机会，把上述那些簡單的口号，使它們的內容漸漸充实，意义漸漸明了起来。"(I, 37-38)这就是毛主席在第一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对政治宣傳在农民运动中所收效果的評价。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毛主席又指出了对敌宣傳的巨大效果。他說："敌軍的士兵和营、連、排長被我們俘虏过来，即对他們进行宣傳工作，分为願留願去两种，願去的即发路費釋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謂'共匪見人就杀'的欺騙，立即打破。楊池生的《九师旬刊》，对于我們的这种办法有'毒矣哉'的惊叹…此外，文字宣傳，如写标語等，也尽力在做。每到一处，壁上写滿了口号。"(I, 72)这就是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对政治宣傳在对敌斗爭中所收效果的評价。在抗日战爭时期，毛主席

① 《列宁全集》，24卷，93頁。

② 《拉法格选集》，俄文版，1926年，345頁。

又在《論持久战》一文中論述了政治动員的作用，他主張把抗日战爭的政治目的，以及达到这个目的的步驟和政策告訴軍队和人民，动員大家行动起来。他在談到动員的方法时写道："怎样去动員，靠口說，靠傳單布告，靠报紙書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員。"毛主席还認为政治动員的方法要适合民众口味，并且要經常地做。他認为"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战爭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II，443-444)毛主席更在《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对怎样使用語言进行宣傳和革命斗爭做了完整的指示。我們在講話写文章时必須遵循这些指示。

首先，**講話写文章要靠眞理**。毛主席說："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說，一概要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眞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爭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III，857)党的宣傳所以能深入人心，能把群众引入斗爭中来，就是因为宣傳的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眞理。就是因为"我們鼓动中所含有的眞理鑽进一切人的头脑中去了。而这个眞理是躲避不了的"。①根据毛主席这一指示，我們在使用語言进行社会斗爭时，必須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否則就沒有战斗性。正象毛主席引用魯迅所說的話那样："辱罵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我們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我們宣傳的內容是眞理。反动阶級說話时，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們說的是謊言。例如，帝国主义的外交家往往在理屈詞穷时还要强詞夺理，所以他們的外交辞令总离不了什么"攤牌"呀，"买卖"呀，"和平攻势"呀，这一套流氓无賴的腔調。

最近，美国飞机侵入苏联領空进行間諜活动，美国开始企图抵賴，說什么被苏联击落的美国飞机只負有研究所謂高空气象的"和平使命"，还說什么可能因为飞行員"失去知覚"才誤入苏联領空的，后来，赫魯曉夫同志进一步举出了美国飞机进行間諜活动的确凿証据，美国国务院才发表了一項声明，声明中一方面被迫承認进行間諜活动的事实，一方面还是吞吞吐吐，企图强詞夺理。这項声明中說："看来为了竭力获得目前藏在鉄幕后的情报，一架沒有武装的U-2型飞机大概曾飞越苏联領土。"前面既有"看来"，后面又有"大概"，这种躲躲閃閃、含含糊糊的話显然想为美国开脱罪行，为"美国政府并不知情"的說法做掩护。最后由于侵略罪行无可逃脫，美国国务院竟然大耍流氓态度，硬說这种侵略行为是"正当的国防措施"，是因为苏联政府"过分保密"而引起的。并且百般狡賴，把这种侵略行为硬說成是为了防备"突然襲击"。这分声明充分暴露了美国是做贼心虛，因而宣讀这分声明的新聞发布官在回答記者問題时，矛盾百出，狼狽不堪，甚至不敢回答問題。这同赫魯曉夫在苏联最高苏維埃会議上义正詞严地譴責侵略行为的講話一对比，就可显示出眞理的声音是无敌的。

毛主席自己的文章和演說也总是以深刻充实的思想內容来打动人、說服人的。他的每一句話都是結实有力的由衷之言，語言形式完全适合于內容的表达。因此，他向人民說理，就把人民說得心悅誠服；他駁斥敌人，就把敌人駁斥得体无完肤。

其次，**写文章和做演說要有的放矢，要看对象**。毛主席說："共产党員如果眞想做宣傳，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写字是給什么人看、給什么人听的，否則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III，857)毛主席認为写文章做演說首先要分清敌我对象。他說："从前許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說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詞：一个叫做'殘酷斗爭'，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則是錯誤的。"他認为对付偶然犯錯誤的同志，就需使用批評与自我批評的方法。接着指出："从前我們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講其'殘酷斗爭'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沒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III，856-857)《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一文更进一步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III，894)根据毛主席这一指示，我們使用語言时必須歌頌人民、暴露敌人。对于敌人，我們要用銳利的語言武器，揭穿他們的阴謀詭計，严詞斥責，"无情打击"；对于人民，我們必須用滿腔热情来說話，說得亲切易解。

毛主席在这方面給我們做出了光輝的榜样。他在《質問国民党》(III，925-932)一文中，用質問、斥責和諷刺的語調，把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破坏团結抗战的运动暴露无余。敌人縱使善于造謠誹謗和强詞夺理，在这篇文章面前也不得不完全認輸。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从用詞造句，到整个文章的語气結构，都充滿了战斗的气氛。他把"汪精卫的三民主义"、希特勒等的"法西斯主义"、"張滌非的托洛斯基主义"和"中国境內不論張記李記的反革命特务机关的反革命主义"嘲之为"象瘟疫一样、象臭虫一样、象狗屎一样的所謂'主义'"。在談到敌人关于中国共产党也应"解散"，"馬列主义已經破产"等造謠污蔑的电文时，毛主席說："这也是国民党人說的話儿呢！我們常常覚得，这一类(物以

① 见《列宁全集》，30卷，418頁。

类聚)国民党人的嘴里，是什么东西也放得出来的，果不其然，于今又放出了一通好家伙！”描写得多么生动有力！針对国民党放弃河防、破坏抗战的举动，毛主席質問道：“現在你們将大門敞开，不怕賊来嗎？假使敞开大門而賊竟不来，却是什么緣故呢？”“照你們的說法，中国境內只有共产党是‘破坏抗战’的，你們則是如何如何的‘民族至上’，那末，背向敌人，却是什么至上呢？”这些話旣是質問，又是揭露；旣是斥責，又是諷刺。是对敌斗爭的銳利武器。毛主席对人民群众宣傳的文章和演說完全是另一种語气。这些文章和演說都是热情洋溢，亲切易解的。例如他在談到共产主义时說：“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万鈞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II，657)这段話多么形象有力，多么激动人心！人們如果不看对象，醉心使用一些“高深莫測”的語言，不管人民群众听起来看起来懂不懂，那只有使革命理論成为空談。要知道“我們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語言，那就办不好”。(III，858)

再次，**講話写文章要負責任**。毛主席認为写文章做演說是專为影响人的，所以必須負責任，否則就会到处害人，甚至“流毒全党，妨碍革命”；“傳播出去，禍国殃民”。(III，861)語言旣然是社会斗爭的工具，人們講話写文章就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在使用每一个詞、講每一句話时必須都能認眞考虑到党和人民的利益。古人說：“文如其人”，革命者講的話和写的文章，必須是有利于革命的。因为語言是表达思想的，眞正的革命者在講話写文章时必然認眞地考虑到革命的利益。他們对有利于革命的东西无不大談特談，大書特書，而对不利于革命的言論則坚决加以駁斥。毛主席在这方面也是最偉大的典范。«評蔣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說»(III，1027-1030)一文对蔣介石的反动謬論严加駁斥，針針見血，刺得蔣介石体无完肤。例如，蔣介石在演說中有一項声明：他否認中国将有內战。实际上，他却派了七十七万五千人的軍队專門攻打八路軍、新四軍和华南人民游击队。毛主席解剖了蔣介石的演說，指出他各次談話的矛盾，叫他自打耳光，从而彻底揭穿了他的詭計。

我們講話写文章，不論是宣傳眞理还是駁斥謬論，都必須有利于党和人民，必須对党和人民負責。我們做新聞工作非講不可，非写不可，非使用語言不可。編輯出版工作、翻譯工作、文化教育工作、一切社会工作也都非使用語言不可。每一个国家干部都要写文件，做报告，联系群众；教师要向学生講課；軍事指揮員要向战士講話。正象本文开头所举毛主席說的話：“不但教員是宣傳家，新聞記者是宣傳家，文艺作者是宣傳家，我們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傳家。…一个人只要他对別人講話，他就是在做宣傳工作。”这几句話是我們必須記住的。旣然是做宣傳工作，就要对人民負責，就要准确、鮮明而生动地宣傳馬克思列宁主义，宣傳毛澤东思想，宣傳党的路綫、方針和政策，宣傳共产主义理論，并讓这些革命理論通过亲切易解的語言鑽进人們的头脑，化为巨大的革命力量。

語言是社会斗爭的工具，而語言的使用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我們必須正确地使用語言来宣傳眞理，駁斥謬論，为无产阶級政治、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斗爭。

本刊 1960 年 3、4、5月号更正

頁	欄	行	誤	正
117	左	倒19	今年	1959年
117	左	倒23	万荣二县的十一万	万荣县的二十一万
192	右	15	“七滞”	“乜滞”
193	右	9	榆林	枫林
194	右	13	盧	盧
195	右	倒12	求溯	求溯
196	右	4	于法始开	于法开始
196	右	倒10	芸	是
200	右	8	张来	张未
237	右	8	料学	科学
237	右	6	文学	1. 文学
237	右	倒12	語文学	語文学博士
237	右	倒14	被志中	杂志中
248		8	北京文学	北方文学

本刊 1960 年 4 月号补正

頁	欄	行	誤	正
192	右	8	εœŋ˦	εœy˦
193	左	倒11	他台	池台
195	左	14	若	若箇
195	右	12	方千	方干

語言在阶級斗爭中的作用

黄佛同

由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經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領域，都时刻离不开語言活动，所以語言的社会性，具体地說，就是詞汇中的社会性，必然反映到人类生活的各方面来。社会上的阶級斗爭，包括意識形态的斗爭，当然也是无例外地反映到語言的发展中来。

庸俗的“馬克思主义者”将社会上的阶級斗爭和阶級关系簡單地生硬地联系語言事实来研究，企图从語言結构中找到阶級关系的反映。这是我們不能同意的。十年前苏联馬尔院士的这种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已經遭受到严厉的批判。

但是，也有一些人認为，語言沒有阶級性，因而語言在阶級斗爭中不能起什么作用，这实在是大錯特錯。

我想，还是讓国内外的反面教員来給我們上課吧。看看他們怎样千方百計利用語言来为他們的阶級利益服务的事实，对我們是有好处的。

美国的头号奴才、战爭販子胡适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人物。他販卖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来同馬克思主义对抗，用“整理国故”的美名引誘青年脫离現实、脫离革命，要大家“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义”。他早就說过：“說一句話而不忘这句話的社会影响，走一步路而不忘这步路的社会影响，这才是对于大我的責任。能如此做，便是道德，便是宗教。”①他甚至更露骨地說：“我这里千言万語，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②原来胡适之流的千言万語，是想要我們离开馬克思主义，离开革命斗爭，这种語言的目的是明白不过的了。胡适抄襲了美国反动的語义学派論点，反对使用抽象名詞，实际上他只反对“帝国主义”“資本主义”等这些名詞，害怕人們用这些名詞来指称旧社会旧制度；也反对使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名詞，害怕人們起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所以他在《問題与主义》文章中說：“主張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計划变成一个抽象名詞。‘主义’的弱点和危險，就在这点。因为世界沒有一个抽象名詞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張都包括在里面。”③这种論調同反动的語义学派的观点完全一致，目的不过是維护資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利益罢了。

阶級、社会集团不仅将自己特別的慣用語和术語强加到語言中去，更重要的是，他們多半根据自己的阶級利益和世界观对有关的詞和語作出不同的解釋。最无耻的是資产阶級統治集团常常用一些漂亮的詞句掩飾其猙獰的面目，或者盗窃革命的口号，窜改有关詞句的眞实內容，作出偷天換日、顚倒黑白的宣傳把戏。

最近，美国助理国务卿帕森斯发表了一篇对华政策的演說，尽量玩弄詞句，企图掩盖美国日益破产的对华政策。他将侵略性的軍事行动說成是“威懾力量”；将西太平洋的針对中国的軍事包圍圈和侵略基地叫做“防御盾牌”。④臭名远揚的美国副总統尼克松在一次集会上居然吹嘘美国“已达到接近于‘人人富足’的共产主义理想了”。⑤华尔街壟斷資本的代理人居然也盗用“共产主义理想”的名詞。已死的战爭販子杜勒斯更是一个“冷战名詞”專家，什么“实力地位”“有限战爭”“战爭边緣”“报复力量”“推回政策”，等等。名目繁多，应有尽有。好象在东風压倒西風的形势下胜利的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反殖民主义国家，而是这些日暮途穷的具有“实力地位”“威懾力量”的帝国主义者；好象远离美国海岸万里之外的中国領土：金門、馬祖、澎湖、台灣成了美国的“防御盾牌”；外强中干、穷凶极恶的美帝国主义好象却接近了“共产主义理想”。这是一些多么荒謬无耻的詞句游戏。帝国主义者想欺騙人民，掩盖自己的罪行，相反，却正好暴露了自己。

最耐人尋味的是今年一月間美国总統艾森豪威尔

---

① 《胡适論学近著》，636頁。

② 胡适：《介紹我的思想》，轉引自中南財經学院編《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学习参考資料》，1955年，197頁。

③ 胡适：《問題与主义》，《胡适文存》，第一集（二）。

④ 《帕森斯的死胡同》，《人民日报》1960年3月4日。

⑤ 洛丁：《变了色的蜥蜴》，《人民日报》1960年3月19日。

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結尾的一段話："我們生活在一个語义混乱的海洋中。在这海洋中，旧的名詞不再眞实地傳情达意了。"①好一个虔誠的基督徒，完全是一付"悲天悯人"的念祈禱文的腔調。多么阴險和无耻！自己窜改詞义，顚倒黑白，却又含血噴人，混淆視听。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此地无銀三百两"的把戏。

在美国有一群反动的資产阶級御用的"語言学家"从理論上替他們的主子服务。其中的"語义学派"就是典型的代表。他們的理論基础是邏輯实証主义、一脉相傳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論。他們的主要論点之一就是把語言同思維割裂开来，把思維同客观現实割裂开来。否認詞的意义的客观眞实性。他們認为社会上的阶級斗爭，資本主义世界中的一切罪恶、卑鄙行为都是由于詞造成的。其中代表人物之一的切斯就講得非常露骨："許多关于社会和哲学的問題是沒有意义的。例如什么是眞理？什么是經济价值？什么是无产阶級社会？劳动創造剩余价值嗎？等等。""激进分子仇恨資本主义，但这种猛兽是根本沒有的，他們所仇恨的是莫須有的东西。正如他們仇恨魔鬼一样。""'資本主义'和'原則'都是語言在我們头脑中創造出来的，并且通过語言而把它們实物化了。"②

切斯为了維护資本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利益，不惜千言万語地否定資产阶級的罪恶事实的存在。当西班牙的爱国志士为自己祖国的自由独立而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爭时，切斯却宣称"法西斯主义"这一概念在現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美国丹籌姆教授指出切斯关于"法西斯主义"概念的空談是企图麻痹人民反法西斯斗爭的意志。③

牛津大学教授柯烏尔在他的著作《社会理論概要》中也認为"阶級社会"这一概念是沒有任何意义的抽象概念。他企图証明在資本主义国家中不存在敌对阶級，工人不应該反对資本家，而应該象亲兄弟一样生活在一个世界中。④

够了，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这些"理論"家們是一付什么嘴臉，是站在什么立場上講什么話。布魯金說得好："他們追求一个目的：从理論上替資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作辯护，毒害劳动人民的意識，使他們离开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爭。"⑤

詞、意义、客观存在三者之間的关系历来是哲学家、語言学家关心的問題。馬克思主义者認为詞的語音外壳与事物之間是任意的非必然的联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过："物的名称是和物的性質全然沒有关系的。"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詞沒有固定的实在的內容，可以听憑人們任意創造，今天可以用"zhuozi"这个音組称桌子，明天又可能是指椅子。詞的語音外壳虽然同事物沒有必然的联系，但語言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經过"約定俗成"、为社会所公認的事实，集体中的每个成員都能共同理解和掌握詞的意义；这样語言才可能成为人类交际的工具。因此，詞的意义不是沒有眞实內容的。

辯証唯物主义認为物質是第一性的，客观世界可以認識也可以改造。代表客观事物的詞具有眞实的意义和內容。列宁在《哲学笔記》中說过："名称就是一种用以識別事物的記号，一种惹人注目的标帜，我用它来代替事物，說明事物，以便使事物能够完整地呈現在我面前。"⑦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一書中早就說过："观念、表象、意識的产生一开始就直接与人們的物質活动和物質交际——現实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⑧絕对不是語义学派所說的那样："名称不是事物，事物是沒有名称的和不可以言宣的。"⑨

詞的意义的标准是客观事物的現实性。客观事物是眞实的，反映和代表事物的詞也是具有眞实性的。人們对客观事物的認識程度和內容包括在詞当中。詞概括了事物最本質的最主要的起決定性的特征。詞反映了人們对客观世界的認識和解釋。由于客观事物規律是一致的，人类大脑对事物的認識和反映也相同，这样对于名称可以有共同的理解，因此人們有可能用語言作为交际工具。列宁在《哲学笔記》中写道："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話，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⑩

但是，馬克思主义語言学从来不否認个人对于語詞在理解上和使用上可以附有不同的主观色彩。由于

① 轉引自金仲华：《冷战头子的語言混乱》，《新观察》1960年第4期，10頁。

② 切斯：《詞的暴虐》，轉引自岑麒祥《語言学史概要》，科学出版社，1958年，311頁。

③ 见 Г. А. Брутян «Что такое 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и кому она служит»，俄文版，1954年，37頁。

④ 同上，37頁。

⑤ 同上，3頁。

⑥ 见《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論語言》，商务版，1959年，15頁。

⑦ 同上，58頁。

⑧ 同上，5頁。

⑨ 切斯：《詞的暴虐》，轉引自岑麒祥《語言学史概要》，科学出版社，1958年，311頁。

⑩ 见《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論語言》，商务版，1959年，56頁。

思想意識、阶級立場、文化教养、职业环境等的不同，对于詞的理解和使用也有不同。例如“原子能”“宇宙火箭”等名詞已經是家喻戶曉了，但是以一个普通人同一个專門科学家相比較，对这两个名詞的理解自然有程度的不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級对同一詞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在过去一提起“皇帝”“貴族”这些詞，就联想到“尊严”“权势”“富貴”这些概念，在今天則同“剝削”“野蛮”“封建”“落后”“革命对象”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过去提到“工人”“劳动”，則同“貧穷”“苦难”联系在一起，而今天則給人一种“光荣”“偉大”“驕傲”的感覺。显然，这些詞体現出了阶級立場、阶級感情的不同。毛主席說过：“一切客观世界的辯証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認識中来。”① 因而詞的意义不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詞的意义的改变受到自然界和社会中事物的发展变化的制約。

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在詞义的理解上常常夸大主观因素的作用，否定或忽視客观因素的真实性。我們則認为語言中的客观因素是第一性的，是主要的、本質的，而阶級、个人对于語言的主观因素的作用是依从的，是次要的、非本質的。主观因素是受着客观因素制約的。

阶級对于語言的影响除了用自己的專門术語和用語强加进語言中去以外，还表現在对詞义的不同理解上。特别是有关政治、經济的一些詞和語，不同的阶級总是从本阶級的利益出发去解釋和理解詞和語的意义。

毛主席在談到“人民”这一詞的意义时，曾經說过：“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內容。”② 接着，他根据我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不同情况，指出什么人是敌人，什么人是人民。在談到“百花齐放、百家爭鳴”这两个口号时，毛主席英明地指出：“百花齐放、百家爭鳴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沒有阶級性的，无产阶級可以利用它們，資产阶級也可以利用它們，其他的人們也可以利用它們。所謂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級、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③ 毛主席“根据我国宪法的标准，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張”，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作为辨别“香花”“毒草”的准則。

只有工人阶級及其政党才能具有先进的世界观，掌握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眞正地認識眞理。只有工人阶級对于一些詞和語的解釋才是合乎客观事实，合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

在前一个世紀，欧洲的許多庸人因为受神甫多年毁謗唯物主义的影响，将“唯物主义”一詞作了极其歪曲、庸俗的解釋。恩格斯在《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一文中曾經严厉地批判道：“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饕餮、酗酒、虛荣心、荒淫、爱錢、吝嗇、貪婪、投机倒把，簡言之，就是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而唯心主义在他們看来則是信仰美德，爱好全部人类以及一般信仰‘美好世界’——他在别人面前高喊这个美好世界，但是他只有在醉后头痛或破产的当儿，就是說只有在他因自己通常‘唯物’过度享受而感到不快的时候，才相信这个‘美好世界’。庸人所爱的諺語是：人是什么？半是野兽，半是天使。”④

显而易見，那些庸人与馬克思主义者在“唯物”与“唯心”这两个名詞的理解上有着多么大的区别！

我們知道，当馬克思、恩格斯奠定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說，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曾經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名詞之間費过一番选擇，終于毫不怀疑地选擇了后者。因为当时一些資产阶級社会流派也盗用“社会主义”的称号，“弄髒”了这个字眼。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的德文版序言中写道：“在1847年間，社会主义是資产阶級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則是工人阶級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是在大陸方面——是个很合礼节的东西，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們当时已經十分坚决認定‘工人阶級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們也就絲毫沒有怀疑究竟在这两个名称中間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們也根本沒有想到要把这个名标抛弃。”⑤ 因而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

在无产阶級与資产阶級的斗爭中，資产阶級惯于盗窃革命的称号，使用革命的詞句欺騙人民群众。在俄罗斯取得革命胜利的前夕，資产阶級临时政府的总理克倫斯基也自命为“社会主义者”，列宁在1917年4月写的《我国革命中无产阶級的任务》一文中揭露道：“劳动派的代表和‘也是社会主义者’的克倫斯基，除了以响亮的詞句来麻痹民众的警惕心和注意力之外，是不起絲毫別的作用的。”⑥

① 《毛澤东选集》，第一卷，294頁。

② 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社会主义教育課程的閱讀文件汇編》，第一編上册，人民出版社，1958年，13頁。

③ 同上，30頁。

④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中文版，375頁。

⑤ 同上，第一卷，5頁。

⑥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28頁。

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机会主义者曾經利用“批評自由”这一口号向馬克思主义进攻。列宁当时指出：“自由是个偉大的字眼，但是人們在工业自由的旗帜下进行过最带侵略性的战争，人們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掠夺过劳动者。‘批評自由’的現时用法，也含有同样的虛伪性。”他接着指出：“不过，要請你們放开我們的手，不要拉住我們，不要弄污自由这一偉大的字眼，因为我們也是可以‘自由’走往我們所願去的地方，我們不但可以自由去与泥潭斗爭，而且还可自由去与轉向于泥潭里去的那些人斗爭。”①

在反动阶級混淆視听、顚倒黑白的情况下，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事实不是漠不关心，而是积极地起来作斗爭，无情地揭露反动政治家們在漂亮詞句掩飾下的丑恶；同时将詞語的意义解說得合乎客观事实，合乎无产阶級的要求。列宁在談到“革命”民主制这个詞时，曾經指出：“你們如果想援引‘革命’民主制这个名詞，那你們就要把这个概念与在資本家內閣下面的改良民主制区别清楚，因为現在該是抛弃所謂‘革命民主制’的空談，抛弃那种用‘革命民主制’这一名詞来互相庆賀的行动，而按馬克思主义和一般科学社会主义所教导我們的那样来作阶級的品評的时候了。”②

反革命派为了欺騙群众，总是有意地玩弄詞句的把戏，尤其恶劣的是除了往自己的瞼上貼金抹粉以外，还用最骯髒的詞句、最恶毒的字眼投向革命派，投向共产党。在俄罗斯十月革命前夕，反革命派策烈鉄里之流将自己的反革命行为称为“革命”、“自由革命”，斯大林在引用这些人的話时，总要加上括号，“应讀为反革命”。③无独有偶的是中国的蔣介石也是这样。他作了一輩子反共反革命的血腥勾当，在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匆匆忙忙在洛阳发表了一篇声明，即所謂“对張楊的訓詞”，声明中說什么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圍。他的所謂“反动派”系暗指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当时毛主席义正詞严地駁斥道：“可惜蔣氏沒有說明他所謂‘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蔣氏字典中的‘反动派’三字作何解釋。”“不过人民叫作革命派，蔣氏則叫作‘反动派’罢了。”④

即令是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今天，这种顚倒黑白，竄改意义的詞句游戏仍然屢見不鮮。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中，許多右派分子都是披着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漂亮詞句的掩飾下向党猖狂进攻。例如右派分子写匿名信恐吓当时国务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的时候，无耻地咒罵道：“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和党外人士的牆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現在还敢为虎作倀，眞是无耻之尤。”右派分子将共产党比作“虎”，将拥护党的人叫作“倀”，这和我們正常的理解“为虎作倀”的意义完全不同。难道写信者不了解“为虎作倀”这一成語的意义？不是的。他們非常了解这个成語的意义。問題是他們的立場、思想和我們的不同。《人民日报》社論及时地指出了这点，并且按照我們的意思給“为虎作倀”一語作了正确的解釋：“把盧郁文的发言說成‘为虎作倀’，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們心目中的‘老虎’了。共产党在領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勇猛，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使他畏惧、屈服。”⑤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論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的时候，广大的工农群众和革命的知識分子都感到痛快和高兴。但有一小部分人却发出了不同的論調。例如顧执中之流就說什么“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有些右”。在这两个句子中，他們对“群众”“左”“右”三个詞的概念同我們所理解的大不相同。我們所說的左，正是他們的“右”，我們所說的右，正是他們的“左”，我們所說少数右派分子，正是他們的“群众”。《人民日报》說得好：“在这里，眞可以說沒有共同的語言了。”⑥这句話正确地解釋了語言与阶級、思想意識的关系。阶級立場、思想意識的不同，在解釋詞义、运用語言材料表达思想时也是截然不同的。

語言作为交际工具是沒有阶級性的；但是在社会阶級斗爭中，使用語言的人們是有阶級性的，这样我們就不能不估計到語言在阶級斗爭中的作用。如果我們十足的書呆子气，認为語言沒有阶級性就忽視或否認語言在阶級斗爭中的作用，那就会犯不可饒恕的錯誤。因此馬克思主义語言学不仅要研究語言的全民性，也要研究語言在阶級斗爭中的作用。

---

①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182－183頁。

② 同上，67頁。

③ 《斯大林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204頁。

④ 《毛澤东选集》，第一卷，244頁。

⑤ 《人民日报》社論，1957年6月8日。

⑥ 《人民日报》社論，1957年6月29日。

从《矛盾論》来看汉語語音的發展

張世祿

一　关于語音的本质問題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本身的內部矛盾。不同性質的事物，包含不同性質的矛盾。汉語語音发展的历史，一定有語音本身所包含的特殊矛盾作为它的根本推动力。語音本身所包含的特殊矛盾是什么？这就是語音本身的性質問題。

語音是語言的物質基础。作为人們重要的交际手段的語言，一定要通过語音才能够体現和发揮它的交际功能。語音在人們交际的活动当中，是作为語言表示意义和辨别意义的外部形式。語音之所以成为語言的外部形式，就是由于它本身的物質性。

語音和其他各种声音，有本質上的区别。語音屬于第二信号系統，同語言的內部意义相互紧密地联系着。人們在运用語言的时候，一定要求語音具有表示意义和辨别意义的明显性。語音之所以成为語言的外部形式，也是由于它本身的社会性。

作为語言的物質基础，語音在人們交际的活动当中，又有器官的和听感的两方面的意义。語音一方面是人們发音器官活动所产生的，另一方面又是人們听觉上所感受的結果。在发音方面，为着节省器官活动的劳力，往往要求发出的語音簡單些、容易些；在听受方面，为着了解語言內容的意义，又要求发出的語音准确些、清楚些。这样，发音方面簡易化的趋向和听受方面对語音明晰化的要求，往往造成一种矛盾。

人們既然利用語言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所以一定要求語言內容的丰富和精密，并且有适当的外部形式把各种意义明显地表示出来，辨别出来。但是語言的意义是反映着客观的事物，有它的无限性，而語音是发音器官活动和听觉上感受的結果，它的种类和相互結合的形式，总是有限制的。这样，語言內容的无限丰富和精密，又同語音种类及其結合形式的局限性成为一种矛盾。实际上，人們把語言当作一种工具来使用，对于它的外部形式也往往要求适当的簡易化，以避免过于繁复而不便应用。

总起来說，語音用来构成語言的外部形式，具有两种根本的性質，就是它的物質性和社会性。由于这两种性質，語音本身包含着一种內在的主要矛盾，就是发音簡易化的趋向和示意明显化的要求这两方面的矛盾。种种語音变化的規律和汉語語音发展的趋势，它們产生的根本原因，都是由于这两方面互相矛盾和互相推动。

二　一般語音变化的規律

所謂一般語音变化的規律，通常是指一般語言当中最常見的几种音变現象。例如音的同化，就是两个不相同的音，連在一起，由于相互影响而变为相同的；音的异化，就是两个相同的音，連在一起，由于互相影响而变为不相同的。这两种音变的現象是相反的，而同是由于发音簡易化和示意明显化两方面互相推动的結果。又如音的减少或失落和音的增加或附添，也是两种相反的音变現象，也同是由于发音簡易化和示意明显化两方面互相推动的結果。其他如音的强化和音的弱化，音的交替或轉換等，也都是如此。

由于語音具有社会性，我們不能單从物質性方面来說明种种語音变化的发生原因。單認为語音是发音器官活动的結果，它的变化也必須受器官机能的支配，因而把語音变化的主要原因归結于“加力作用”和“减力作用”两方面的矛盾，①这样的看法实在是片面的。語音也屬于社会現象之列，同整个語言一样地要受社会的制約。語音的变化，也是屬于語言发展的历史范圍，并且服从于一般語言发展的規律的。

語言是逐渐变化的。語音的变化是通过新質要素的逐渐积累、扩大和旧質要素的逐渐消失、縮小来实現的。例如汉語史上的卷舌音声母，是逐渐产生和形成的。“疑母”、“微母”的消失，也是采取漸变的过程。語音的变化，在汉語史上大都是由局部带动全面。

語言里的各个构成部分和各种要素的发展速度都是不平衡的。作为語言的外部形式的語音，在各个音

① 参看甘世福《論語音变化的原因》，《中国語文》1956年11月号，10－17頁。

素、各个音节以及各个詞語形式彼此相互之間的发展速度，也都是不平衡的。例如汉語史上的全濁音声母，到了中古以后逐渐变为清音；可是次濁音声母，或者保持着不变，或者变为全濁，或者整个失落。在各个地区之間，以及同一地区內部語音和讀書音（即白話音和文言音）之間，語音发展的速度也是不平衡的，因之有各种方音的差异；同一方音区域內，也往往有口語音和讀書音的差异。

語音的变化，也同整个語言的变化一样，代表着一定社会里在一定历史阶段当中的共同的傾向性。某一类的音素、音节或者詞語形式，在某一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当中，常常具有某种变化的傾向。例如汉語史上的鼻音声母，如"娘母""微母"等，中古以后有消失的傾向；全濁声母有清音化的傾向；[-m]韵尾有变为[-n]的傾向；等等。語音的变化，同語法、詞汇一样，正是根据于社会傾向性的規律的。

因之，一般語音变化的規律，不仅是指音的同化、异化，音的减少、增加，音的强化、弱化，音的交替、轉換等一般常見的音变現象，同时也应該包括一般語言发展的几种基本規律——逐渐变化的規律，各方面发展速度不平衡的規律，社会傾向性的規律。語音，同整个語言一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但同时又有它自己的特殊性，有它自己的內部发展規律。

三　語音交互影响和交錯变化的現象

語音之所以有它自己內部的发展規律，就是根据語音內部所包含着的本身特殊矛盾性。差异就是矛盾，每一差异中都包含着矛盾。例如，声母和韵母，元音和輔音，鼻音和口音，清音和濁音，强音和弱音，前元音和后元音，高元音和低元音，开口呼和合口呼，硬音和軟音，閉音节和开音节，阴声韵和阳声韵，复元音和單元音，复輔音和單輔音，复音节和單音节，音調上的高音和低音，音勢上的重音和輕音，音量上的長音和短音，阳調类和阴調类，平声和仄声，等等，都是互相矛盾的对立現象。这种矛盾現象对立的各方面，在处于統一体內，又互相联結，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互相轉化。

由于語音是发音器官活动的結果，有些音为着适应发音器官的活动，便于互相联結；又有些音却不便于連在一起，因而产生互相排斥的現象。例如，卷舌音的声母，同[i]这个元音或者以[i]做韵头的韵母有不相容的趋势，如果連在一起，一定要起变化。近代汉語史上，卷舌音的字里，[i]音大都被吞沒，因之原来属于齐、撮呼的，变为开、合呼了。可是，其他几类輔音的声母，同[i]音或者以[i]音做韵头的韵母連在一起的时候，有些保持着不变，有些又受[i]音的同化，由硬音变为軟音。[ki]──→[tɕi]；[tsi]──→[tɕi]；原来的"見系"和"精系"，都变成現代的"j，q，x"一組的音了。又如高元音和低元音連在一起，也容易起变化：[ɑi]──→[ei]；[ai]──→[ei]：原来"佳、皆、灰、咍"这些韵的字，有一部分变成近代的"齐微"韵里的字了。这就是声母和韵母，音素和音素交互的影响，因而发生变化的。又如，清、濁声母的区别，是关于阴、阳調类的分化：原来清音声母的平声，变成現代的阴平調；原来濁音声母的平声，变成現代音的阳平調；原来全濁声母的上声字，到現代音里又归并到去声一調里去。这又是声母和声調交互的影响，因而发生这样的变化。

同时，語音同整个語言其他要素一样，也屬于社会現象之列，語音的变化也要根据于社会傾向性的規律。某一种音素、音节或者某一类詞的形式，在同一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里，常常有相反的发展傾向；这就是說，在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里，同一类詞的形式当中某种矛盾現象两方面的互相轉化，常常有相反的傾向。例如"知、章(照三)"两系的字，从上古到中古，声母是朝着舌面前化的方向发展的：

[ti]──→[ȶi]──→[tɕi]；

可是，从中古到現代，又是朝着卷舌化（即硬化）的方向发展的：

[tɕi]──→[tʃ(i)]──→[tʂ-]。

这是一种交錯变化的現象。又在同一历史阶段里，两类不同的詞的形式，也常常有相反的发展的傾向；这就是說，在两类不同的詞的形式当中某种矛盾現象两方面的互相轉化，也常常有相反的傾向。例如，"江韵"的字，从上古、中古到現代，元音是朝着低化的方向发展的：

[oŋ]──→[ɔŋ]──→[ɑŋ]([aŋ]，[iaŋ])；

可是，"歌、戈韵"的字，从上古以来，又是朝着元音高化的方向发展的：

[a]──→[ɔ]──→[o]([ɤ])。

这又是一种交錯变化的現象。

語音交互影响和交錯变化的現象，是根据于語音本身的物質性和社会性而产生的，也是由于发音簡易化和示意明显化两方面互相推动的結果。

四　汉語史上語音发展的主要趋势

語音交互影响和交錯变化的現象，也就是語音里种种矛盾現象各方面的互相联結、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互相轉化的过程。在汉語語音发展的历史上，这就具体地表現为下列的几种主要趋势。

1）零声母的字的增多。根据語音减少或失落的規律，汉語上古原来有声母的字音变成为零声母的了。“喻母”的字，原来是从“匣母”和“定母”当中分化出来而并合成的；換句話說，中古时代可以确定为零声母的“喻母”字，原来是由“匣母”当中[(ɣi)-]音和“定母”当中[d(i)-]音分别失落的結果。到了近代，“疑母”字的[ŋ-]音，大部分消失，小部分变为[n(i)-]；“微母”字的[m-]音，也是經过鼻音的消失（变为[v-]）而成为以[u-]音为起首的字了。“日母”字当中，有的因为受卷舌韵的影响，声母失落而形成“儿韵”的字。这些现象都說明了零声母增多的趋势。

2）开音节的字的增多。汉語里原来有韵尾輔音的阴音节的字，不少由于韵尾輔音失落了或者轉化成为元音韵尾，就成为开音节的字了。阴声韵的字，在上古时候，絕大部分应当是有收尾音[-g] [-d] [-b]的，到了中古时，这些韵尾輔音失落或者轉化为元音，阴声韵的字也成为开音节的了。入声韵的字，在中古时候，还是有收尾音[-k] [-t] [-p]的，到了近代，这些韵尾輔音失落了或者轉化为元音，入声韵的字也成为开音节的了。这些现象都說明了开音节字增多的趋势。

3）韵尾种类的减少。由于几种韵尾的失落，整个韵母系統中收尾音的种类也大大地减少了。到中古时代，韵尾的元音，一般測定只有[-i] [-u]两种。到了近代，入声韵尾[-k] [-t] [-p]失落了或者轉化为元音韵尾，同时韵尾鼻音的[-m]并合到[-n]当中，所謂“閉口韵”不存在于现代音的系統当中了。这些现象又都表示着韵尾种类减少的趋势。

4）鼻音声母的消失。现代音里的鼻音声母，只有[m-]和[n-]两种。“疑母”[ŋ-]的音，除一小部分变为[n(i)-]以外，其余大部分已經消失了；“微母”[ɱ-]的音也逐漸地完全消失了；“日母”[ȵ(i)-]的音，除了一部分变为“儿韵”[ɚ]的單元音以外，又經过鼻音消失或卷舌化作用变成为[ʐ-]的音了。这些现象又都表示着鼻音声母消失的现象。

5）全濁声母的清音化。全濁声母[b-] [v-] [g-] [d-] [dz-] [z-]等音，即“并、奉、群、定、从、邪”等母，现代音里都成为清音声母，大抵全濁声母屬于塞音、塞擦音的平声字，归并于次清：[p'-] [k'-] [t'-] [ts'-]等；仄声字，归并于全清：[p-] [k-] [t-] [ts-]等；屬于擦音的，統統归并于相当的清擦音：[f-] [s-]等。这些都表示着清音化的趋势。

6）韵母中元音的混同化。在中古时代，韵母中的元音，分别很細，到了近代，一般有混同化的趋势。例如“寒、刪、仙、先”四韵的分别，在于主要元音上：[ɑn] [an] [ɪɛn] [ien]，到了近代，只有[an]和[iɛn]两个韵母了；“桓、刪、仙、先”四韵的分别，也是如此：[uɑn] [uan] [yɛn] [yen]，到了近代，也只有[uan]和[yɛn]两个韵母了。又如“豪、肴、宵、蕭”四韵的分别，也在于主要元音上：[ɑu] [au] [ɪɛu] [ieu]，到了近代，也只有[ɑu]和[iau]两个韵母了。这些都表明韵母中元音混同化的趋势。

7）音节結构中元音的占优势。由于字音起首的輔音（声母）和韵尾的輔音，有很多失落了或者轉化为元音，所以到了现代語里，显然在音节結构中元音占着优势。又上古音里，我們可以肯定有复輔音的声母，到了中古时，复輔音都已經單化了。这也足以表明音节結构中輔音成分减退的趋势。

8）音节結构的規則化。复輔音的單化，韵尾的失落和簡化，元音的混同化和复元音种类的减少，都使得音节构造的規則趋于單純化。现代普通話語音的音节結构中，作为起首輔音的有二十一个（即二十一个声母），作为中介元音的只有[i] [u] [y]三个，作为主要元音的有[ɿ] [ʅ] [i] [u] [y] [a] [o] [ɤ] [e] [ɚ]十个，作为收尾元音的只有[i] [u]，作为收尾的輔音只有[n] [ŋ]两个了。关于音节构造的規則，比起古音和其他方音来，现代普通話語音里要單純得多了。

9）声調种类的减少。声母的清、濁是关乎阴、阳調类的分别的。中古音的平、上、去、入四声，依据声母的清、濁，应該分做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八調。到了近代，入声的两調統統归并到平、上、去三声当中；上、去两声的阴、阳調，也由于全濁声母的清音化，都合并起来了；只有平声分阴、阳，还留着一点遺迹。所以现代普通話語音里，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調了。

10）詞語形式的复音化。詞的形式就是語音，所以对于語音研究的范圍，不应局限于單个音节內部的結构，而应該包括着整个詞語的形式。汉語史上复音詞增加的趋势是很显著的，原来有許多單音节的詞，到了近代变成为复音节了，这不仅是詞汇形式的变化，而且也是語音方面的重要发展。

11）构詞形式的多样化。构詞的形式，也随着詞語的复音化而有新的发展；最显著的，就是构詞方式的多样化，构詞成分（前綴、后綴等）种类的增加。近代“儿化韵”的形成，也是构詞形式影响于語音发展的现象。所以构詞形式的多样化，也是屬于語音方面的重要现象。

12）詞語上輕重音区别的加强。随着詞語的复音化，在詞語里前后輕重音的区别，也更加显著起来。

在詞語里各个音节的声調，也常常在重讀的音节中才显現出来；輕讀的音节便成为"輕声字"，原来的声調也湮沒了。从这种現象看来，我們可以斷定汉語語音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声調区別逐漸減退、輕重音区別逐漸加强的趋势。

以上所說汉語語音发展上种种发展的趋势，就是現代普通話語音及其系統所以形成的历史原因。这也就是根据于一般語音变化的規律，在語音內部的种种矛盾現象交互影响和交錯变化的結果。至于其根本原因，却是在发音簡易化和示意明显化两方面的互相矛盾、互相推动。大致地說，上面所列的十二种趋势，前九种是偏重于語音簡易化的方面，后三种是偏重于示意明显化的方面。这两方面的矛盾，就是使得汉語語音不断发展的根本推动力。

五　汉語語音的发展和汉民族历史的关系

任何事物的变化，必定有它的內因和外因；內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內因而起作用。汉民族历史上的几次大变化，如东汉帝国的瓦解和五胡十六国的变乱，辽、金、元的統治和当时民族的大迁徙，鴉片战爭和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建国以来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都促进了或者正在推动着語言和語音的发展。汉民族历史上的大变化是語音变化的外部条件，不能用来十分具体地說明汉語語音种种发展的由来，但是在加速和推进它发展的过程当中，就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汉民族历史上的几次大变化，可以作为汉語語音发展历史上的划分时期的明显标志。同时語言和語音的发展对于汉民族历史的推进，也起了很大的反作用。这样的認識，对于当前語言規范化的工作，有其实际的意义。現代汉語語音的規范，即普通話語音，是語言历史上形成的，是按着語音本身的內部发展規律而发展起来的；而当前祖国社会主义的建設，加倍地需要語言的規范化，更需要加速进行語音的規范化。因之，汉語語言規范化的工作，就成为当前祖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編出現代汉語教材

山东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語言教研組全体教师为了适应教育革命的要求和兄弟院校对汉語教材的需要，并向五月省文教战綫上的群英大会献礼，在院党委和系党总支的直接領导与全力支持下，从三月下旬开始，同三十多位同学合作，經过了三十五天的奋战，編出了一部四十三万字的現代汉語教材。

这部教材是編者在进一步明确了教育为无产阶級政治服务、为生产劳动服务的方針，并吸收了原講义及兄弟院校教材的优点之后編成的。全部教材包含："緒論、党的語言文字政策、語音和正音法、文字和正字法、語法、詞汇、修辞"。这部教材在編写中注意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說和毛澤东思想为統帥。結合汉語实际闡述了馬克思主义关于語言的起源、发展和語言的社会本質等基本原理，把党的語文政策列为專章，突出地闡发了毛主席的語言理論，从而比較集中地講述了汉語規范化、推广普通話、汉字改革以及改进文風等問題。此外，在結合語文政策的理論和实踐的同时，还着重地批判了各种唯心主义学說和一些对方針政策的錯誤認識，使学生在两种思想的斗爭中树立了正确的观念。

（二）注重了学以致用的精神和理論联系实际的原則。比如語音部分，为了加强培养学生口头表达的能力，扩大了"朗讀"的內容，并将它和"語調""声調"两章一并提前，使說話教学統攝全編；語法部分詳于句法，略于詞法，加强了虛詞的运用、單复句复杂結构的分析、范例与錯例的分析；詞汇、修辞部分除增加了对語言風格的研究以外，詞汇以詞义辨析、同义詞、反义詞、成語等的修辞作用为重点；修辞中結合"篇章結构"增加了"文章分析"一章，根据各种不同的文体比較全面地、具体地說明了文章的准确性、鮮明性和生动性。

在各部分，为了突出"实踐課"的特点，都編制了較为丰富的思考題、討論題和練习材料，并注意了它們的目的性和多样性。

（三）增强材料的思想性和文学因素。例証的选材的主要来源是毛主席的著作和党的文件、《人民日报》和《紅旗》等重要报刊及中学語文課本；此外，还有优秀的文艺作品及人民的口語材料（如民歌、民諺等）。例証的选取，尽量采用成段的文章，这样既便于从言語行为的整体中观察并分析，詞、句、段等，也增强了文学因素，密切了与文学課的結合。

（曲阜师范学院通訊組　曹一清　汪意迪）

論聾啞人的語言与思維

——評高名凱教授《語言与思維》一書的几个論点——

洪雪立

一、"聾啞"与"啞叭"的性質是不同的

最近由于几位聾人朋友的催促，抽空讀了高名凱教授《語言与思維》一書。高先生講到沒有語言就不可能进行思維的道理时，在引証了斯大林关于聾啞人思維的特点的論述之后，肯定地說"啞叭"不能說話，只能有形象思維，不能够有抽象思維。他說："啞聾的人显然有很多的概括化了的形象思維，我們平常說他們很灵动，指的就是說他們有丰富的观念讓他們去反映客观世界，去对客观世界产生反应。但是啞聾的人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世界观、哲学、唯物辯証法'等概念。他們的思維，因为缺乏語言的材料基础，不可能发展到抽象思維的阶段。"①高先生这样論断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許多聾人朋友对这說法表示不能同意。我們聾啞教育工作者根据日常观察所得也不能同意高先生这种說法。

一般人常把"聾啞"和"啞叭"一样看待，这是不对的。从現代生理学、解剖学来看，两者的生理病理有性質上的区别。高先生使用"啞叭"这个詞来称呼一切有言語障碍的人，是不恰当的。为了探討聾啞人語言与思維的問題，有必要弄清楚"聾啞"和"啞叭"的区别。

根据巴甫洛夫关于分析器的学說，每种分析的細胞不是均匀地分布在大脑皮层上面，而是一部分密集于大脑皮层的一定区域，构成分析器的核心部分。另外一些細胞分散在其它区域。因此，各个分析器細胞既有集中又有分散，这样便形成了大脑极其精致复杂的結构。大脑左半球的額叶下緣回轉部的后方是語言运动細胞密集的区域，所以被称为語言运动中樞。而顳叶上緣回轉部的后方則是語言感覚細胞密集的区域，所以被称为語言感覚中樞。如果大脑的額叶机能损伤，就不能够运用自己的发音器官来說話，这种病症叫做"运动性失語症"。如果大脑的顳叶机能損伤，就丧失了語言听取能力，这种病症叫做"感覚性失語症"。这两种失語症的共同特点都是听覚机能沒有任何损伤，发音器官也完整无缺，不能說話和不能听話是基于大脑皮层相应区域发生病变。这两种失語症患者才是眞正的"啞叭"。

一些先天致聾或者幼儿时期致聾的，他們不可能在生活实踐中学会說話。因聾而不会說話是比較普遍的現象，跟上面所說的失語症患者眞正的"啞叭"有本質上的差别。因聾而不会說話的人发音器官并沒有毛病，他們不会說話的原因只是耳聾。先天耳聾的孩子也象能听的孩子一样，会叫喊，咿呀出声，呀呀学語。但是因为耳聾听不見别人的說話，自己的发音能力得不到发展，就停止了呀呀学語而变成不会說話了。不但先天聾，或者幼儿聾都会因此而使发音能力的发展受到挫折，变成不会說話。就是少年期致聾的人，如果他們不經常說話，也会使自己語音的清晰性、准确性起变化，使人听不清楚他所說的話。成年人听覚机能遭受严重破坏之后，也会使他們的語音发生或多或少的障碍。这些都說明发音器官对于听覚机能活动存在着依附关系。由此看来，由于大脑皮层額叶或顳叶的机能損伤而引起的言語障碍，跟听覚机能損伤而引起的言語障碍是有着性質上的区别的。前者是大脑皮层語言中樞发生病变，引起不会說話，可以称为"啞叭"，而后者生理上的缺陷是耳聾，不能說話只是附带的心理上的現象，通过教育矯治可以轉变，因此，对这种現象只能称"聾"，不能叫"啞"。

至于在斯大林的《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一书中所称的"啞聾"一詞，是翻譯上的問題，事实上俄語глухонемой跟汉語"聾啞人"的意思是一样的，是用来指因聾而不会說話的人。

---

① 高名凱：《語言与思維》，三联书店，1956年，37頁。

"聾啞"是旧时代遗留的現象，新中国聾啞学校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領导下，自1954年开始重点实驗口語教学，使聾啞儿童从不会說話到会說話。实驗工作表明聾啞儿童掌握有声語言是完全可能的。这些实驗于1956年經过总結并在全国范圍內推广了，从此我国聾啞学校便以教会聾啞儿童掌握有声語言为自己的任务之一。几年来全国聾啞学校在新招的班級中实行了口語教学。随着口語教学的发展，聾啞儿童掌握有声語言逐漸普遍。

二、聾哑人有沒有抽象思維？

新的一代聾啞人可以掌握有声語言，他們可以在語言材料基础上掌握抽象思維是沒有疑問的。但是老的一代聾啞人确实沒有掌握有声語言，不能說話。这些沒有掌握有声語言，不能說話的聾啞人有沒有抽象思維呢？是不是象高先生所說的他們"不能有'社会主义''世界观''哲学''唯物辯証法'等概念"呢？他們的思維是不是"只停留在形象思維的阶段"呢？我們回答說：不是的，眞实情况并不象高先生所論断的那样。事实上，沒有掌握有声語言的聾啞人不但能够拥有"社会主义、世界观、哲学、唯物辯証法"等概念，能够运用这些概念进行思維，而且还能依据这些概念进行艺术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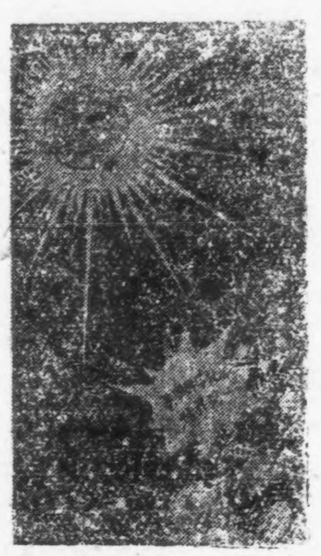
現在就无数事例中提出两个例子来說明：

第一个例子是《漫画》半月刊編輯部編輯顧朴同志和他的作品。顧朴同志現年35岁，上海人。幼儿期患脑膜炎致聾的，不会說話。8岁时进入上海聾啞学校，18岁結业。在这期間掌握了相当高小的文化知識。旧中国聾啞学校只有手势教学，他学了十年并沒有掌握有声語言，不懂得发音是怎么一回事。然而他却在中国人民艰苦斗爭的年代，参加了革命，成为一个优秀的革命工作者。为了說明問題，这里不妨簡略介紹一下他的經历。

顧朴同志在日本侵占上海的期間 接触了进步書刊《上海周报》和《学习》等杂志，讀了《西行漫記》《政治經济学》《二万五千里長征記》等書，从而認識了共产党，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号召，受到馬列主义的思想启发。1942年入伍，参加新四軍苏北敌后根据地工作。后因精兵簡政，又回上海搞地下工作。到1946年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員。我們能够說他只有"概括化了的形象思維"而沒有抽象思維嗎？我認为不能这样說。当时参加革命工作要有一定的思想覚悟、民族覚悟和阶級覚悟，沒有抽象思維，沒有一番从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認識活动过程，那是不能想象的。

顧朴同志酷爱繪画，解放后他就以漫画为武器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工作。他的漫画作品經常为各大报刊如《人民日报》《中国工人报》《解放軍报》《北京日报》和《漫画》半月刊所采用。苏联《鱷魚》画报也发表过他的作品。現在选擇他的两幅作品請大家看看。按发表的时間排列如下：

右面这一幅題为"告吹"的画，載1957年10月《漫画》半月刊。当苏联第一顆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之后，作者用吹肥皂泡来諷刺美国的科技"世界第一"。



告吹　顧朴

下面題为"連鎖反应"的一幅画載1958年3月《人民日报》。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鬧經济危机，他們都企图把灾难轉嫁別人，企图用这办法来摆脫自己的危机，因此引起了連鎖反应。作者用画笔加以諷刺。



連鎖反应　顧朴

漫画是概括性的語言的表达，我們能說他只能依靠"概括化了的形象思維"，而不运用抽象思維嗎？我們能說沒有一定的政治修养的人就可以画出这些漫画嗎？我認为不能这样說。沒有"經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眞，由此及彼，由表

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毛主席語），是不可能以簡單的画笔，朴素的标題，反映复杂的对象的。

第二个例子是无錫市聾啞学校教导主任宋鵬程同志和他的作品。宋同志也是35岁左右，江苏江阴县人。幼儿期患猩紅热致聾，不会說話。进入上海“福啞聾啞学校”，也是依靠手势語作为認識活动的手段，沒有掌握有声語言。結业后留校工作，十多年来他在聾啞教育崗位上起了一定的作用。1958年他为了更有系統的学习，考入无錫市业余大学，每学期考試各科学业成績都得五分。他和另一个聾啞人吳树德合編一部《聾人識字課本》（即将出版），也常作詩写文章。去年国庆节他写了一首長詩，来歌頌新中国的光輝十年，題为《聾人之歌》（《聾啞人工作通訊》拟刊登）。全詩共有八十二行，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只摘取下面一些句子：

> 十年前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迷茫地踯躅，
> 我的心情是那样的忧郁和頹萎；
> 四周投射过来冷漠与嘲弄的眼光，
> 刺激着受創的心灵，我激憤欲狂。
>
> 春天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事情，
> 我只听到自己的心弦在跳动，哀伤。
> 沙漠般的人間，空气也显得特別稀薄，
> 我就象石縫里的茅草，頑強地生长。
>
> ……………………
>
> 自从毛主席发出新中国成立的庄严宣告，
> 我的亲爱的祖国就春色滿园，万紫千紅。
> 受歧視受欺侮的日子已成历史上的陈迹，
> 残废人也永远摆脫了坎坷畸零的命运。
>
> 我們不再流浪街头为冷飯残羹受尽酸辛，
> 也不再象落叶般飘零无依，为西風嘲弄；
> 飢寒与貧困从此和我們絕緣，
> 东風細雨春阳培养我們健康地成长茁壮。
>
> ……………………
>
> 我們现在的生活多么美好，
> 我們的欢乐就象无边的海洋，
> 人人都在纵情地歌唱。
> 聋人的心里也都充滿了阳光。
>
> 过去不幸的遭遇梦样的飘逝，
> 一切邪恶已經和旧社会一起死亡，
> 东風继續压倒西風，
> 大地上的一切正在蓬勃发展，欣欣向荣。
>
> 我們的命运和党血肉相連，
> 沒有共产党人間就沒有了太阳。
> 我虔誠地向亲爱的党宣誓：
> 　　我永远跟着您，
> 　　亲爱的共产党！

这首詩也許不算好詩，我們只是用来說明高先生判断的錯誤。詩是“心声”，沒有掌握有声語言的聾啞人可以做詩，他要表达这心声，如果沒有語言作为凭借，当然是不可能的。

除了这两个例子之外，在聾啞人中还有很多画家、木刻家、教师和技术人員，这些人也是大部分沒有掌握有声語言，但是他們各有一定的專业知識，如果說他們沒有掌握有声語言就不能有抽象思維，那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但是这种事实怎样解釋呢？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聾啞人生理缺陷是听覚机能損伤，并沒有使大脑机能发生故障。他們的大脑和高級神經活动仍然是正常的，虽然他們的第二信号系統的发展受到障碍，但是他們并沒有丧失第二信号系統，他們的思維并不局限在第一信号范圍以內。这就是聾啞人能够发展他們的抽象思維的生理基础。

其次，聾啞人是通过手势、表情来和書面語建立联系，进而掌握書面語来发展自己的抽象思維的。他們思維的发展以掌握書面語为前提，就是說他們的第二信号是以視覚和动覚分析器的屬性为基础的。这种缺乏听分析器的屬性为基础的信号活动，当然有其局限性，但通过教育、培养和实际的生活經驗，他們的思維可以跟健全人一样，逐渐突破形象思維的范圍，过渡到抽象思維的領域。并不象高先生所說的那样：“啞聾的人所有手势、表情以及其他的反应都属于第一信号系統的范圍，正如沒有学会語言之前的儿童似的，啞聾的人也有思維，但这思維沒有越出形象思維的范圍。只有在語言的基础之上，人們才能够有抽象思維，才能够进行抽象思維”。① 高先生这种說法显然是片面的。

我們很难否認上面所举的漫画的語言和詩的語言不是建筑在語言术語詞句的基础上面的抽象思維吧？因而也很难否認沒有掌握有声語言的聾啞人是可以运用概念来进行抽象思維的。

为什么高先生会有那样在我們看来是錯誤的論断呢？我覚得这是因为：

第一，高先生在他的書里把人类語言的起源跟人类个体語言的形成和发展混为一談了。

第二，高先生对語言与思維的发展規律的理解是模糊的。虽然在他書里提到語言規律和思維規律的关系，但是沒有解决問題。

第三，高先生忽視了，或許可以說不了解形象思維

---

① 《語言与思維》，89頁。

和抽象思維的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关系，也就是第一信号系統和第二信号系統的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关系。

由于上面三大問題沒有解决，所以高先生对聾啞人的語言和思維問題就必然产生錯誤的判断。

三、个体語言与思維的形成和发展

我認为如果搞通人类个体語言与思維形成和发展的問題，那末，对聾啞人的語言与思維的关系就不致产生象高先生那样的看法。

斯大林在《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里强調有声語言对于人类社会进化的意义。他說：

> 历史上沒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卽令最落后的，能够沒有自己的有声語言。…有声語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助人們从动物界划分出来、結成社会、发展自己的思維、組織社会生产、与自然力量作胜利斗爭并达到我們今天所有进步的力量之一。①

斯大林說这番話是在批判馬尔等人的語言的起源是手势語言在先，有声語言随后的錯誤观点。自然也批判那些把人类社会語言的起源說成是沿着这样的路綫而发展起来的：“身振語——声音語——書記語”②的資产阶級語言学家的錯誤观点。

正如巴甫洛夫所强調的一样，他說：

> 第二信号，卽信号的信号。它們是现实底抽象化，并可借以进行概括，而这种概括，就构成了…人类特有的高級思維，这种思維首先創造了全人类的經驗，最后創造了科学。③

斯大林、巴甫洛夫所强調的都是正确的。如果我們学习他們的理論沒有体会他們說这番話时的用意，那就会把人类社会語言的起源跟人类个体語言的形成和发展混同起来。高先生說：“如果人家問：抽象思維和語言哪一个先产生？我們答复就是：抽象思維和語言是同时产生的。”④这說法恰好和高先生所引的比留科夫的“言語发展阶段性”相矛盾。

如果按照高先生的說法，那末开始掌握語言的儿童就同时掌握了抽象思維了；但是无数实驗告訴我們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为了弄清語言和思維的关系，首先要弄清人类个体語言的形成和发展的問題，因而也有必要談談儿童的語言形成和发展，以及他們怎样从形象思維发展到抽象思維。

語言的詞是现实的刺激物。它表現为三种形式：理解高声发音的言語是听覚刺激物又是視覚刺激物，閱讀書面語言是視覚刺激物，自己說話和書写語言时又是动覚的刺激物。巴甫洛夫特別强調动覚刺激，因为动覚刺激是肌肉运动由骨骼肌肉傳到神經系統的信号，对人类个体发展具有特別重大意义。但是由詞的声音和形状所形成的听覚和視覚的刺激作用也不能忽視。

語言的詞旣是现实的刺激物，任何語言的形成都是按照条件反射的原理进行的。

巴甫洛夫說：

> 条件反射的事实是每日发生的最普通存在的事实。很显然，我們对本身或对动物以不同的名詞所表现的活动，也可以认为是条件反射，比如訓练、訓育、培育、习慣等等皆是。⑤

人类个体語言形成与发展也不例外。正如比留科夫在《根据斯大林同志关于語言学問題的著作看巴甫洛夫关于第一与第二信号系統的相互作用的学說》一文所引的卞維林娜所說的話一样。她說：

> 把詞当作刺激物又当作反射行为来运用的、人所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統，使人可以用从具体的、感性的刺激中抽象出来的方法去发展較高級的思維。言語发展上的阶段性，也是符合思維发展上的这些阶段的。对于儿童的模仿語音及这种模仿在儿童言語发展上的作用的观察，可以提供給我們极丰富的材料。⑥

高先生虽然也引用了这一段話，而且也承認“我們也可以說語言是条件的反射”；可是他又說：“不过，一般的情形，狭义地說，我們不把語言說成条件反射，因为語言和形象的条件反射有本質上的不同：形象的信号是形象思維的担負者，語言是抽象思維的担負者。”⑦这就很难使人同意了。现在再引彼得魯舍夫斯基教授的一段話：

个体語言形成和发展的規律，大体說来有如下两个基本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儿童語言形成和发展是經过許多阶段的。綜合各家儿童語言发展研究者所提出的，儿童語言发展可分为下列六个阶段：卽語言准备时期，也叫

---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46頁。

② 川本宇之介：《人类进化与思想表现手段的发展》（聋教育学精說），1941年，东京版，383—393頁。

③ 巴甫洛夫：《动物高級神經活动底客观研究二十年的实驗》，从《巴甫洛夫学說与心理学的改造》轉引，中国科学院1953年版，294頁。

④ 《語言与思維》，45頁。

⑤ 巴甫洛夫：《大脑两半球机能讲义》，卫生出版社，25頁。

⑥ 《巴甫洛夫关于两种信号系統的学說》，科学出版社，76頁。

⑦ 《語言与思維》，80頁。

"叫声期";語言理解时期,也叫"喃喃期";語言原始形成时期;語言习得中期;語言习得后期和語言丰富时期。各个时期是錯綜地漸进的,是随大人的教育作用而轉移的。

第二个特点是儿童掌握語言发音的熟練技巧是从綜合开始,从粗糙到精細。語言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正确到正确。儿童到四岁半五岁时才能掌握比較完善的語言发音。

"儿童言語的形成是按照条件联系形成的規律进行的…是以反射性反复的方式…巩固下来的。"①

这就是人的語言发展的大体情形。儿童掌握到有声語言之后,除了那些因病致聾而变为不会說話者外,一般人是把这笔丰富財产享用于一生之中的。

个体思維的形成和发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斯大林說:

> 不論人底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产生,它們只有在語言的材料底基础上,在語言的术語和詞句底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完全沒有語言的材料和完全沒有語言的"自然物質"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②

斯大林說明了思想和語言是密切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但是我們不能忽視斯大林指的是掌握語言的正常成年人。因此,不能据此而得出凡是会說話的儿童都有抽象思維的結論。

儿童思維的形成与发展很早就开始,但不是一开始掌握語言就拥有抽象思維。

儿童在掌握語言以前,他的思維是在对象和現象互相作用的直覚感知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心理学上把这时期儿童的思維称为直覚的、动作的思維。

随着語言的发展,儿童的思維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学前的后期已拥有較多的經驗,不仅对于当前所知覚的事物进行思維,就是对于过去的和将来的事物也进行思維了。到了学龄初期,儿童的思維有了更大的发展。但是在儿童思維中占重要地位的是具体的形象和表象。在这个时期,儿童还不能进行抽象思維。因此,心理学上把这时期儿童的思維称为具体的、形象的思維。

儿童的抽象思維大約要到小学四年級(就現在的学制而言)才逐漸发展起来。这是在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逐漸通过"思維改造"来进行的。改造的方式是这样的:"形成比較一般化的而同时又是更精确的各种表象,是培养小学生思維的强有力的杠杆。由直覚思維达到抽象思維的道路,正是通过一般化的表象的。"③

总之,抽象思維不是和語言同时产生的。儿童从形象思維到抽象思維是經过長期培养和改造过程的。

高先生說:"第一信号系統与第二信号系統不同:在第一信号系統里,作为信号的必須是形象;在第二信号系統里,作为信号的是語言,而語言則是从言語器官傳到大脑皮質的动覚的刺激,而且是代表形象(第一信号系統)的信号。"④这就把第一信号系統和第二信号系統截然分割开来了,忽視第一信号系統和第二信号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关系。

人的第一信号系統的活动是在与第二信号系統活动的联系中产生的。人的信号系統的特点是:第一信号系統只有通过第二信号系統才能变成实际的和眞实的,反之,第二信号系統也只有通过第一信号系統才能变成实际的和眞实的。"二者缺一,反映就是不正常的。"⑤

高先生提出"形象的信号是形象思維的担負者,語言是抽象思維的担負者"的說法,是削弱了語言在信号系統活动中的作用,忽視了語言所以能够作为人的第二信号系統的前提。語言所以能够成为第二信号,首先要在大脑皮質形成神經通路,而这要从第一信号系統开始的。斯·阿·彼得魯舍夫斯基教授說:

> 人的思維,感覚,知覚和表象都是第二信号系統和第一信号系統的联系,人的感覚是与对外部現实的意識相联系的。人运用第一信号系統时不象动物那样,人沒有象动物那样的純粹的第一信号系統的活动,人的第一信号系統是受社会所制約的,第一信号的刺激物只有通过第二信号系統,也就是說,在被意識到了的时候,才能变成实际的刺激物。…第二信号系統是通过第一信号系統才变成实际的。⑥

那末可以这样說:語言是抽象思維的担負者,同时又是形象思維的担負者。人类个体思維的发展,是由形象思維过渡到抽象思維的。学龄期儿童在抽象思維发展的同时,还繼續发展他們的具体、形象的思維。

---

① H. И. 克拉斯諾高尔斯基:《論儿童言語形成生理学》,见《巴甫洛夫学說与儿童心理学》,中国科学院,255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38頁。

③ 包若維奇等:《儿童心理学概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115頁。关于儿童思維形成过程,又可参考M. M. 科里佐娃:《儿童第二信号系統的发生与发展》,科学出版社,1957年,96頁。

④ 《語言与思維》,29頁。

⑤ 斯·阿·彼得魯舍夫斯基:《心理学的哲学基础和自然科学基础》,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778頁。

⑥ 同上。

成人抽象思維的发展，是随着他們的認識的提高而逐步丰富的，并且延續在他們的一生中。認为抽象思維是随着有声語言以俱来，那是天眞的想法。

四、聾啞人的語言与思維

上面提过，听觉正常的儿童由于不断受到交际需要的刺激，就在跟周圍人們交际过程中掌握了有声語言。而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听覚是起着主导作用的。听覚机能损伤的儿童，获得有声語言的自然通路受到阻塞。他們不能通过听覚来区别語言音响，听取、理解和模仿周圍人們的語言。也就是說他們无法通过自然途径来形成語言条件反射，因而陷于不能說話的境地。他們如果沒有通过特殊訓練，則終生不会說話，被人叫做"聾啞人"。然而他們也和听覚正常的儿童一样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不可能沒有交际的。他們就在交际需要情况下，找到一种作为表达思想情意的手段。这就是手势。这种手势是朴素的，因而被称为"自然手势"。从表現方法上来說，自然手势包含有两种类型，即："指示的手势"，那是对于对象本身的比量，"描繪的手势"，那是对事物形象的模拟。两者都是基于形象化而产生的。

随着交际的频繁与扩大，聾啞人互相接触，互相学习，新的手势就不断产生出来。特别是聾啞教育的发展，聾啞人有了文化之后，他們依靠詞汇語发展了和丰富了手势語。这种基于詞汇語发展起来的手势語被称为"人为手势"。(还有别的名称)人为手势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聾啞人交流思想发展思維更大的可能性，但是当然不能跟有声語言相比拟。

手語还有另一种，即是以手指字母构成的指語。这种指語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很早就有了。它是以某一个手指形式来代表某一个字母，把几个指式連串起来代表一个詞的。这也和手势語一样，对于人的視覚分析器和动覚分析器起作用。这里的动覚是表現于手的关节肌肉运动。指語比手势語优越得多，它能够跟書面語、口头語紧密地联系起来，也能够体現語言中所具有的詞法和句法(語法)。手指字母早在七十多年前就傳入我国，但由于我国使用的是方块汉字，字的結构和語音不相联系，因此对它利用得很不够。手指字母对于改善手势語的表現方法起着很大的作用。

自然手势是形象思維的反映，而人为手势則是抽象思維的反映。这話可以成立嗎？我以为可以这样說的。因为：

第一，人为手势是經过一番"加工"，在比划上具有詞的特点。这是指它通常用两个或三个，有的甚至四个动作来表示一个詞，例如表"房子"的自然手势是：两手伸平，指尖相对搭成房頂的形状。人为手势就以此为基础，即在比划房子手势的前面加上一个动作：两手伸平，手心向內，置于胸前，象捧着書本讀書的形状。这两个动作結合起来表"学校"这个詞（直譯就是"讀書的房子"）。

第二，詞的組合具有一定規律性。这就是說，在手势語中大部分的詞都有某种性質的詞根，例如"藥房""厨房""食堂""商店""报社""学校""俱乐部""博物館"等都以"房子"的手势为詞根。这类詞具有明显的詞根。另一类的詞根不明显，如"偵察""主观""客观""希望""盲目""重視""輕視""意見""看""参观""美观""精彩"等詞都以眼部为根，而有关思想一类的詞，手的比划是指向太阳穴或头部。①

第三，手势語的詞汇逐步摆脫了形象化。这就是說，詞的結构逐渐脫离指示和描繪的傾向。例如用两个动作来表"教师"一詞，第一个动作是双手拇指与其余四指并齐，在胸前前后动几下(但臂部不动)；第二个动作是右手握拳，伸出拇指放在胸前。这一类是屬于象征性的詞。另一类是依靠手指字母来表現，例如"部長"一詞，是用"B"的手指字母，加上一个动作，右手握拳，伸出拇指放在胸前(直譯是"部的大头")。这两类的詞随着聾啞人掌握書面語之后不断地产生出来。

第四，手势語具有独特的句子結构形式。由于手势語沒有副詞，沒有"的"和"和"等連接詞(最近依靠手指字母才有)，聾啞人"交談"总是先說明为什么，做什么或发生什么(謂語)，然后才說明誰，什么(主語)。例如"我吃飯"，聾啞人比划起来就是"吃飯我"；"飯后我去看戏"，比划成为"戏看我去飯后"。在动宾短語中常把动詞和宾語調換位置，例如"服从老师領导"，比划成为"老师領导服从"。再次，常用省略的句子，"我去图書館看書"，比划为"我去看图書館"，把"書"省掉了。这种主謂相反，动宾互調，省略表語的造句形式，恰和書面語、口头語相反。因此聾人在运用書面語造句时，常为手势語的独特句法所影响，表現出来的就是詞的次序顚倒，要花很大劳动才能糾正过来。尽管这样，还是可以使对方正确理解自己所要說的意思。就是說它仍然可以完成交际和交流思想的使命。

第五，手势語具有生动性，它不仅是手势比划，面部表情(使眼色，动嘴唇，振动鼻腔、口腔和喉管)，而且助以身势动作。形象表演极其生动、活潑和敏捷。在比划中能够形象地描繪人的思想感情。

① 《論手势語的几个問題》，见《聋哑人工作通訊》1959年第9期。

这种手势語是老的一代聾啞人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

当然这种手势語也有它的局限性，例如对抽象意义的表达模糊含混，概括力很弱，能表示的詞汇少，使用范圍只限于聾啞人，等等。手势語言在交际作用的效果方面是不能跟有声語言相提并論的。斯大林說得好："不能把手势語言和有声語言等量齐观，正如不能把原始木鋤与現代最新式的拖拉机等量齐观一样。"①

因此，特殊学校是以培养聾啞儿童掌握有声語言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

聾啞人的思維发展过程又是怎么样呢？

斯大林說：

（聋哑）的人底思想之产生和能够生存，只能是根据他們日常生活中由于視觉、触觉、味觉、嗅觉而形成的对于外在世界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形象、知觉和观念。在这些形象、知觉、观念之外，思想就是空洞的，沒有任何內容，就是說，它是不存在的。②

斯大林在这里指出了一条重要原理：外在世界的对象和現象，对人的感觉器官起作用，思想是能够在形象、知觉和表象的基础上发生和存在的。正如毛主席所說："任何知識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体外界的感觉。"③斯大林給我們聾啞教育者指出：沒有文化，沒有掌握詞汇語的聾啞人的思維是具体的、形象的，必須面对这个严重任务，根据他們的特点，运用各种科学方法，如观摩、演出、参观、实驗等方法，动員他們各种感觉器官来参加掌握知識的活动。使他們的形象思維逐漸过渡到抽象思維。如果宿命地看待斯大林最后一句話，就認为聾啞人只能保有形象思維，不可能发展抽象思維，那一定要犯錯誤的。

資产阶級聾啞教育家对聾啞儿童智力发展存在着极不正确的見解。他們通过所謂"智力測驗"的結果，認为聾啞儿童智力发展一般比听觉正常的儿童要迟滞二年至三·七五年。④这是沒有根据的。

聾啞人的認識活动过程，是从事物和現象的直接感觉和知觉来开始的。这和听觉正常的人并沒有两样。感觉是在外界刺激物的个別屬性通过感觉器官达到大脑皮質的基础上产生的。知觉是以感觉为基础，能較完整地、多面地反映外在世界。而表象則是过去感知的事物在头脑中的形象。人正是借着这些过程来发展思維。正如上面所說的，聾啞人听觉机能損伤，并沒有使他們的大脑皮質发生故障，他們的高級神經活动仍然是正常的，第二信号系統活动机构沒有丧失。聾啞人思維的发展也和健全人一样是从具体的、直觉的形象思維，过渡到抽象思維。而抽象思維的形成和发展是在个体生活与学习实踐中，逐漸发展和丰富的。

巴甫洛夫說：

人和高級动物的行为样式不仅决定于那些先天的神經系統特性，而且也决定于那些在有机体个体生存期間，无論过去或現在都經常落于有机体上的影响，也就是說，这是依經常的广义的訓练和学习为轉移的。因此，神經系統除了上述那些特性以外，它还經常不断地表現出一种最重要的特性，即最高度的可塑性。⑤

聾啞人不仅能从"无声"交际中发展他們的抽象思維，而且还能通过"看話"（俄語叫"讀唇"，英語叫"讀話"）来掌握口語形象，用眼睛观察說話人嘴巴的动作，从而了解他所說的話。聾啞人掌握有声語言就以此为基础。大量实驗材料表明通过特殊訓練，聾啞儿童完全可以从不会說話到会說使人听懂的話。这就是基于巴甫洛夫大脑皮質存在高度可塑性的原理。

神經中枢的机能并不是永远固定下来，而是經常可能发生改造，并由一些中枢轉移到另一些中枢。大脑皮质一些部分的机能可能被一些部分的所代替……在缺乏某种分析器，例如視分析器或听分析器活动的情况下，其它分析器可以补偿这些机能。⑥

动員視觉补償听觉，触觉补償視觉，正在特殊学校广泛进行着。

我国聾啞人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怀照顧下，已經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十年来聾啞教育和福利事业有了飞跃的进展。手指字母方案的制定与发布，手語规范化工作的推进，标志着我国聾啞人文化发展的新时期。手語規范化要求是使手語稳定和統一，它的方法是使手势語和手指字母相結合。手势語可借助手指字母来改善它的表現方法，使它能够向口头語、書面語靠攏，具有文理；而手指字母又可借助規范化了的手語由繁变簡，由迂緩变敏捷，能更好地为广大聾人群众服务。今天我国聾啞人的交际工具已不再是單純的老式的手势語了，而是由手势語（即規范化了的手的語言）、書面語、口头語以及在口头語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視觉感受語言（即看話）四个方面所构成的。它們都能够完成两种功能，作为交际工具和表达思想的工具。聾啞人有了比較完善的交际工具和表达思想的工具，将促进他們抽象思維的发展。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46頁。

② 同上，47頁。

③ 《毛澤东选集》第一卷，287頁。

④ 川本宇之介：《聋儿教育的观察》（聋教育学精說），284頁。

⑤ 《巴甫洛夫选集》，科学出版社，1955年，196頁。

⑥ H. A. 穆薩巴耶娃：《論感性认識的生理基础》，科学出版社，1957年，81頁。

聾啞人的思維問題

許威汉

了解聾啞人的抽象思維是否存在，不仅对語言学中这个有爭論的問題的解决有些帮助，而且还可以为今后对聾啞人的教育提供更有力的論据，更好地培养聾啞人发揮潜力，从事祖国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建設事业。

聾啞人的思維活动情况是怎样的呢？除了心理学上所指的形象思維以外，还有沒有抽象思維呢？

要回答这些問題，不妨先从具体事例上去認識。

从聾啞人的实际活动来看，我們可以通过表情和手势請聾啞人（即使在未經特殊教育之前）去买一包香烟或者搬一把凳子；不仅如此，聾啞人还有"数量"的常識，比方說，你用手势告訴他三天以后請他看一場电影，他也会完全懂得。这說明"数量"这样比較抽象的概念，聾啞人能够掌握。还有，聾啞人一般也能够知道事物的美丑，判断事物的是非眞假，等等。

再从聾啞人的創造性来看，聾啞人会繪画，画出来的山水人物不但逼眞，而且頗富有想象力；有时候，为了适应客观需要，还能自发地制造劳动工具，改进劳动工具。（經过充分訓練的高級动物，至多只能使用劳动工具。）

显然，从以上的情况看，聾啞人的思維能力不能是絕对沒有的。如果要从理論上找到根据，很可以由聾啞人的大脑来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我們知道，人从类人猿进化到人的过程中，生理上有过极大的变化，逐步具备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生理特点和生理构造，特别是有了認識世界的器官——大脑。大脑是生物界長期发展的結果，是自然界产生的最复杂的物質，是在人类形成过程中的产物。思維是人脑的神經系統的特殊机能，大脑有这种机能，就使人类能够認識客观环境，洞察自然奥秘，从而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由此可見，人既然都有大脑，也就都有思維。正常人的思想向来就是只有在語言材料的基础上才能产生，而語言本身也只有在听覚机能正常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发展。至于生下来就聾啞的人或者在童年时期失去听覚而变成啞叭的人，他們虽然不能借語言的帮助来思維，但因为他們有着和一般人同样的社会生活实踐，在一定的程度上，他們大脑皮質中的第二信号系統也在逐漸形成而不是失掉，他們的思維并不局限在第一信号系統范圍以內，他們的大脑还是能够发揮作用的（第二信号系統就是大脑进行抽象思維的物質基础）。而且，聾啞人生活在人类的社会里，他們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某些交际活动，这时候，他們势必利用表情和手势等方式来示意，以达到某种程度上的互相了解。尽管表情和手势所表达的意义是十分有限的，但究竟不是絕对沒有思維。

正因为聾啞人大脑皮質中的第二信号系統也在生活实踐中形成而沒有失掉，可以想見，在实施特殊教育（如聾啞学校的專門教育）之后，聾啞人的第二信号系統便能得到充分发展，进而扩大抽象思維，甚至完全可能掌握并运用書面語言。

有人說"聾啞人所有的手势、表情以及其他的反映都屬于第一信号系統的范圍"，說"动物沒有語言，不可能有抽象思維，聾啞人沒有語言，也是沒有思維的"。把人降低到一般动物的水平，这未免是一种錯覚。有这种錯覚的人，为了在形式上避免把人和一般动物等同起来看，解釋說"高級动物有概括化的观念，聾啞的人也有概括化的观念，而聾啞的人的观念比高級动物丰富得多，所以聾啞的人更有条件去反映客观世界"。这种解釋，实質上还是把人脑說成仅仅是动物的神經系統进一步完善而已，沒有把人和动物划分开来。

虽然，人的神經系統是从动物那方面发展来的，可是人的認識却是社会历史实踐的产物。社会生活中，人脑有它的本身特点，有它的本身运动規律，不能跟动物的脑相提并論。如果認为聾啞人的大脑和一般动物的沒有本質差别，这是單純的生物学观点，忘却了"人类的五官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这个馬克思主义的重要結論。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們应該承認：聾啞人有大脑存在，有听覚之外的感覚存在，又有不斷的社会生活实踐（实踐对于認識有重要作用），就有思維能力，尽管聾啞人由于生理缺陷所引起的在思維能力方面所受到的限制是肯定的，但是这种限制不可能得出"完全沒有思維能力"这个結論。

好些人論証聾啞人有沒有思維这个問題，总喜欢用"世界观、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等一类代表抽象

事物的名詞做例子来說明聾啞人不可能有这类名詞所代表的事物的概念（概念是反映幷确定客观对象之本質屬性的思維形式），从而証实聾啞人沒有抽象思維。把問題簡單化了，这实在不太好。我們知道，人类在認識过程中所形成的概念是很多的，旣包括为数众多的关于具体事物的概念，也包括为数众多的关于抽象事物的概念。一般說来，聾啞人建立关于抽象事物的概念比較困难（不是絕对不能），但是可以建立关于具体事物（如"桌子、椅子、树木"等）的概念。旣然能够建立关于具体事物的概念，我們就应該說聾啞人也是有思維的，因为关于任何抽象的和具体的事物的概念的形成过程都要經过抽象，抽象概念与具体事物概念之間幷沒有絕对的鴻沟。如果認为聾啞人沒有关于抽象事物的概念便沒有抽象思維，那么这就很可能使人产生这么一个感觉：世界上只有关于抽象事物的概念才是眞正的概念，具体事物的概念似乎就不算是概念，不是抽象思維的基本形式。我这样說，幷不是企图以偏概全，而是只想指出，有些人（如高名凱先生等）强調聾啞人沒有抽象思維在理論上是說不通的。

总之，不論从具体事例上来看或者从理論上来分析，我們都不可能証实聾啞人是絕对沒有抽象思維的。聾啞人只有心理学上所說的形象思維而沒有抽象思維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正因为这样，我們更可以肯定說，对聾啞人推行聾啞教育是有它的良好基础的，我們完全可以有信心地把这項工作做好。

但是，我在以上的論述中，幷不意味着正常人的語言和思維是各自孤立起来的。相反，我完全肯定語言和思維有着密切的辯証的关系：人类由于劳动的需要而产生了发音器官和思維器官。沒有思維，不可能有語言；沒有語言，也不可能有思維。思維在語言材料的基础上产生，語言又在听覺机能正常的情况下得到发展。这是誰也不应該怀疑的客观眞理。

以上的論述，我自以为也不意味着把聾啞人的思維活动情况和一般人的思維活动情况完全等同起来看，聾啞人的思維活动沒有語言帮助而受到极大限制，这也是要加以肯定的。

講到这里，很可能会有人这样說：斯大林在1950年7月22日"答别尔金和富列尔两同志的信"（見斯大林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44至47頁，人民出版社，1955年）里不是已經談过这个問題幷且明确指出聾啞人幷沒有思維嗎？是的，斯大林的确談过这个問題，但是他幷沒有說聾啞人沒有思維。他原来的話是这样的：

> 那末啞聋的人底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他們的思惟是否在工作着呢？思想是否在产生着呢？是的，他們的思惟是在工作着，思想是在产生着。显然地，旣然啞聋的人不能讲話，他們的思想便是不能在語言材料底基础上产生的。这是不是說啞聋的人底思想是赤裸裸的、与"自然規范"（馬尔底用語）沒有联系的呢？不，不是的。啞聋的人底思想之产生和能够生存，只能是根据他們日常生活中由于視觉、触觉、味觉、嗅觉而形成的对于外在世界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形象、知觉和观念。在这些形象、知觉、观念之外，思想就是空洞的，沒有任何內容的，就是說，它是不存在的。（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47頁）

就这一說法来看，斯大林显然是明白地指出聾啞人有思維，有思想，但是同时也指出这聾啞人是"不正常的不会講話的人"（在同一封信的开头即《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45頁就已这样提出），暗示我們应該作为一个特殊問題来看待，不能把一般人的情况和特殊的人的情况混为一談，不能否認一般之外的特殊性："聾啞人底思想之产生和能够生存，只能是根据他們日常生活中…的形象、知覺和观念。"聾啞人不会講話，思想之产生，确实只能是这样。离开这形象、知覺和观念，思想才是空洞的，不存在的；不离开这些呢（事实上不可能离开），当然就有思想（幷不限于感性阶段）。

斯大林对聾啞人論証之所以正确，关鍵就在于他沒有忽視"人"的特征和人类社会生活实踐，而且辯証地看待事物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問題。如果我們撇开"人"的特征，而又忽視了社会实踐对聾啞人的作用，簡單地看待事物的一般問題和特殊問題，那就会走入迷途。

人类研究語言和思維的关系这个問題已經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在以前很長一段时期里沒有正确地解釋过語言和思維究竟有着怎样的一种关系；直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了語言和思維的起源和发展的唯物学說之后，人們才得以明了語言和思維有着辯証的关系。斯大林在《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根据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則进一步闡明了語言和思維的辯証关系，而且还就一些特殊問題作了說明，这又給語言学带来了巨大的貢献。我們应該好好学习馬列主义的經典著作来指导我們今天的語言学工作。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教导我們看問題要全面，不要片面，这对我們語言科学研究工作同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連动式”还是“連謂式”？*（上）

王福庭

“連动式”的名称是李荣先生編譯一本汉語語法書时介紹給中国語法学界的。①后来《語法講話》采用了这名称，并在理論上加以发展。在这以前和以后，其他語法著作也大都談到这一类句子。但是叫名和范圍都有所不同。就是用“連动式”这名称的各家，它的含义也有广有狹，談的有詳有略。

近年来圍繞着《語法講話》的“連动式”，有好些人发表过論文，意見也相当分歧。还有人完全否認“連动式”。由此可見，“連动式”的名称和理論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本文打算在总結各家說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討“連动式”在現代汉語語法学上的地位。意見很不成熟，希望得到批評和指正。

一　各家对“連动式”的看法

我們选了常用的、影响較大的五种著作来互相比較。别的著作里提出的見解大致已包含在內。这五种著作是：

《語法学习》，吕叔湘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以下簡称《学习》）

《汉語語法常識》，張志公著，新知識出版社，1956。（以下簡称《常識》）

《語法講話》，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連载《中国語文》1952年7月号至1953年11月号。（以下簡称《講話》）

《現代汉語》（上册），北京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汉語教研室，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以下簡称《汉語》）

初級中学課本《汉語》，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以下簡称《課本》）

这五种著作的語法体系不完全一样。下文排比句型的范圍限于：《学习》、《常識》、《講話》的“連动式”，《汉語》的“連动結构”，《課本》的“謂語的連續”。为了行文方便，各家所称上述的几类句子，暂且都叫做“連动式”。

五家对“連动式”的見解显而易見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从意义上来說明它，一派从詞类上来說明它。前一派有《学习》和《常識》两家，后一派有《講話》、《課本》、《汉語》三家。下面的引文說明有这个分别。

《学习》說：“两个或更多的动詞屬于同一个主語。这里有好几种情况。比如：‘躺着看書’，‘蒙着头睡’，这里的第一个动詞是次要的，是附加語…。又比如：‘吃飯穿衣’，‘大吃大喝’，这里的两个动詞是联立的，他們是联合成分…。除这些以外，还有一种，那里面的两个动詞既沒有联合的关系，也不容易分别主要和次要。例如：‘他走过去开門’。”（73頁）末了一类句子才是“連动式”。《常識》說：“前一个动詞代表先作的动作，后一个代表随后作的动作。如：‘吃过晚飯看电影’，是說先吃晚飯，然后看电影，两个动作一先一后，連續进行。这样几个动詞組合成的結构叫作‘連动式’。”（212頁）又說：“有的‘連动式’不仅表示一般的連續动作，并且可以表示有因果关系的連續动作。”（213頁）《学习》注重两个动詞“不容易分主要和次要”，《常識》注重“連續动作或有因果关系的連續动作”。尽管重点不同，但都是从意义上来說明“連动式”的。按照这样的見解，“連动式”的范圍当然是很窄的，并且一个句子是不是“連动式”，往往得取决于个人的看法。（下文詳談）

后一派象《講話》說：“‘連动式’就是动詞（包括副动詞）結构連用式。”②《汉語》說連动式是“几个动詞或动詞性詞組連用的格式”。（201頁）《課本》說是“动詞和动詞，或者动詞和形容詞”的連用式。（77頁）尽管包括的詞类不同，三家却都是从詞类上来說明“連动式”的。这样“連动式”的范圍比上两家“連动式”的范圍要大得多。它不仅包括“他走过去开門”和“吃过晚飯看电影”一类句子，还有“躺着看書”，“蒙着头睡”一类句子和别类句子。但是，都不包括“吃飯穿衣”，“大吃大喝”一类句子。三家跟《常識》和《学习》一样，把

* 这篇文章是語言研究所現代汉語小組集体工作的一部分，先写出来发表，請大家提意见。

① 《北京口語語法》，中国青年出版社，1952年，21頁。

② 見《中国語文》1952年10月号，23頁。

这类句子看成“并立結构”。所不同的是《学习》和《常識》專憑意义把这类句子从“連动式”划分出去，《講話》三家是憑意义和結构两方面划分出去的。“大吃大喝”一类句子結构上可以調换次序，次序調换之后，基本意义不变。如：“吃飯穿衣”，調换成“穿衣吃飯”，“大吃大喝”調换成“大喝大吃”。“連动式”呢？前后两段一般不能任意調换次序。①(下文再詳)

五家对“連动式”的見解大致如上。除此之外，“連动式”还需具备某些語法結构条件，才能跟别的句式分别开。五家对語法条件的看法也不一致。

《学习》和《課本》認为“連动式”的几項之間不能有关联成分，如：“他端起碗来就喝。”不是“連动式”。也不能有語音停頓，如：“尤老二在八仙桌面前立了一会，向大家笑了笑，走进屋去。”也不是“連动式”。②

《講話》和《汉語》也認为“連动式”的几項之間不能有語音停頓。③但是都主張可以有“关联成分”，即承認“他端起碗来就喝”是“連动式”。不过两家所謂“关联成分”的范圍并不一样。《講話》的范圍大，包括“越…越”之类，如：“越想越生气”；《汉語》的范圍小，只有“就”之类。《汉語》認为“越…越”式是“紧縮复句”。

《常識》認为“連动式”可以有語音停頓，也可以有“就”一类的关联成分，不承認“越…越”之类。

总起来說，五家的看法如下：

相同的有两点，1. “連动式”几項同一主語。2. “連动式”的几項不并立。

不同之点，第一是“連动式”的定义：

1a 《学习》：“連动式”是不易分主要和次要的动詞(或动詞結构)連用。

1b 《常識》：“連动式”是表示連續动作和因果关系的連續动作的动詞(或动詞結构)連用。

2a 《汉語》：“連动式”是动詞或动詞性詞組的連用。

2b 《講話》：“連动式”是动詞或副动詞跟动詞的連用。

2c 《課本》：“連动式”是动詞和动詞或动詞和形容詞的連用。

第二是“連动式”的語法結构条件：

1. 《学习》、《課本》、《汉語》、《講話》：沒有語音停頓。《常識》容許有語音停頓。

2a 《学习》、《課本》：沒有关联成分。

2b 《常識》、《汉語》：容許有“就”一类的关联成分。

2c 《講話》：也容許有“越…越”一类的关联成分。

从上面的排比可以看出，五家分歧之点錯綜复杂，本文不打算逐点討論。下面首先对各家看法相同的两点作一些补充說明，然后分別討論从意义上說明“連动式”的困难和从詞类上說明“連动式”的不切語法实际，最后提出我們的初步看法。

二 补充說明“連动式”各項“同一主語”和“不并立”

(一) 同一主語

A、“同一主語”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句子里实在有主語的，一种是主語并不出現，而可以理解为同一主語的。从五家所举例句看来，各家看法可能不相同。《課本》、《学习》、《常識》的例句都是有主語的，《講話》、《汉語》的例句有主語不出現的。我們認为“同一主語”应該包括主語不出現的句子，因为句子是从語言片断里摘出来的。在一个語言片斷里，主語出現在上下文里，本句就可以不說，或是經常不說。这样的句子可以跟“主謂句”同样分析。“我开着窗戶睡覚”跟“开着窗戶睡覚”应該是同一类的句子。有“我”和沒有“我”，并不叫“开着窗戶睡覚”的結构改变。至于根本不可能有主語的句子，那是所謂“无主句”，一般不是“連动式”，不在討論范圍之內。

B、“这些东西拿着怪累的”，这一类句子各家都沒在“連动式”下提到。我們認为这类句子还是“同一主語”的。这样的不合邏輯的句子，在汉語語法上是規范的句子。句子的邏輯“主体”是“您”之类(“〔您〕拿着怪累的”)，但是語法上的主語是“这些东西”，正象“油洒了”的主語是“油”。跟这类句子相象的又有“这些書拿着怪重的”。“拿着怪重的”邏輯“主体”不是同一个，“拿着”的是“您”之类，“怪重的”是“这些書”。語法上的主語却是“这些書”。至于这两个句子是不是“連动式”，可以留待下文討論。

C、“我帮助他干活”。“干活”的主語是“他”还是“我”呢？可以有三种解釋，“我帮助他，我干活”；“我帮助他，他干活”；“我帮助他，我和他一同干活”。因此，《講話》把这句子算做“連动式”和“兼語式”以外的复杂謂語。其余四家也不算作“連动式”。單立一类其实沒有必要，因为句子結构跟“連动式”一样。所以不能肯定“同一主語”，是由“帮助”这一类动詞的詞汇意义引起的，不是語法結构引起的。“陪、陪着、带、带着、領、

---

① 参看《汉語》，202頁；《讲話》(《中国語文》1953年4月号，20頁)。《課本》沒提到这点。

② 参看《学习》，73頁；《課本》，76頁(《課本》沒有明提有无語音停頓，例句都是沒有語音停頓的)。

③ 参看《讲話》(《中国語文》1952年10月号，23頁)；《汉語》，213頁。(原話是：“当中沒有語音停頓或停頓很小。”)

領着、带領、扶、扶着、帮、帮着、送、約、找"等动詞都能造成这种"連动式"句。"誰干活"，"我帮助了多少"，跟句子的形式不相干。

（二） 不并立

五家一致認为象下面这样的句子不是"連动式"："他一天到晚上課开会"，"大吃大喝"，因为两段的次序可以調换，句子的形式和意义基本上沒有改变。这里还需要补充几点。

A、"連动式"的句子前后几項一般是不能調换的，有的也可以調换，但是，調换之后意义有了大改变，跟"并立式"的情况不同。比如："武震脫了鞋走进屋去"調换成"武震走进屋去脫了鞋"；"張三开門出去"調换成"張三出去开門"，意思的改变是显而易見的。为什么仍然是"連动式"，下文会說明。

B、"并立"結构的各个成分也有不能調换的。最常見的一种是四字并立結构 例如："多、快、好、省"，"天高、地厚"，"兴風作浪"，不論各个成分之間意义上有什么关系，一經說慣了，次序就不能調换。更長的"并立"結构，大家公認是造句形式的，变成了成語之后，两段的次序也就固定了，"东張張，西望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又要馬儿跑得好，又要馬儿不吃草"。这样的結构，中間必須有停頓，这是"連动式"所不具备的。

其实"連动式"和"并立式"的区别根本不在乎各段的能否調换。除了四字并立結构和极少数的2+3字結构之外，并立的成語一定包含一个停頓。不是成語的結构，除了用停頓，有时得用"和" "并且"等連詞。这是"并立"和"連动"的形式分别。

三　从意义上的关系来說明"連动式"的困难

上文提到，《学习》和《常識》都是从动詞之間意义上的关系来說明"連动式"的。《学习》說"連动式"是"不容易分主要和次要"的动詞的連用；《常識》說"連动式"表示"一先一后的連續动作"（包括"因果关系"）。

《学习》的"不容易分主要和次要"，在《語法修辞講話》（呂叔湘、朱德熙合著）里說得更加清楚。所謂"不容易分主要和次要"的情形出現在两类句子里，一类是前后两个动詞表示一先一后的連續动作的。如："再拿起来看看"，先"拿"后"看"。另一类是前面的动作是后面的动作的方式，后面的动作是前面的动作的用意（目的）。如："我上街买菜"，"上街"是"买菜"的方式；"买菜"表示"上街"的用意（目的）。这些都是"連动式"。

《学习》又举"蒙着头睡"，"躺着看書"这样的例子，跟上面两类例子比較，認为"蒙"和"躺"是次要的（《語法修辞講話》干脆叫"次要动詞"），是附加語，不是"連动式"。

問題是憑意义来認定动詞的主要还是次要，往往只是个人的看法。下面我們把"不易分主要次要的"和"可以分主要次要"的分开討論。

《学习》的不易分主要和次要的两类句子，《常識》就只承認前一类（动作一先一后的）是"連动式"。后一类不是"連动式"，是补充关系，就是說，"买菜"是"上街"的补充語。因为照《常識》看来，"买菜"表示"上街"的目的，而"上街"并不表示"买菜"的方式。《新著国語文法》（黎錦熙著）的看法正相反，認为"上街"表示"买菜"的方式，因而認为"上街"是附加語。由此可見，"上街买菜"的意义究竟怎样，各說各的。

至于动作的一先一后，如："再拿起来看看"，"吃过晚飯看电影"，有的人也可以不这么解釋，而認为重点并不在乎一先一后。"看"是主要的动作，"拿"和"吃"只說明"看"是在那个时候进行的，因为可以加"以后、之后"一类字眼："吃过晚飯〔之后〕看电影"。两个动詞既然可以分主要和次要，按定义这句子就不是"連动式"了。有的人还可以說"拿"和"吃"是主要动作，而"看"只补充說明目的，因为可以問"拿起来干什么？""拿起来〔为了要〕看看"。

可見，从意义上来决定两个动詞"不易分主、次"，都取决于个人的看法。同一个句子，在什么情况下把两个动詞看成"易分主次"，在什么情况下看成表示一先一后的动作而并不分"主次"，也都取决于个人的看法。

現在再說《学习》所謂"可以分主要和次要"的例句。"躺着看書"，"躺着"是次要的；別人尽可以問"看"为什么不是次要的。"看書"也滿可以是"躺着"的目的，"躺着〔为了要〕看書"。因此，得进一步說明为什么是次要的。有人曾經說过："躺着"所以是次要的动詞，是因为"躺着"的动作是随着"看書"的动作进行的，"看書"的动作不停，"躺着"的动作也随着存在。这样显然証明不了"躺着"是次要动詞。

近来討論"連动式"的論文里，特別注重"躺"后面有个"着"字，或可以加个"着"字，以为这就是从形式上肯定"躺"是次要动詞，是附加語。这种作法确是要把研究的重心轉移到意义結合形式这問題上，但是所說不免似是而非，需要加以分析。試看下面这些例句：

1）扭着膀骨轴儿就走出午門来了。
2）皆孝廉出家院仆人伺候着，进了二門。
3）跟着有人献上茶来。
4）他这种衣帽…留着过年串亲戚穿的。
5）身上背着东西不能弯腰。

例1“扭”跟“走”之間有一个副詞“就”，“扭”跟“走”的关系就比較松散，意义上一面…一面的关系很明显。例2“伺候着”跟“进”之間有語音停頓。“进了二門”不說，前面的一段也表示很完整的意思。所以这个停頓可以拉得很長，甚至可以改用句号。例3“跟着”跟“有”之間絕沒有表示方式的意义。例4“留着”跟“穿”之間也沒有表示方式的意义，更沒有同时进行的关系，并且“留着”跟“过年…”之間語音上还可以有小停頓。例5“背着”和“弯腰”之間表示一种原因和結果的关系。象这些带“着”的动詞能說是次要动詞嗎？句子里有“×着”的一段能說是附加語嗎？我們也許能把这些“着”跟“躺着看書”的“着”分别开，前者不是附加語，后者才是附加語。但是，憑什么？看来得憑別的形式标志，不能憑“着”本身。

当然还可以有另一种看法，以为我們上面的种种解釋，不論憑意义，憑語音停頓，都是浮面的，都是錯的。凡是“×着”都是附加語(或状語)，憑形式都得这么肯定。可以拿史振曄先生的《談連动式》①为代表，因为說得最詳細。史先生提出了三种理由。其中的一种是：“前一个动詞所带的‘着’，有时可以换成‘地’，有一些叙状的‘地’也可以换成‘着’。”据我們看来这不是語法分析，只是看到了一些偶然的现象，就是极少数这类的例句里，把“着”改成“地”，还能成句，比如：“馬克西梅奇微笑地說”和“馬克西梅奇微笑着說”。一般的“連动式”句不是这样的。“微笑地”和“微笑着”究竟是不同的語法成分，比如：可以說“馬克西梅奇微笑着”，不能說“馬克西梅奇微笑地”。用虛字排比，在語法分析上很不相宜。还有一种理由是：“前一个动詞是用来回答后一个动詞怎样进行的。”其实这也不是語法分析，这还是憑意义来解釋前后两段的关系。就因为單憑意义，所以問題的提法往往不全面。比如：“瞪着眼珠子发呆。”可以問“怎么发呆？”“瞪着眼珠子发呆。”“瞪着眼珠子”好象是附加語(状語)。再問“瞪着眼珠子干什么？”“瞪着眼珠子吓唬你。”这“瞪着眼珠子”是什么呢？有些“×着”是不能用“怎么”提問的。比如：“这件东西放着以后用”，就不能問“怎么用？”更不能答“放着用。”

史先生的另一种理由(原文第一种)是：“第一个动詞所带的‘着’，只表示出这个动作在进行中，但是这动作的进行是現在的，过去的，还是未来的，还需要看第二个动詞所带的时态。”例如：

1) 他隔着玻璃窗瞅着外面。
2) 玉翠伸出巴掌捂住了妇联同志的嘴，笑着扯开了别的。
3) 那一年他們曾在这里埋伏着打过敌人。

史先生說例1的“隔着”，因为后面的动詞“瞅着”也带有“着”，所以带上了“現在进行态”。例2的“笑着”，因为后面的动詞“扯开了”带有“了”，所以带上了“过去进行态”。例3的“埋伏着”，因为后面的动詞“打过”带有“过”，就带上了“不定时过去进行态”。这里牵扯到形态問題，意义結合形式的問題。

首先得了解汉語的“了”“着”(“过”)跟印歐語言里由詞形变化表示的“过去”“現在”“将来”的意义不是一碼事。汉語的“了”表示完成，不表示过去做的还是将来才做的。这“时”的意义在汉語里是要靠副詞等語法成分来体現的，比如：“我已經看了电影”，“明天看了电影上北海”，“看了”本身沒有过去、将来的意义。“着”表进行，指某事正做着。在这里所討論的一类句子里，不論是前一个或是后一个“着”都不表示現在做过去做或将来做。这种意义又是由副詞等表达出来的，比如：“昨天这个时候，他正(明天这个时候，他会)隔着玻璃窗瞅着外面。”因此，根本不能說“瞅着”决定了“隔着”的“現在进行态”；“扯开了”决定了“笑着”的“过去进行态”。

“过”跟“了”“着”有所不同。在指明是过去的一段时間里，可以說它是表示“过去不定时”的，但是这跟前面的“着”的进行态有什么关系呢？

理論上，我們从来不說后一个动詞的“时”决定前一个动詞的“时”。各个动詞的“时”或是“态”是各归各的。(某些語言里，同一个变态形式可以既表示“时”又表示“态”，那也只是同一个动詞又有“时”又有“态”，不能說一个动詞的“时”或“态”管着另一个动詞的“时”或“态”。)

实际上即便象史先生的看法，他所举的例句里后一个动詞的“时”或“态”也并不决定前一个动詞的“时”或“态”。比如：例1“瞅着”的动作不进行了，“不瞅”了，“隔着玻璃窗”的“隔着”照样进行。例2“扯开”以前或以后，“笑着”的动作都可以进行着。例3“打过”以前或以后的一段时間，“埋伏着”也正可以进行。所謂“不定时”的意义，那是“那一年”这个表示“不定时”的詞語給“埋伏着”加上的。删去了“打过敌人”，“埋伏着”照样可以沾上这种意义。

很可能的，史先生先是肯定了状語的看法，然后比附上种种有关“时态”的話。

总而言之，憑意义来說明“連动式”是說不清楚的；憑意义来說明“躺着看書”这一类的例句不是“連动式”也是說不通的。憑“×着”这个形式来說明是状語是沒有根据的。

(未完，下期續完)

① 《中国語文》1960年1月号，9頁。

語法再研討——代詞和代名詞問題

黎錦熙　　刘世儒

关于区分詞类中的一些具体問題，首先是名詞，我們已在本刊1960年1月号中談过了。現在接着来談一談代詞和代名詞。

在这一部分打算先討論两个問題。

第一个問題是："代詞"这一个詞类究竟能不能成立？应該怎样来处理这种代替性的詞汇？

因为各人使用的标准不同，所以答案也各不同。一般把这么一些詞都列入代詞：

我 你 他 这 那 誰 什么 哪里

多少 每 各 这么 怎么 多么

这种分类法的偏差出在純然从詞汇范疇（代替范疇）出发来給詞作語法的分类。"它們之所以独立成一詞类，与其說是由于它們的形态結构或句法作用上有共通之点，毋宁說是由于它們有共同的語义上的特点"！①从語法上講，这些詞是无論如何也不可能都捏到一块儿的，因为作为它們的語法的外部形式（首先是句法形式）是沒有完全共同之处的。現在不妨来比較一下看：

我是学生。	他对我有意见。
这是学生。	他对这有意见，对那也有意见。
誰是学生？	他对誰有意见？
什么是学生？	他对什么有意见？
哪里是招待所？	他对哪里有意见？

从这一点看，"我，这，誰，什么，哪里"，有共同之处，可先列为第一組。

我的人，我的学生	这的人，这的学生（×）
誰的人，誰的学生	什么的人，什么的学生（×）
哪里的人，哪里的学生	每的人，每的学生（×）

从这一点上看，"我，誰，哪里"也有共同之处；而"这，什么，每"，另有相同之处。如果把前者仍作为第一組，这后者就可暂列为第二組。

这么說，	这么漂亮
怎么說？	怎么漂亮？（×）
多么說（×）	多么漂亮！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么，怎么，多么"基本上有相同之处，（內部小的差异暂可不論，如"怎么漂亮"，若不用在疑問語气中，也可以說的，如"你說他怎么漂亮，我看他并不漂亮！"只是在疑問語气中一般总不常和形容詞組合。）可暂列为第三組。（至于第一組的"我"等，下接动、形（述），这就成了主謂关系，是另一問題了。又如說"他哪里肯說！""他哪里漂亮！一点也不漂亮。"这"哪里"也就和"这么"等是一路，可以跨类了。又如說"各說各的理"，这"各"就和第一組中的"这"是一路，也就可以跨类了；当然也可以說是省了"人"："各人說各人的理"，这就是第二組的"各"了。）

如此看来，它們在語法上所呈現出来的語法特征是大有不同的；把这样一些語法形式上各不相同的詞硬捏在一起，不能不說是理論上的混乱。因为这样一来，就打破了区分詞类所运用的标准的一貫性（其它詞类并不是这样純詞汇范疇的分类），就使得代詞"逍遥法外"（"法"指語法），和其它詞类的区分标准在理論上就尖銳地矛盾起来，在实踐上也会带来致誤的后果。如方言的"啥"和"咋"，用起来常鬧笑話（例如"他啥不来？""張次云这次向你又提出了一个咋問題？"），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对方言詞汇还欠理解，但另一方面，講語法的把它排成一队都塞入代詞这一范疇中，就易使人发生誤会，这也是不能不負責任的。在現代科学化、机械化的語言翻譯中，也是难于处理的。

正确的办法是：按照它們各自的語法形式把它們各归入它們应該归入的类。这就是：

1）把指代事物的所謂"代詞"都归入"名詞"，作为名詞的一个小类，这就是所謂"代詞性名詞（местоименные 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ые）"。②具体地說，就是把上边所列"第一組"中所有的詞都列为名詞作为它的附类（我，你，他，誰，什么…），可簡称"代名詞"。（注意：代名詞是"代詞性名詞"的簡称，不是"代替名詞"的意思。因为代詞的作用不一定是代替，它們只"指出事物及事

---

① 参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俄語語法》第一卷，中譯本，20頁。

② 参謝尔巴《論俄語詞类》9—10頁，他說："一系列的所謂'代詞'也应該看作名詞，如я（我）、мы（我們），ты（你）、вы（你們），он（他）、она（她）、оно（它），они（他們），себя（自己），кто（誰），что（什么），…"

物的特征，但不称呼其名称，也不确定其內容"。①(下"代形容詞"等准此。)

2）把凡指代事物的特征的所謂"代詞"都归入"形容詞"，作为它的一个小类，这就是所謂"代詞性形容詞（местоименные прилагательные)"；具体說，就是把上边所列的第二小組中所有的詞都列为形容詞而作为它的附类。(这、那；什么；每，各，多少…)

有对这"这""那""什么"等跨类的說法表示怀疑的："同一个詞一会儿是代名詞，一会儿又是代形容詞，不一定行吧？"須知"旣然形式特征不只局限于形态方面，那么問題很明显，物質上相同的詞可以出現在不同的范疇里，如俄語 кругóм 一詞，可以是副詞，也可以是前置詞"。②对于汉語也可以这么說。代名詞的"这"和代形容詞的"这"虽然物質上相同，但表現在語法形式上(其实也表現在意义上，見后)也各有不同。旣然如此，就沒理由不讓它出現于不同的范疇中了。"这"等如此，"什么"等也如此。③

"多少"一詞，从意义上看，似乎还应当列入"数詞性代詞（местоименные числительные)"，但在汉語就不一定要如此。一則詞量太少，沒有單列的必要；二則它和"代形容詞"的語法特征(組合能力)实在沒有什么不同。因此，并入"代形容詞"似更簡便，也有理由。

3）把凡指动作、性状、数量特征的所謂"代詞"都归入"副詞"，作为它的一个小类，这就是所謂"代副詞(местоименные наречя)"。具体地說，就是凡屬于上列第三組的詞就都可以这样办理。(这么，怎么，多么…)④

在这方面，我們贊同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編的《俄語語法》的意見。它虽然認为"按照語义上的特点来看，代詞包括代数詞(…并且，同样地，有时还可以包括代副詞…)"，但是它还是按照語法特征把它們分別归入数詞和副詞了。⑤

从意义上看，的确不錯："这、那，这么、那么"，都屬于"指示"范疇："誰？什么？多少？怎么？"都屬于"疑問"范疇，不妨归为一类；但这儿講的是語法，从語法上看，它們就絕不应該归在一块儿。謝尔巴院士对俄語"疑問詞"提出的意見，⑥对汉語也同样是适用的；所以我們也可以这样說：指示詞这一詞类范疇或疑問詞这一詞类范疇在汉語永远和名詞錯合(这；什么)，和形容詞錯合(这；什么)，或者和副詞(这么；怎么)錯合。不讓它"錯合"也是不可能的，除非仍然以純然的語义范疇或詞汇范疇为出发点去处理，而这种办法的不妥又是我們已經很清楚的事。只有把它們的語义上的类打散另行按照語法的特征(首先是句法的特征，当然也包括輔助詞如"的"之类的使用特征在內)排队，才可以从本質上揭示出代詞在語言运用中的特性，才可以使学习的人在遣詞造句方面，对于代詞不再感到难以掌握而发生錯誤，才有利于实踐，才可以使詞类区分的理論前后一貫。

有人說，这样办，是照顧到"語法形式"了，但詞汇范疇岂不是又踢在一边了？这不也同样是不全面、欠一貫的办法嗎？不然。須知代詞本身是沒有确定的詞义的(如果說有，那也只是一般的"代替"意义，还是不确定的)，它的詞义是从它所指代的对象获得的：指代名詞的就是名詞的意义；指代形容詞的就是形容詞的意义；指代副詞的就是副詞的意义。当它进入这样的环境中时，它不但有意义，而且常常是比它所指代的詞的意义还要确定不移，还要具体丰富。(如說"張三是学生"，这"張三"旣是个特有名称可又不能确定不移，因

---

① 参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俄語語法》，397頁。由于俄語和汉語不同，它把代詞分成两組。代名詞，如我(я)、你(ты)、他(он)等；代形容詞，如我的(мой)，你的(твой)，每个(каждый)等。这虽然也有問題，但毕竟还有理由，汉語"各""每"和"你""我"，語法特征相去太远，沒法列为一类；至于"我的"、"你的"和"我"、"你"根本就是一类，連分为小組的措施都沒有必要了。

② 参謝尔巴《論俄語詞类》，5頁。

③ 又如"多少"这个詞也是如此，如"来了多少人"？"他多少有点不乐意"。前者是代形容詞，后者簡直地就是副詞了。因为这說的是"略數"。同时所謂"詞形"也只是暂时现象，变化起来就不一样了。如后者可說"多多少少有些不乐意"，前者可不讲取得这种形式。

④ 这中間当然也有交叉之处。如"这"个，"这"一个，"这么"个，"这么"一个，組合能力同，但一則派入"代形容詞"，一則派入"代副"，这是否自相矛盾了？沒有。这是起于"数量詞"的"两两性"問題。量詞的本质是名詞(所以也有叫他单位名詞的)，形組合于名，当然是可以的；但量詞的作用又常表現在定語部分中，也有了形容詞性质(所以也有叫它各是形容詞的)，副組合于形，当然也是可以的；"这"等是冲着它的名詞性去的，"这么"等是冲着它的形容詞性质去的，所以就都汇合到这里来了。代形和代副在組合能力上是互相排斥的(如"这人"，行；"这么人"，不行；反之"这么說"，行；"这說"不行)，只有在量詞这一点上，可以汇合起来，虽然更深入地观察，它們所冲着的点儿并不相同。

⑤ 参同上注①。它說"不定量数詞表示不确定的数目，其中包括代数詞 несколько…。"(見378，390頁)又說"由代詞构成的副詞"，"它們同代詞的性、数、格已經沒有任何联系了"。所以尽管"按其語源論，都与代詞有联系"，但是还是把它們列入副詞了(見627，655頁)。

⑥ 参同上注② 26頁。它說，"疑問詞这一詞类范疇，在俄語里永远和名詞錯合，或者和形容詞錯合，或者和量詞錯合，或者和副詞錯合。"

为天下可能有很多"張三"；若說"我是学生"，就不能有第二个"我"，而"張三李四"都可以自称为"我"。)由此可見，把它們按照語法形式分別归入它們应該归入的类，正是密切地結合了它們意义范疇，絕不是單从形式出发来考虑問題的。事实上，除了純粹形式范疇的詞类外，任何詞类，它的物質意义和語法意义都是密切結合在一起的，不可以分割的。

在过去，我們对代詞的处理，虽然照顧到語法形式，把代形容詞、代副詞都分別归类了，但是把"代名詞"却独立为类，这在理論上也是不够一貫的。因为既然代形代副不独立，代名有什么理由独立呢？反之，代名既然独立，代形、代副又有什么理由不独立呢？这显然也是有偏差的(英語語法也如此)。現在拟定把"代名詞"这个"独立王国"取消，附入它应該归入的类(名詞)，使理論一貫。

总之，代詞的問題，是个比較复杂而不易解决的問題。虽然大家在过去已經作过不少討論，但直到今天仍然还沒有得出一个能够比較讓人滿意的結論。上边我們的意見，只是各抒已見，仅供討論中的参考而已。

第二个問題是"所"字問題。

"所"在現代汉語中究竟还是詞不是呢？是詞，那又該归入哪类詞呢？对这个問題的答案，向来就有分歧的。

有人說这是"联接代名詞"(可拿馬建忠、黎錦熙为代表，虽然这两家的說法并不完全相同)。①例如：

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問題并不簡单。

这"所"字的作用就在联接"定語"(我了解)給"中心詞"(情况)，所以叫"联接"；但这中心詞又常省略，如"据我所知"，这时，这中心詞就由"所"字代理了，所以又叫"代名詞"。既可联，又可代，所以就叫作"联接代名詞"。——既是"代名詞"，在"定語"中就有一定的成分，它的成分就是古汉語遺留下来必須放在动前的"宾語"。在意义上又必有所代，它就代表着定語所修飾的"中心詞"。

这种說法的困难是遇到下列的情况就不好办了。例如：

美帝国主义被我們所击敗。

这"所"就絕不是联接"定語"給中心詞的了。因为就句子的現实結构分析，"我們"是名詞在状語成分中(即"副位")，"击敗"是謂語，这里边根本就沒有定語，那么"所"还联接什么呢？这就可見"联接代名詞"的"联接"是不能充分适用的了。

又有人說这是"被性助动詞"(这可拿楊樹达作代表)。②这种說法的好处是比較簡便；同时"所"字常常釘着在动詞前边，确乎和助动詞也有了相同的地方。(这和"詞头說"不同，因为助动詞并不以不能离开动詞为条件，如"你可以今天从北京往杭州旅行去"。)但助动詞多少有点儿动詞的实义，而"所"則純虛，只够作为指代的一种符号。并且通常表被动的助动詞就是"被"字，如"美帝国主义被击敗了"，这"被"字决不可以改用"所"字，可見"助动詞說"是基本上通不过的。如果只把它作为粘在动前一种表指代的符号，那是可以說得过去的，但它究竟是什么詞类呢？既然它确实有指代中心詞的作用，又有标志定語以联結于中心詞的作用，当然就不应当都被抹煞的。

把"所"字看作表被动的工具詞这是一种錯覚。事实上，表被动的乃是"为"(如"为人所尊敬")、"被"(如"被他所称贊")，沒"所"也一样(如"为人尊敬""被他称贊")，但沒"为""被"等可不行(如"他所尊敬"、"他所称贊"，这尊敬、称贊对"他"說倒都有了主动的性質，如果咱們不願意把"他尊敬的人""我們建設的社会主义"都理解为"被他"、"被我們"的話)，这就可見"所"字不是表被动的了。只因"所"常和"被""为"等套用在一块儿，粗粗一瞅，很容易把"被"等的性質誤安到"所"字头上。这是"被"冠"所"戴，对"所"字来說，它当然是不能"認帳"的。③

第三种說法是"助詞"(这可拿初中《汉語》課本作代表)。④这种說法的困难在于界說寬泛，不解决問題。如果凡是在語法上弄不清的难詞或者分类遇到棘手的难詞就都往"助詞"里头塞，那助詞岂不成了詞类区分上的"避难所"了？("难"仍讀阳平)如果不是想避"难"，就不必还走旧时"凡虛皆助"的老路。(旧时訓詁

---

① 参《馬氏文通》63頁，《新著国語文法》253頁。

② 参《高等国文法》170頁；另外刘复也部分地采用了这种說法。他把"所"字的用法分成三种，第一种用法就是属这种性质的。但这种"所"字应該收入什么詞类呢？他沒明白表示。参《中国文法讲話》108頁。

③ 刘复批評杨树达"要一貫他的'所'字表被动說，也和馬氏(馬建忠)要一貫他的'所'字常位讀領，或隶外动，或隶介字而必先焉'說一样勉强。"是有理由的，但他把"所"字支离破碎地"分作三种"(参《中国文法讲話》108頁)也同样是勉强的，因为在这三种"用法"中并沒有跌出"指代"的范围，有什么必要分成各不相干的三种用法呢？刘氏所以走了这一条路，就因为他沒有看清"所"字的本质特征，而只跟着"所"字在各种結构中所呈显出来的一时的現象轉圈子，所以就也同样得出这样勉强的結論了。

④ 参初中《汉語》第三册，140頁。

家把虚詞都叫“語助詞”，或簡称“語詞”，更簡称“詞”。）

主張“助詞”說的惟一的理由是“所”字可以从結构中“抽去”，如“我‘所’知道的情况”，抽去“所”，“我知道的情况”，不論結构或語意都还是一样，并不受影响，可見它是个可有可无的詞，是助詞性質了。我們覺得这是局部的現象，全面地看問題，就不好这样說。如“笑的人”和“所笑的人”意思就正相反（前者是人笑，后者是人被笑；又如“哭的小孩”和“所哭的小孩”，“呼喚的人”和“所呼喚的人”同）；又如“明白的道理”，“明白”是形容詞；“所明白的道理”，“明白”就是外动，“道理”就是明白的語意上的賓語了。可見“所”字并不是个可有可无的詞，有时是不能随便“抽去”的。“所”字本是个古代詞的遺留，直到現代还沒有被淘汰，它的生命力就在于此。講語法的应該就着它的实况，描繪出它的特点来，才可以对人們掌握它有帮助；只籠統地說是“助詞”，那显然是不能解决問題的。初中《汉語》課本一方面把“所”列为助詞，一方面在指示助詞的語法特点时，又馬上把它除外：“除‘所’字外，助詞都…表示一些附加的意义。”“除‘所’字外，所有的助詞都念輕音。”（見140頁）旣然从語法特点上看，“所”字一条也不具备助詞的特点，那么为什么还要把它塞入助詞呢？旣然把它收入助詞，跟着又从語法特点中一再把它踢出去，这就不易使人信服了。

第四种說法是“詞头”說，①这种說法的困难在于不合事实。誠然，在“据我所知”“所看見的”“所想象的”这些格式中，“所”字和动詞是緊密地連在一起的，但这不是必然的規范，而是在一定范圍内的偶然接合。例如“所非常清楚了解的”“所面对着广大群众公开表揚过的”，等等，这就难說“所”字还是中心动詞的詞头，因为，很显然，它和它的中心动詞已經距离得那么远，又怎能作为它的“头”呢？

由此可見，这四种說法都是有缺点的，不能解决問題的，那么，这該怎么办呢？我們考虑的結果，覺得还是用第一种的“代詞”說比較合适。但不要再冠“联接”“接讀”②或“关系”“复牒”③之类的头銜，因为它起的联接作用只是局部的，而广泛的用法乃是指示——所以可归入“指示代詞”的范疇。仍用前例說明：

据我所了解的情况，…

这“所”就是指代“情况”的，而“情况”在語意上又确是定語子句中謂語外动詞“了解”的賓語，“所”指代它，又按照汉語的老規律倒装在外动前边去了。如果这中心名詞（在这儿就是“情况”）反上去作为主語，就是：

这情况被我所了解。

美帝国主义被我們所击敗。

这“所”字还指代誰呢？显然地还是指代那个反上去的中心名詞的，这中心名詞在本句中不管跑到那儿，总归还是“所”后动詞語义上的賓語，所以“所”就仍可以稳坐动前，作为它的結构上的賓語的“代理人”了。試用图解表示如下：

据 | 情况
我 || 了解 (所) | 的

情况 || ( )了解 | (所)
被 我

这里当然也有可能引起誤会，比如說，这是被动句，怎能又带賓語？如果把“所”字也换成“情况”，那么“情况被了解情况”还成話嗎？但是，被动句再带賓語，在汉語并不排斥，这是另一問題，不先討論；主要是这能不能成話。說这能成話，当然有困难，但問題是根本就不能这样理解（跟着这样理解而来的就必然会出現这样的怪翻譯），因为“所”字在这儿只是“情况”的代理人，是“情况”和“了解”語意上所发生的关系（动賓关系），从外部形式上所放出来的“信号”，它和“情况”实际上是一非二，我們只能借助于这个信号去理解“情况”和“了解”的語意上的关系，又怎能把这种信号誤看成和“情况”是廻然不同的两种事物，因而断定它們是主賓对待的两种廻然不同的成分呢？（图解上，“所”字加了“（ ）”，就是为了預防这种偏差的。）

这种說法的好处，就在于它从历史上揭露出并确实地也描繪出“所”字的本質特性；因而在实踐上也就具有簡捷而系統化的实用价值。只要明白了“所”字的这种特性：在动詞（外动詞，关系内动詞）前指代这个动詞語意上所带的賓語或补性（即副性）賓語，就可以对“所”字的用法完全掌握。那些錯用了“所”字的不合規范的句子，如“他們所出发的时候，月亮还沒有落山”，只須一句話就可以道破这个句子的毛病所在：“出发”是内动，而内动是不能带賓語的，“所”字放在这儿就沒了着落，当然也就是不合規范的了。

这种說法的缺点是在于：“所”字在現代語，人們对它的指代意义已經大都意識不到了；还要說它是代詞，至少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好理解的。况且，現代指示代

（下轉300頁）

① 王力：《汉語史稿》中册，424頁。他說：在表示被动的情况下，“所”字失去了原来的代詞性，而成为外动詞的詞头。

② 馬建忠叫“接續代字”，参《馬氏文通》63頁。

③ 严复譯为“复牒”，但他沒有涉及“所”字問題，参《英文汉詁》39頁。

論"們"和"諸位"之类并用

邢福义

認为"們"和"諸位""全体""各位"不能并用，这是目前大多数語法書的共同看法。远的不說；最近出版的北大中文系語言学教研組編写的《語言学基础》，在談"語法規范化問題"时，就認为"諸位代表們"是有語法毛病的不規范的說法，理由是："們"和"諸位"不能并用。①

我認为，一种語法格式是否規范，既要看它有沒有在最典范的著作中出現，又要看它有沒有普遍性。根据这个标准，"們"和"諸位"等并用的格式应該肯定是合乎規范的。

这种格式，在毛澤东同志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出現。例如：

1）要使全体青年們懂得，我們的国家現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期內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間內，团結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創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23頁）

2）各位代表先生們，各位同志們，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毛澤东选集》第三卷，811頁）

而且，这种格式不仅毛澤东同志用，党和政府的其他許多領导同志也用。这种格式既見于許多作家的作品中，也見于許多机关的公开文件中。从一般函电里找得到，也从工农群众在某些大会上的发言里找得到。这就雄辯地証明了这种格式是被普遍地运用着的。举例为証：

3）敬爱的代表团全体同志們，…（周恩来总理在欢迎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的讲話，見《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9号，3頁。）

4）亲爱的大使同志，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叶留金同志和全体团員同志們，同志們，朋友們：…（朱德同志在苏联大使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約十周年宴会上的讲話，見《人民日报》1960年2月15日4版。）

5）諸位朋友們：今天让我来說个故事…（見《赵树理选集》，开明书店，94頁。）

6）陆、海、空軍全体官兵同志們，民兵同志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見《长江日报》1959年10月2日）

7）武汉市和襄阳专区工业、交通、基建单位的全体职工同志們：…（湖北省省委、人民委員会祝賀武汉市和襄阳专区提前跨进1960年的賀信，見《湖北日报》1959年11月10日）

8）敬爱的中国人民解放軍全体指揮員、战斗員同志們：…（群英大会向中国人民解放軍致敬电，見《光明日报》1959年11月9日）

可見，如果一口咬定这种格式不能成立，这是无視語言事实。但是还有必要談談下列几点：

一、我們說"們"和"諸位"等可以并用，并不等于說"們"和一切表示数量的詞語都能并用。"們"和"三个""五位"之类是絕对相排斥的。

二、"們"和"諸位"等并用的格式并不是在任何場合都能够使用的。这种格式一般用在呼語中，因此这种格式最常用在講話、演說、公开信等的开头。一般的句子中，也有用这种格式的，如例1，但比較少見。至于函电及其他公开信件末尾的签名部分，則只能用"全体××"，不能用"全体××們"。比如"群英大会向中国人民解放軍致敬电"，开头用"亲爱的中国人民解放軍全体指揮員、战斗員同志們"，而在信尾用"全国工业、交通运輸、基本建設、財貿方面社会主义建設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見《光明日报》1959年11月9日）

最后談一些有关的問題。

楊欣安等《現代汉語》第四册說："至于象'諸位同志們'的用法，有些欧化的意味，跟汉語的一般习惯不合，近来虽有扩張的趋势，但未形成規范。"②《初中汉語課本第三册教学参考書》說："'們'的用法近年来有扩張的趋势：1、重复用，如'…諸位老师們'…"③这里有三个問題值得討論。1）"們"和"諸位"等并用的格式是不是欧化的格式；2）这种格式是不是近年来"們"的扩張用法；3）这种格式是不是合乎規范的格式。

（下轉292頁）

---

① 北京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語言学教研組編：《語言学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122頁。

② 楊欣安等編著：《現代汉語》第三册，重庆人民出版社，1957年，54頁。

③ 张志公主編：《初級中学課本汉語第三册教学参考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26頁。

修辭新例

看图会意

《中国語文》1959年12月号倪宝元同志的《漫談修辞新例》里談到"顧名思义"和"反客为主"两种修辞新例，我觉得很有意义。

我在这里也补充一种修辞新例，那就是"看图会意"。

所謂"看图会意"，就是在書面語中，用图形来表达意义。这个图形，不是六書中⊙☽之类的象形字，因为它沒有公認的和确定的讀音；这个图形也不是什么艺术插图，因为它只是一个簡單的图样；这个图形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它是句子里的有机部分。

运用"看图会意"修辞手法的目的大致有两种：

第一、用簡單的图形表現复杂的事物或情理。例如：

> 1）这四幢屋各不相連，散布在一座小山包下。一条Y形的小山溪把它們分割在四处，小队部駐在汇流点旁左边的一幢。（曲波：《林海雪原》，109頁）
>
> 2）高大的威虎山前怀，抱着⁘形的五个小山包，名叫五福岭。这五个山包的大小一样，外貌相同，間隔距离排列得非常均匀。（同上，217頁）
>
> 3）剑波根据他的报告在地图上标了一个8字形的蓝綫条。接着在刘勋蒼、孙达得的报告后，他又标上了不同周度的两个8字綫条，三个8字綫条加起来，形成一朵⚘形的花。此时小分队的位置已在正北那个8形的紅点处。（同上，466頁）

要描写高山狹谷、急流峭壁、林海雪原的复杂地形，要叙述一股狡猾的殘匪逃竄的离奇难辨的路綫，用語言文字来表达是比較困难的，或者是需要費很多笔墨的，但用个图形来表示，却表达得很清楚、很确切，节省了許多文字。

第二，为了詼諧、諷刺和嘲笑。例如：

> 4）"□□"是国貨，"穆天子传"上就有这玩意儿，先生教我說：是闕文。…不过先前是只見于古人的著作里的，无法可补，現在却見于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补不能。到目前，則漸有代以"××"的趋势。…这东西多，对于这著作的內容，我們便預覚其激烈。但是，其实有时也不然。胡乱×它几行，印了出来，固可使讀者佩服作家之激烈，…却又可使檢查員爱他的顺从，許多話都不敢說，只×得这么起劲。…（魯迅：《花边文学》："'…'「□□□□」論补"）
>
> 5）从外面炸进来，这"生命圈"便收縮而为"生命綫"；再炸进来，大家便都逃进那炸好了的"腹地"里面去，这"生命圈"便完結而为生命〇。（魯迅：《伪自由书》："中国人的生命圈"）
>
> 6）…我将"张資平全集"和"小說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遙献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
>
> 那就是——△（魯迅：《二心集》："张資平氏的'小說学'"）

魯迅先生用"□""×"等图形来揭露国民党压制言論自由的書刊檢查制度，来諷刺那些伪装激进的无聊文人；魯迅先生用"生命〇"来諷刺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抵抗政策；魯迅先生又用"△"来嘲笑資产阶級的鴛鴦蝴蝶派文学的庸俗、老套和輕浮浅薄。如果魯迅先生在这里不用图形，而用文字，把"□□""××"改成"空方框""叉叉"，把"生命〇"改为"生命零"或"生命的完結"，把"△"改为"三角恋爱"，讀起来就平淡得多，諷刺的力量就弱得多。現在用了图形，就很形象，很幽默，很含蓄，因而也就使他的杂文更鋒利，更富有战斗性。

这些图形有些不能讀出它的声音（例3中"8字形"的"8"是文字，不是图形，因此有确定的讀音，讀"八"），只能領会它的意义。图形在句子里的功能大抵相当于一个名詞，但有时也可以当作动詞来活用一下。如例4中的"胡乱×它几行""只×得这么起劲"，"×"就相当于一个动詞了。

过去的一些修辞学著作談修辞格"摹状"时，認为"摹状"只包括摹色摹声两类。我想，"看图会意"可以定名"摹形"，与"摹色""摹声"并列，也包括在"摹状"这个傳統的修辞格名目里。（严修）

新"拈連"

"拈連"是一种修辞格，这种修辞手段的特点，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一書中写道："甲乙两項說話連說时，趁便就用甲項說話所可适用的詞汇表現乙項观念的，名叫拈連辭。"例如：

> 重門不鎖相思梦，隨意遶天涯。（赵令畤：《錦堂春》詞）

水調数声持酒听，午睡醒来愁未醒…
（张先：《天仙子》詞）

"鎖"是說明"門"的，趁便用来表現"梦"；"醒"是說明"睡"的，趁便用来表現"愁"。

現代汉語中出現这样一种現象，就是将現成的詞語更动一个字而創造出新的詞語，讓这新的詞語跟它所憑借創造的現成詞語連用，以起到修辞的效果。这种現象現在越来越多了。

連长 你記性不好，忘性倒不錯啊！（田川：《修堤》）
咱們都是大老粗，好好学习，变个老細（西虹：《家》）
骄气凌人不对，但是必須豪气凌鬼。（王任重：《来一个打鬼运动》，《人民日报》1959年10月11日）
他把党和人民对于他的要求"置之度外"，而把他对于党和人民的要求"置之度内"了。（龔同文：《变》，同上，1959年12月24日）

这种手段具备"拈連"的特点，就是"两項說話連說"，上下文联系起来才能有修辞效果。但是它跟《修辞学发凡》里所說的"拈連"不同，該書中的"拈連"是詞的灵活运用，而这种"拈連"是利用現成詞語的格式創造出新的詞語。可以这样說，前者是依据詞的意义造成的"拈連"，后者是依据詞的形式造成的"拈連"。

这种"拈連"有个明显的特点：由反义詞来构成（只有极个别例外）。語言中的反义詞有着比較强烈的修辞作用，"通过反义詞表現出了对立的关系，这种对立可作为描繪刻画人物、事物、事件的异常鮮明的手段，借助反义詞把对立的人物、事件加以对比，正如同图画上淺淡的色彩在黑底上被衬托得更为鮮明一样。"①这种修辞手段除了可以起到对比作用，讓語言生动鮮明外，还可以使語言变得詼諧、風趣。特别在打击反面現象，批評落后事物方面，它更有强烈的力量。魯迅先生就曾用过这种手法。

一个闊人說要讀經，嗡的一陣一群狹人也說要讀經。
（《华蓋集》：《这个与那个》）

在毛主席著作里，我們更可以看到这一手法的巧妙运用。

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討論問題，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訓练，又最便于知識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毛澤东选集》，76頁）
难道民族資产阶級的軟弱性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們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嗎？（同上，144頁）
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給他們当学生是必須恭謹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同上，810頁）

有一些新成語，就是依据这种手法創造出来的，如知难而进（知难而退）、欲速必达（欲速不达）、后生可爱（后生可畏）、歌声載道（怨声载道）、小是小非（大是大非）等。

运用这种修辞手段，有时候只有仿造的詞語，而被仿造的詞語不出現，如前面的"一哄而集"（一哄而散）、"知而不言，言而不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另外，有些仿造的詞語已經能單独使用，不必要一定跟被仿造的詞語联系着使用了。如"跃退"（跃进）、"促退"（促进）、"后进"（先进）、"意料之中"（意料之外）。当然我們也反对这一手法的濫用，或者随便制造生詞如"自內"（模仿"自外"）、"会众"（模仿"听众""观众"）之类。（良明）

相反相成

《中国語文》1959年12月号倪宝元同志的《漫談修辞新例》一文的"顧名思义"中举有"背阴坡社唱遍向阳歌"这个例子，我們覺得它和"顧名思义"的修辞手法有形式上的不同。因为"顧名思义"这种手法，和"反复"有相同之处，"背阴坡社唱遍向阳歌"，只是"反义相联"而已，根本沒有"反复"的成分；而"反义相联"，又不是"顧名思义"的必需条件，哪能归到一个类型呢？因此，与其說"背阴坡社唱遍向阳歌"是"顧名思义"中的"反义相联"，倒不如說它是"相反相成"的另一格式。

毛主席說过"相反相成"这句話是辯証法的。"'相反'就是說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爭。'相成'就是說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結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見《矛盾論》）。客观事物是这样，反映客观事物的語言也是这样。尤其在修辞中，只要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滿可以把两个相反的概念，联結起来成为一个新的概念。我們举毛主席的文章作"相成相反"手法的示范：（下加点原文所无）

关于丧失土地的問題，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則。（《毛澤东选集》，211頁）
但是消灭它（战争）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級革命战争反对阶級反革命战争。（同上，171頁）
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同上，194頁）

以上是一句中的"相反相成"，看似矛盾实不矛盾，其中包含着真理，賴人寻思玩味。又如：

---

① 《俄語修辞学概論》中譯本，71頁。

"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計划是不好的。(同上，234頁)

我們說，紅軍在一个方面說来是失敗了，在另一个方面說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說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說来是失敗了。(同上，147頁)

我們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們的战术是"以十当一"。(同上，225頁)

我們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同上，485頁)

以上是几句中的"相反相成"。在所有"相反相成"的句子里，不管一句或几句，它总是利用詞語的反义或对义表现矛盾，又在一定的条件下，把矛盾統一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这正是修辞上"相反相成"的妙用。

主宾同位

倪宝元同志在"反客为主"的末尾举了"給武士插上文化翅膀"一个例子，虽然也可以在"文化"后面加上"的"，和其他所有的例子一样，构成定語与中心詞的关系。但是有些类似这样的結构，却又决不可能加上"的"，那么，它們就不是定語与中心詞的关系，而是"主宾同位"的关系。語法上有同位成分，但同位的两个，既不是宾主的关系，又沒有比喻的作用。修辞上的"主宾同位"，主要就是起比喻作用。因此，我們認为加"的"的才是"反客为主"，凡是不加"的"的(包括可加而未加的)，都是"主宾同位"。"主宾同位"是比喻手法中的另一种形式，它和"反客为主"的比喻手法也有形式上的不同，它也是新兴的修辞手法，值得我們注意和研究。例如：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經冒出地平綫了，我們应該拍掌欢迎它。(《毛澤东选集》，680頁)

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同上，904頁)

这个胜利(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保証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能够有战胜法西斯野兽的力量。(最伟大的友誼)

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連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毛澤东选集》，154頁)

以上这些例子，主宾之間有"这个"复指的，当然不能加"的"；"法西斯"是抽象名詞，虽然也可以加"的"，和"帝国主义的豺狼們"(見前)一样构成定語与中心詞的关系。但是作者都沒有加"的"，那就是主宾关系。其余都是具体名詞，加"的"便要发生誤会，使人認为是实事而不是比喻。因此，这些例子决不能加"的"。我們要辨別清楚，加"的"的是"反客为主"的比喻手法，不加"的"的是"主宾同位"的比喻手法，这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談的。(徐仁甫)

(上接289頁)

于第三个問題，上面已經討論；现在就前两个問題談談个人的意見。

我認为，說这种格式是欧化的用法是不正确的。在很多近代白話文著作中，这种格式已經相当普遍地用了。略举几例：

1) 請过众位姑娘們来，調开桌椅，罗列杯盘，母女姊妹們吃毕了飯。(《紅楼梦》上，239頁，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2) 老爷們幷各位叔叔哥哥們都吃了飯了。(同上，110頁。)

3) 众媳妇們說："伺候齐了！"(同上，78頁。)

4) 众小厮們都在丹墀侍立。(同上，78頁。)

5) 因此，宝玉只和众丫头們擲骰子赶围棋作戏。(同上，185頁。)

6) 宝玉辞别賈赦，同众姊妹們回家…(同上，239頁。)

这种用法在《紅楼梦》中很普遍，这里只是随便举出几个例子而已。可見这种格式是我們語言里本来就有的。

以为这种格式是近年来"們"的扩張用法，也是不正确的。这种看法如果是正确的，"們"和表示数量的詞語并用的現象就应該是过去少而現在多；然而，事实是，"們"和表示数量的詞語并用的現象过去多而現在少。比如在《紅楼梦》中，不仅有我們現在存在的并用現象，而且有我們現在沒有的并用現象。略举几例：

7) 尤氏未及答应，几个媳妇們先笑道…(同上，75頁。)

8) 凤姐见还有几个妯娌們陪着女亲…(同上，143頁。)

9) 只见凤姐儿在門前站着…看着十来个小厮們挪花盆呢。(同上，286頁。)

"們"和"几个""十来个"并用，是我們現在沒有的用法。这种用法，在《水滸》中也有，如：

10) 自从武大娶得那妇人之后，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詐的浮浪子弟們，都来他家里薅惱。(《水滸全传》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856頁)

可見，从現在看来，近年来"們"和表示数量的詞語并用的范圍是縮小了，而不是扩張了。

语文短评

歧义

771 今天的国画家長于書法的人很少，这无疑是一項缺点，在艺术教育方面恐怕是值得提倡一下的。（文艺报 1959年18期，7頁）

"值得提倡"的是什么呢？作者原意是指国画家学习书法；但由于句子的結构有問題，意思似乎搞反了。修改的方法：可以把"值得提倡一下"改为"应該引起注意"或"值得提倡一下书法"。（宋玉柱）

772 但是有人認为只有苏州的白磁土才能生产白水泥，北京产的不能用。为了証实这一点，在工人和技术人員一致努力下，前后經过三十多次的試驗，終于生产出来顏色洁白的白水泥，經过鉴定質量合乎要求。（北京日报 1959年10月12日2版）

"証实"的意思是証明前面的看法是确实的，而原意却是要証明前一种看法是錯誤的。所以后一句应改为"事实証明这种看法是錯誤的…"（張雨山）

773 長期以来南朝陶俑发現很少，成为考古学中的空白点，这对六朝丧葬制度和官私奴婢問題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例証。（文汇报 1959年9月5日2版）

第三个分句中的指示代詞"这"指什么呢？看起来倒好象指"很少发现"和"空白点"，实际上不是。仔細体会文意，应当指《六朝陶俑画册》。句子中没有出现过的詞語，不应当突然用代詞来指代。（朱松山）

774 馮友兰、黃子通对老子思想是唯物主义的看法。侯外廬、吕振羽对老子思想是唯心主义的看法。（光明日报 1959年6月10日3版）

这是两个小标題。看到标題的人都会猜測：究竟是老子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呢，还是馮友兰他們的看法是唯物主义的？根据上下文可改为"馮友兰…认为老子思想是唯物主义的"，这样就不致引起誤会了。（千 麦）

775 廿八年前，兰尕才八岁，貴族江巴打死了父亲。（解放軍画报 1960年1期，21頁）

"父亲"的前面应該加上"她的"，否則，意思就变成"江巴打死了自己的父亲"了。（一 兵）

776 从这次群众性的"推先"运动中，我們总結了"六字推先法"…（跃进 1959年15期，45頁）

"推先"的意思不明确，是"推举先进"呢，还是"推广先进經驗"呢？从上下文看是"推广先进經驗"的意思。与其这样，不如明白地写作"推广先进經驗"。（安汝磐）

777 歌頌汉藏民族偉大友誼的大型話剧"文成公主""降龙伏虎"已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作为迎接国庆十周年剧目。（文汇报 1959年9月8日2版）

这里倒好象"降龙伏虎"也是歌颂"汉藏民族伟大友誼的"剧目了，大家都知道不是。应当在"降龙伏虎"前另加一个适当的定語。（朱松山）

778 繼續鼓足干劲，爭取四季度更大胜利。（新聞日报 1959年10月4日2版）

"四季度"与"第四季度"意思不同，"四季度"是指四个季度。照句中字面上来看，应将"四季度"改为"第四季度"。（林貽俊）

生造詞語

779 人們在屋子里悶悶默默地坐着，幼儿象战士的背包一样，背扎在父亲或母亲的背后。（紅日 103頁）

"悶默"不是一个詞，不能重叠成"悶悶默默"。如果是因为强調而把"悶悶"和"默默"都用上，那也用不着，这句話只要用其中的任何一个就行了。（龔千炎）

780 村庄上漆漆黑黑，沒有一个人家有一星灯火，每一个人家的門却是敞开着的。（紅日　103頁）

作者也許是为了强調而把“漆黑”重叠成“漆漆黑黑”的，其实一般人都不这么說。这句話可改成：“村庄上漆黑一片，沒有…”（龔千炎）

781 …一条剛能装盛一个人的麻袋里。（敌后武工队　324頁）

“装”和“盛”是同义詞，这里用哪个都可以；可是不能硬凑成“装盛”。（安汝磐）

782 刘文彬扭臉望看一下赵庆田…（敌后武工队　189頁）

“望看”是生造詞。平常只說“望一下”或“看一下”，而不說“望看一下”。（安汝磐）

783 另外，这与妥确地运用語言中的詞也是分不开的。（現代汉語詞汇　4頁）

“妥确”是一个生造的詞，大概是妥当、妥貼的詞素“妥”和确切、精确的詞素“确”合成的。其实用“确切”就滿可以了。（韓韌林）

784 同这些空手赤拳的一部分人們，互相揪扭对打起来。（六十年的变迁　170頁）

通行的成語是“赤手空拳”，这里的“空拳赤手”是把成語顚倒了用的。不如仍改成“赤手空拳”。（潘　力）

785 馮寡妇得意忘形，信嘴雌黄…（迎春花　470頁）

“信嘴雌黄”恐怕是作者从“信口雌黄”这一成語中改編而来的。（林瑞俊）

786 这两方面綜合起来就会更好地使我們掌握詞汇的今天和将来，从而更好的为现实的語言生活服务，为現代汉語詞汇的健康发展和規范化服务。（現代汉語詞汇　2頁）

“語言生活”这个詞組不好理解，我怀疑是作者生造的。作者大概是指“語言实践”“語言的运用”等等。可以改成：“…从而更好的指导人們的語言实践，促进现代汉語詞汇的健康发展和規范化。”（韓韌林）

詞序不当

787 武則天是唐代前期和太宗、玄宗同是重要的中心人物。（文汇报　1959年12月6日6版）

这句話結构沒有組織好。改变一下詞序，使成为“武則天和太宗、玄宗一样，同是唐代前期重要的中心人物”，会更好些。（馬志荣、周志远）

788 即使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种赤裸裸的描写，我們得出的結論也只能是糟粕，而不能是别的。（文学知識　1960年1月号，7頁）

这句話第二分句的主語和謂語配錯了，成为“結論是糟粕”，但原意是“这种…描写是糟粕”。試改成：“即使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我們得出的結論也只能是：这种赤裸裸的描写也只是糟粕，而不能是别的。”（廖　达）

789 1958年和1959年連續大跃进，奠定了我国国民經济高速度按比例的发展局面。（新观察　1960年3期，3頁）

主謂結构作定語的时候，定語和中心語之間一般要加“的”。这里应把“发展”前的“的”放在“发展”后面。（年　一）

790 庄家富是同陈协中作了長时間的“对磨”后才以2比3敗北，第五局的比数是23比21。（北京晚报　1960年4月9日4版）

庄家富既然是以2比3敗北，那么他第五局的得分应該是“21”，必須把“21”跟“23”换一下位置，才符合分承的次序。（罗忠新）

791 艺术上的民族風格，是不可等閑視之的次要問題。这是一个群众性的問題。关系着一部書能否在广大群众中产生直接影响的問題。（《林海雪原》評价　64頁）

从第一句中看出，艺术上的民族风格，是次要問題；而后面两句又說它非常重要，不是次要問題。这就产生了矛盾。所以第一句应改为：“艺术上的民族风格，不是可以等閑視之的次要問題。”（今　卿）

启　事　为了减少排字、校对的錯誤，請作者协助我們尽力做到这几点：1)来稿請不要两面書写（两面打印的稿件，請寄两份）；2)引文务請查对清楚，并注明出处（不同版本的經典著作，請特別注意）；3)字迹請勿潦草。

本刊編輯部

評《古汉語概論》

山东大学中文系語言教研組

"古代汉語"是綜合性大学和师范学院中文系都設有的一門課程。在1957年整風反右后的一次教学改革中，許多学校都揭发了这門課程教学中存在着的問題；講課目的不明确，厚古薄今，几乎是普遍性的。以后各校都对这个課进行了改革。在今天看来，过去的改革还很不够，少慢差費現象还很严重，有必要进一步作彻底的革命。但是过去的教学改革和学术批判对这門課的改进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最近我們看到了朱星先生著的《古汉語概論》，这是他在天津河北师范学院講授"古代汉語"的講义。看到書名，我們很高兴，等到翻閱全書以后，却感到非常失望。这本書虽然是在1959年10月出版的，可是看来著者并沒有在过去的教学改革和学术批判中得到提高，改进教学，更不要說貫彻多快好省的精神了。所以值得提出来談談。

这本書的对象是中文系的学生和中学語文教师。著者在自序里說："大家迫切需要有一本古汉語概論，使他們知道古汉語的一般情况，和基本知識，以及如何自修提高等等，这样才可解决他們的問題。"（1頁）

著者这里提出的范圍是明确了的，那么本書就应該守着"古汉語的一般情况和基本知識"的范圍来进行講述，用明白易懂的話介紹切合实用的知識。但是著者在实际編写过程中却好用轉录材料的办法来代替自己的叙述，內容就大大超过了作者所提的范圍，离开了解决实际問題的目标。

离开了一本教科書的范圍而仍不失其为一部科学著作的話，也还是应当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的；可是这書的內容也并不符合一本科学著作的要求：全書都五十万字，直接或間接引用別人的說法却几乎占三分之一；而且著者每每不很考慮別人的說法是否都言之成理，是否彼此之間有矛盾，每每不加分析擇別地罗列在一起。有些封建性的糟粕或資产阶級学者的謬說被引用进来，也就在所难免了。固然著者也多新奇的見解，可是很少加以科学的論証，又每每前后矛盾，叫人无法理解或信从。总之，这書似乎也并非科学著作性質的。

書中除了大量引用別人的学說之外，还收入大量資料性的东西。例如："說文解字部首字表"占了近四十頁；"假借字表"占了一百二十多頁；"虛字表"占了五十頁；还有"上古韵部字表"以及許多音韵图表，等等。这些图表总起来大約又占了全書篇幅的三分之一。且不論这些东西的价值如何，作用如何，作为一本書而論，塞进去这么許多冗杂的东西有什么必要呢？只能使这本書显得臃腫不堪，不象"古汉語概論"而象古汉語百科全書了。眞的編一部古汉語百科全書倒也是有用的；可是百科全書又决不是这样的編法。

那么，我們还是大致从著者自己所提出的要求，即大致从一本教科書的要求来評論一下。

在"文字"这章里，朱星先生說："我們研究周秦汉的書面語，必須研究小篆以上的古文字。因此我們研究古汉語的文字，主要还是研究小篆以上的古文字。"（29頁）"我們讀古書，研究古汉語，要認識古文字，不可不学习說文解字，因为它基本上合乎甲骨文金文，保存了不少古义；同时不可不参考甲骨文金文来訂正說文解字。"（64頁）

这等于說，要成为古文字的專家才有讀古書的資格。难道讀古書竟要費这么多的周折！如果竟有人信以为眞，其結果不是放弃讀古書的念头，就是眞的去走这条路。可是，难道这是培养中文系的学生或中学語文教师的路嗎？

朱星先先为了"启发初学研究古文字的兴趣和方法"（74頁），特地"举一些例来証明字形与音义的关系"。（64頁）例如：

> 鬼　說文："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然甲文作畏，象人只是秃头。古有鬼方蛮族，决不是指出鬼之地。因此鬼本当是猴的象形字。猴字是形声字。是后起字。猴正象人而头較秃，頁首等字都有长发，是人头，⊗象猴头沒有发。鬼加酉声为醜，正是指猴又象人又不象人，极醜。易經中有"載鬼一車"，因猴羣很多，所以古代人吃猴，故猎得一車。然則鬼方实指南方出猴之地。鬼神的鬼是后起义。（72頁）

这样能启发什么兴趣和方法呢？难道这样才算搞淸楚了字形，才在音义上不出錯了嗎？把"載鬼一車"說成是

* 朱星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10月。

古人吃猴子捉猴子，也恐怕很难叫人信服。

在举例中，朱星先生說，"'周'字甲文…象田亩形。…周疇音同。"(66頁)在解釋"用"字时又說：

> 周实在也象钟形。周钟二字双声，上古音都屬端紐，象打钟声。商字也是象钟，…商周时銅器极被尊重，所以用钟为国号。郭沫若先生考周'象田中有种植之形'，周田上古是双声。可能是二詞合一形，或說'一字歧出'。(69—70頁)

同一"周"字时而說它象田亩形，时而說它象鐘形；說它象田亩形时，以周疇音同，周田双声为証；說它象鐘形时，以周鐘双声为証。举例的用意是要証明字形与意义的关系，結果却告訴別人字形与意义的关系是无定的，可以随便假設，这怎能启示初学以正确的方法呢？

"音韵"部分是書中篇幅最多的一章，計二百八十七頁。朱星先生說："我們学习这一章可能有些困难，不过稍加鑽研是可以解决的。方法是先学习了語音常識或語言学概論，然后随着本編同时讀一些基本書，如講上古音时，可檢查一下詩經的押韵字，就对古韵分部的道理明白了。学习中古音时，可把广韵以及韵鏡切韵指掌图等書查看一下也就明白了。"(5頁)著者把《詩經》《广韵》《韵鏡》和《切韵指掌图》都算作基本書，要学习的人去讀，这是对中文系学生或中学語文教师不切实际的要求。但是問題还不止此。从这部分的叙述来看，著者只是拉杂地抄录了各家对音韵問題的一些說法，不时凑上一些自己的臆說，使問題复杂化、神秘化，結果只能把学生引入迷宮。

試以"上古音的韵部和声調"为例。著者在这里講了四个小題："(一)古音韵部研究和分部經过"(131—154頁)，"(二)上古音的声調及入声阴声字的韵尾問題"(155—171頁)，"(三)詩經的押韵字和說文形声字的分部法"(172—176頁)，"(四)上古音的韵部拟音"(176—179頁)；末了附了个"上古韵部字表"。著者对这四个小題是怎样来說明的呢？这里无法詳細評介，只举几个例子談談：

比如，朱星先生在第一小題里列举了某人分上古音为若干韵部，某部到了某人又分为若干部，从吳棫一直談到章太炎和黃侃，几乎包罗了历史上所有古音学家的分部說法。其中講黃侃分二十八部的一段，就花了七頁，把各家对黃氏的評論都抄集了来。可是終究沒有明白說出上古音到底該分多少韵部，有什么根据，而只在后面所附的"上古韵部字表"中說，"本表主要根据夏炘二十二部古韵表，因为这个分部比較切实可靠"。(179頁)那么，为什么不專对夏氏的二十二部作重点講述，讓人对夏氏的分部有个明确的概念，为什么不說一說这个分部的根据，讓人明白它是怎样的"切实可靠"呢？

对上古音的声調，著者在上述第二小題中也罗列了八种說法，每一种說法主要是抄录原文或成說，比如在"有平上入三声"下面除了开头十个字以外，整段抄自段玉裁《六書音韵表》中的"古四声說"，至于原文里有些話到底是什么內容，著者不加解釋，讓你自己去摸索。

尽管花了这么多的篇幅，却終于沒有說清楚上古声調的情况和基本知識。著者說，"我也主張五声說(王国維的——本文作者)有道理"。(163頁)王氏的五声說是什么呢？他本人說得很清楚："古音有五声：阳类一，与阴类之平上去入四是也。說以世俗之語，則平声有二，上去入各一，是为五声。"王氏是根据他的見解来立說的，而朱星先生却是以現在有的方言是有五个声調来証明五声說有道理。他說"今方言中还有五声，河北省也有。"(163頁)又說：

> 五声說实际上就是四声說，不过把阳声的平声加了一个补充說明：說阳声的平声沒有上去入；阳声的平声与阴声的平声可能調值有些不同，因为后面挂上了鼻音，音較上扬，因此立了五声說。(162—163頁)

試問：王氏的五声可以同今方言的五声相比拟嗎？王氏五声說实际就是四声說嗎？王氏分別阳、阴是因为阳声的平"音較上揚"嗎？

更使人胡塗的是朱星先生既主張五声說，而在前面談上古音的入声問題时却又提出"二声三調"說，說是"为了科学的分析，最好分析为'二声三調'"。(153頁)作者为"二声三調"列了一个表：(154頁)

<table>
<tr><td rowspan="2">新声調說</td><td>二声</td><td>阴
阳 平(平是广义名，举平以賅上去)</td><td>入</td><td>区别主要是音长短，强弱</td></tr>
<tr><td>三調</td><td>阴
阳 平上去</td><td></td><td>区别主要在音高低</td></tr>
</table>

讀者要問："五声說"(不論是王国維的五声說，或是朱先生所解釋的那个五声說)跟"二声三調"說怎样能够調和起来呢？沒有解釋。而复习題里却要問学生："王国維的五声說的理論根据是什么？""上古音究竟有多少声調？有什么理論根据？"

我們認为就这門課来說，实在不必在这些問題上糾纏不清，既要提出，就該有一个簡單清楚的合乎科学的解釋，硬把自己也沒有搞清楚的东西摆給学生是沒有任何好处的。

在音韵部分还大談等韵，在練习題里要学生"把李清照醉花阴一詞的每个字注明清浊音、五音(喉牙舌齿唇)、及四等(宋元学派的)、(以上可查韵鏡及切韵指

掌图)四呼(开齐合撮)。"象这种习題，眞不知道其目的何在。学了这些，对理解古汉語有什么帮助，对中学語文教学有什么帮助，恐怕朱先生也很难回答。

照著者的这种講述方法，我們相信学生在学完这章以后，是連反切的用法也不会明白的。这是严重的少慢差費的教学。

应当注意的是，本書各部分的講述除了照引原文之外，几乎全部都是采用这种方式。学生有什么样的基础，怎样用"启发式"，怎样"由近及远"，怎样"由淺入深"等等都不是著者所考慮的。著者并不是在介紹"必須具备的""一些常識"，(2—3頁)而是随自己兴之所至或力所能及来安排章节进行講述的。

这里还有个比較大的問題需要特别提出来談談：

朱星先生是否認上古音有 -p -t -k 尾的，也否認中古时期北方語音中有 -p -t -k 尾。

本来，語音是时时在发展演变着的，上古音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事实而存在的，在它以后还有中古音、近古音、現代音。我們如果根据一些材料假定上古音曾有某种情况，就不仅一定要檢驗它能不能同我們所掌握的材料相合，而且一定要考慮考慮这种假定情况在上古以前可能是怎样的(要是有条件供我們考慮的話)，一定也要考慮考慮这种假定情况在中古、近古、現代是怎样的。我們如果根据一些材料对中古音某种情况有所假定，原則上也应当这样考慮考慮。那也就是說，我們每作一种假定，不仅要用該时期材料去檢驗它，而且要把这一假定放到历史演变里去檢驗，看一看它的来龙去脉，看一看在历史演变中，是与各方面的情况格格不入呢，还是若合符节。这点是很重要的。后一时期的語音情况，对于前一时期的語音假定，是一种根据，同时也是一种制約。

一些人認为古音是有 -p -t -k 尾的。这种假定可以解釋詩經押韵的现象，可以解釋文字諧声的现象，它同押韵和諧声現象沒有冲突。并且它也可以解釋中古音(切韵音)和現代方言(如广州音)中有 -p -t -k 的这一語音現象。上古音有-p-t-k，中古音的-p-t-k就是上古音的繼承(虽然不一定恰恰是嫡系的繼承)。上古音与中古音之間的严密的語音对应說明了其間的繼承性。

朱星先生是怎样来否定上古音有 -p -t -k 尾的呢？他說：

> 入声字在上古音系的詩經楚辞中，多与阴声通押，少与阳声通押，緝叶二部独立，不与他入声字押或不与侵覃等押，是由于有独自的元音，并非收声p。足証上古入声沒有p t k 收声，至少詩經楚辞中并沒有反映这一事实。(164頁)

这个假定怎样用来解釋中古音和現代广州方言有 -p -t -k 尾这一語音現象呢？朱星先生說：

> 广韵所收的方言面积較詩經加广了，它把吳音閩粵音也收入了。例如閉口韵以及入声字三个韵尾 p t k 与 m n ŋ 相配就是閩粵音。广韵是尽量求分的韵书，因此尽管当时'北京'方言中已沒有入声，而广韵是采用閩粵音以求其分，連当时吳音的入声他也不要(因不如閩粵音分析細)，北方方言中沒有入声卽分不出入声他更不考慮了。因此广韵的分韵較多較細，只是由于所收方言較广較多，并不是全从上古音分化出来的。(396—397頁)

> 入声字之收声并非周秦上古詩經等韵文和形声字的音系，而是广州方言的音系。它可能很古就有，方言是氏族部落分化的現象。(165頁)

原来支持朱星先生否認上古音、中古音有-p -t -k 尾这个假定的是另一个假定。这个假定直截了当地說就是語音从古到今是沒有什么变化的。

虽然朱星先生在旁的一些地方也承認語音是要变的，"一般情况，詞汇变得最快，最多；語音次之，語法又次之。"(10—11頁)可是到了討論具体問題时，却又用現代的地理因素来解釋古代的語音現象，在原則上就取消了語音的历史演变。

朱星先生又認为"方言是成系統的，因此有极强的稳固性。"(398頁)因此"方言間个别的少量的諧音影响是肯定的，至于音系的大变动是不容易的，(数万年造成的方言音系不会在短短的二三千年中变了另一音系)而方言的整个被消灭反倒比較容易。"(399頁)

大家知道，現代北方方言里沒有 -p -t -k 尾，乃至絕大多数北方方言不再有独立的入声調类，这是語音演变的結果：由原有 -p -t -k 尾变为沒有 -p -t -k 尾，进一步演变为丧失了入声这一調类。但是朱星先生否認这个历史演变。

旣然語音是沒有什么变化的，所以朱星先生就不妨以現代方言的調值来說明古代方言的調值。比如他說，"如果肯定广韵入声跟阳声相配，是采用粵語音，則入声調值当如今广州音讀法"，"齐梁时极講究清浊，而四声都分清浊，最整齐的推吳語(上海和溫州)。如果陸法言研究音理，四声調值似宜以吳語为主。"(224—225頁)

旣然古今語音是沒有什么变化的，而語法的变化又次于語音，那么語法自然更沒有什么变化了。这样我們还講什么語言发展的內部規律呢？

朱星先生的这些見解都是我們不能同意的，在基本观点上就不能同意。

第四章是"詞汇"。在"詞汇的分析"一节里著者提出詞汇学的主要任务是"对詞汇的意义音节构造形态

等加以分析”，(432頁)于是就立出許多名目。比如：自然音詞、象物声詞、假定音詞、类推音詞，广义詞、狹义詞，异义詞，單一的混合詞、并立的复合詞，相屬的复合詞、加綴的詞根詞，原生詞汇和派生詞汇(母詞、子詞)、方言詞汇和普通話詞汇、專門特殊詞汇和一般常用詞汇、外来語詞汇和本国語詞汇，此外还有所謂古今雅俗詞、謙詞、忌詞，等等。名目不下四五十个。这种“分析”是为了什么，有什么作用，誰也不知道。

关于广义詞狹义詞，著者举“人、花、魚、美”和“妇、嬰、菊、杏”为例，(438頁)說前者是广义詞，后者是狹义詞，是“从比較而来”的。既然广义狹义是比較而来的，是相对的，那么一个詞的屬于广义詞或狹义詞就是无定的，非两下对举不可了。这种“分析”实在毫无意义。对褒义詞著者举“晴”“酒”等为例，(438頁)不加解釋，叫人无法理解。在举例中，著者把“讀書”“东归”“不良”“至善”等等都列为詞(441頁)，把“日注(茶名)”“吉日”等等以及来自匈奴的“日逐王”都列为“日”的派生詞。(445—446頁)我們相信朱星先生不是不知道“日逐王”是譯名，因为在“日逐王”下注明了“見汉書”，但是还要把它算作“日”的派生詞。

作者还用了三頁篇幅来抄«康熙字典»和«辭源»，其中有“丁丁”(伐木声)“丁壮”“丁卯集”(書名)“丁宝楨”“丁汝昌”，等等，說“丁字中有这些詞汇”。(419—422頁)

还有奇特的是在原生詞派生詞下突然又列出原生字派生字一項，造出“初生”“再生”“再再生”“再再再生”“再再再再生”等名目。認为“暮”就是“屮”的“再再再再生”字。在“專門特殊詞汇”下，作者不厌其煩地抄了九十九个«史記·天官書»中的詞，又从“光緒十七年陸九如編：‘应酬汇編’”中抄了十一行凡單，說“其中有些是雅名，如玉容是肥皂，絲桐是琴，手談是棋子，苏注是錫壶…”。(450—451頁)著者在这里已經完全忘記了他的任务。

朱星先生非常慷慨地讓出篇幅来抄这些东西，而对一些眞正重要的基本概念却或是不談，或是越說越乱。

著者說：“假借字即一字多义，…(一字多义实包括几个詞，但只用一个字，所以說是无形的詞汇扩充。)”(471頁)这里似乎是說假借是用同一个字标記語言中的不同的詞。但是書上又說：“至于干干名、姓、星名等的丁字还是一个詞，除非他的声韵调变了(用拼音文字写必然字形也不同)，否則它还是一个詞，我們不可由于它一个字兼有六个意义就說它有六个詞，不管它六个意义中間有的是毫不相关的假借，有的是意义相連的引申，总之还是一个詞，否則編字典詞書将不胜其繁。”(423頁)这里著者又坚决主張同一个字的几种假借用法应該算作同一个詞的几个意义了。

朱星先生如果省却一些抄录工夫，把詞、詞素、詞組和字分分清，把單純詞、合成詞分分清，这对学生和讀者倒是更有用些。要是連这些概念都很模糊，那么，記得本書的許多名目，知道“玉容”是肥皂的“雅名”等等有什么益处，能解决什么問題呢？

这一章里还附有“假借字表”，占了一百二十七頁，比叙述部分多出一倍。著者說：“讀周秦两汉以上書，要通曉其訓詁詞义，重点在解决假借字。我們可以說：不懂假借字就不能通訓詁讀古書。不懂假借字，也不能研究古汉語詞汇。研究文言虛字的关鍵，其实也在假借字。因为古書中用了极多假借字”。(471頁)

朱星先生的这些說法其实是夸大了閱讀古書的困难。对于学生，我們是要帮助他們扫除閱讀古書的障碍，千万不可故神其說，使他們望而生畏。古書里有沒有假借字呢，当然有，卽使是用現代汉語写的書里也有；但是通常用慣了的，不去追究本源也照常可以理解它的意义，而有些在古書里偶尔見到的，則不必記，也无法一一地記。

著者把假借字說得非常严重，但是对于假借的条例却并沒有說明，对怎样利用工具書也沒有提到，只是列出九百九十五字，要学生去讀，据說“讀了这些字例，可通悟古書假借的条例，也可悟声音轉变的条例”。(473頁)著者在字表里沒有解釋，而且連反切也沒有注出，这讓讀者怎样去“悟”呢？

这一章的練习題有：“分析尔雅十八篇的內容和訓詁特点”，“查佩文韵府的風字清字下各詞例，分析其用法”，“查經籍纂詁的性、礼二字的各种解釋而加以批判地总結”，等等。著者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跟同学为难的。

下面我們再看看“第五章　語法(句讀)修辞”。

語法部分也都是轉录成說，比如講复合句一段，九十多行中加引号的引文占三分之二；其中引«孟子»一段，八行；引«馬氏文通»一段，三十一行。

詞类一段的开头，举了«馬氏文通»的九类，接着就引薛傳均、曾国藩、楊树达、王力对虛字实字的說法，最后加上一句“現在也分这九类”，却沒有說出分九类的理由。在本章前面，著者說“甲骨文中的詞类可分为十类”，“金文在語法上除甲骨文中的十类外，还有語气詞，如‘敬哉’(僕儿鐘)，但极少。”(599—600頁)为什么要有十类、十一类、九类的分別，書上毫无交代。

在講名詞时，著者說：“后綴現代汉語有头、子、儿等，古汉語有时在人名、書名、国名、抽象名詞后加

'者'，我們不能認为是名詞后綴，但有标明是名詞的作用，如：'南冥者，天池也；齐諧者，志怪者也。'庄子逍遙游'至于信者，国士无双。'(史記·淮阴侯列傳)"(615頁)，而在693頁又說："史記項羽本紀：'項羽者，下相人也。''者'是重复指代項羽。語譯可說是'这个人'，'項羽者'即'項羽这个人'，这样，'者'字才有个着落。"上面三个例子中的"者"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作两种解釋？不明白。

因为著者自己幷沒有眞正考虑过所講的东西，所以就常常同一件事前后說法分歧，有时还引用过时的旧說，如系詞的产生时代就是一个例子。

朱星先生还講到汉語的質变問題。書中說："元曲和白話小說跟現代汉語只是詞汇上有些不同，在語法上看不到質变。"(608頁)但接着在下一頁又說："宋元后的老白話和今日受欧洲語言影响的書面的新白話也可說是一种質变，但在語法上变化沒有詞汇的大。"讀者要問：这里所說的"現代汉語"跟所謂"新白話"是不是一个东西，如果是一回事，那么后文所称的"質变"該怎样来解釋，是不是仅仅由于"詞汇上有些不同"就可以造成語言的質变(朱先生說"在語法上看不到質变")？或者朱星先生的意見是，他所說的"現代汉語"和"新白話"是两回事，"新白話"同"老白話"相比，是起了質变的，这个質变是受欧洲語言影响而造成的。但这也是我們所不能理解的。

著者对質变的認識是："发展中的变化有小变大变，質变一般指大的变化，滴滴点点枝枝节节表面的不是主要方面的一些小变是量变，不算質变。"(609頁)照这个說法：質变＝大变，量变＝小变，質变是主要方面的变化，量变是表面的非主要方面的变化。

我們相信朱星先生幷不是有意用大变小变来代替質变量变，幷不是想要修改馬克思主义，但是这种解釋出在一本高等学校的教材里，是非常不应該的。

著者在本节开头說："我們在古汉語里講修辞，为了对古汉語教学有帮助，不再作一般的分析，而偏重在积极的修辞，且較为主要的，如押韵用典对偶选字等。"(762頁)什么叫"一般的分析"，为什么要"偏重在积极的修辞"，都无从推測。为什么积极修辞中主要的应該是"押韵用典对偶选字等"，著者也沒有說出理由。

就以本書的十二条修辞"主要法則"的內容来看，也是非常夹杂，毫无鉴别的。比如四声八病之說，梁章鉅《制义丛話》中引的一段毫无內容的八股調子，都被抄引进来，眞不知道用意何在。

"文体"是本書的最后一章。

在第一节里，著者引了許多甲骨卜辞和金文銘辞等等来看它們的文体。这有什么必要？著者說："文体經周秦的酝釀，到汉后就分支衍化，种中分类，类中分体，体中分式，不下数百千种。汉語的丰富多采，也表現在文体上。"(799頁)我們不懂汉語的文体怎么会有数百千种之多？少数几个統治阶級的学者文人所任意划分的关于文体的一些煩瑣的說法(也不会多到数百千种)，对汉語的丰富多采会发生什么作用？

在第二节里，从毛詩序起一直到張相的《古今文綜》止，所有古今有关于文体分类的各种夹杂的不科学的說法差不多都被著者抄了进去。試問，这种东西对于古汉語的教学究竟有什么帮助？即使要講一点有关文体的分类問題，也只須略略提一提就行，根本用不到这样的大量轉录。这些材料，除了增加学者学习上的困难以外，实在沒有什么其他理由可說。

在第三节里，著者又引述了許多有关風格的陈腐的說法。語言的風格原是通过語言的各种材料来体現的，原是可以掌握的具体的东西。但是著者采用的却尽是一些象阳剛阴柔之类的虛无縹渺的不可捉摸的旧說。这种旧說，对于我們教学古汉語有什么好处？我們想，除了使学者愈学愈糊塗之外，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在第四节里，著者詳細引述了旧詩、对联、詞曲、辞賦、駢文四六、古文等的作法，認为"旧文体是古汉語的一个构成部分，如果研究古汉語，就必須研究旧文体；教学古典文学的，也必須講些旧文体的沿革作用和它的作法。"(829頁)著者还說"我們研究古汉語的文体，除了一般的文体作法(如賦的作法、律詩的作法、塡詞的方法以及傳状的作法、墓志銘的作法、祭文的作法、駢体文的作法、对联的作法，我們都要懂，虽然我們不再准备做旧的詩詞歌賦。因为我們不懂得它的作法格式，就不能完全認識古汉語的实际情况。…"(810—811頁)要"完全認識古汉語的实际情况"就得懂傳状、墓志、祭文等等的作法，这是多么奇怪的意見。

从上面所举的一些例子，已經可以看出这本五十万字的厚書大約都是一些什么內容了。

造成篇幅龐大的另一原因是有的章节根本沒有內容，却要硬写凑数。这里可以举"古汉語的原始情况"一段为例，在这一段里，著者写到第五行就說"因为沒有可靠的材料，我們只能这样瞎猜猜"(12頁)。既然是"瞎猜猜"又何必写上去呢。以下又介紹章太炎、梁启超、沈步洲、潘尊行、拉古不里、安特生、戴遂良、高本汉、西蒙华德(本書他处作西門华德——本文作者)等人的說法，不过插上些"这是穿凿附会之論"，"这些說法都是唯心的推測，沒有足够的証据，且无关于古汉語的原始情况"，"这些都不大靠得住"一类的按語。这里举的某些

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謬說根本不必向学生和讀者介紹，既然提出，就应該严肃批判，但著者都是輕描淡写地带了过去。对安特生等的謬論，明知"无关于古汉語的原始情况"，却偏要引用。

在本書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即說了一段之后，忽然加上几句，把上面講的一笔勾銷。用这种方式編講义写書实在是人力物力的浪費。

著者尽力堆积資料，看来是征引繁富，但是对一些眞正的常識和基本概念却沒有說清楚。

著者說："我們研究科学要实事求是，旣不可瞎吹牛，也不可盲从。"（121頁）这样的精神是对的，可惜著者并沒有貫徹到实踐中去。

在音韵部分，朱星先生主張改"零声母"为"虛声母"。他說"說零声母或是由于国际音标喉塞音或作一圈的符号而得名，其实不如称虛声母好。"（252頁）著者認为零声母是喉塞音作声母，又認为喉塞音国际音标作一圈。这都是对起碼知識的誤解，却建議更改通行的术語。

著者贊成章太炎的"語言緣起說"，把資产阶級唯心主义的說法說成是合乎唯物辯証法的（407頁）；在文字的发展問題上，在理論上等于把形体看成是可以直接表示概念的（30—31頁）；在語言的发展問題上把質变量变解釋成大变小变；这些都是与馬克思主义的原則不符的。

这本書里介紹了好些消极的文学作品。在語法部分举例有："你死了，我做和尙"（652頁），"眼泪却象比旧年少了些"（641頁），"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629頁），等等。虽然这些例句也出于轉录别人的旧著，但是我們就不能另外选些思想性較好的例句嗎？

著者編写的态度是不严肃的，这也表現在引文和文風上。在引文方面，比如："所以周官：'保氏八岁入小学，十六岁入太学，称国子。'"（33頁）"說六書之名最早見于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書。'"（48頁）这里的引文为《周礼》原文所无。著者引录原文有时随意更改标点，造成錯誤。比如297頁引罗常培《汉語音韵学导論》中的一段，把原文中的"按字汇正字通俱音辛，誤。辛在眞韵齐齿音也"，誤标点为"按字汇、正字通：心俱音辛，誤辛在眞韵，齐齿音也。"

本書好些文句使人难以索解，比如：

> 如歲語灰部死 çi 咍部辞 adzi 模部五 lna 侯部主 tso 等都沒有收声。（167頁）

> 修辞比語法好似更加利用本国語言的民族特色来发揮語言的美感。（764頁）

著者在211頁說："讀者要查某字在中古广韵的音值，可逕查丁声树先生古今字音对照手册較为方便。"丁先生这本手册哪有什么"广韵的音值"呢？（只有反切）

至如書中把作《僮約》的王褒当作六朝人（24頁），把徐鉉当作唐朝人（116頁），把《汉魏百三名家集》写作"三百名家集"（191頁），也許是笔誤，也許是誤排，但在本書中只算是微不足道的錯誤，就不必多举了。

最后，我們总起来說，这本書在观点上有很多錯誤，內容是厚古薄今脫离实际的，編写态度很不严肃。这本書用作教材，必然造成少慢差費，这同总路綫的精神是背道而馳的。

过去我們在語言教学中普遍地存在着脫离政治的傾向，語言課之不受同学欢迎，这应該是原因之一。

我們希望朱星先生在教学革命中認眞檢查一下这本書，进行徹底的修改。

（上接288頁）

詞（如这、那）的語法特征，在它是絕大部分不能具备的，列入这一类，理論上也只有历史的根据。这的确是問題。但是也不是不能解决的問題。人們的語感問題，是可以随着学习的深入而改变的；語感对于划分詞类，虽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能起决定的作用。至于它和一般指代表現得不一样，那也不足为奇；因为"代詞中所保留的語言历史遺迹最多，它們順利无阻地抗拒着整个語言創造的合理的統一的趋势"。①現代汉語中"所"的不受"这、那"一类字眼儿語法形式上的"合理的統一"就正是这种現象。况且它只是作为在宾位的指示代詞的一种"信号"，而現代語用指示代詞"它"作語法形式的也有的是（如"这情况我了解'它'"。这"它"虽跟"所"格式不同，但性質也是一样）。因此，我們拟仍采用"代詞說"。——如果放在所謂的"助詞"里头，那它和别的所謂助詞，如"了""着""們"之类，倒是眞正地、从內容到形式、从历史到現代、完全地、压根儿地不相干了。

因此，我們拟把"所"字和"的（者）""其"三字都列为"特种指示代名詞"："的（者）"是以特种介詞指代中心詞的（因为"的（之）"所介来的"定語"，其"中心詞"省略了，"的"就起而代之）。"其""所"都是古汉語的遺留。"其"是承前指代整个的"定語"的（所以常在"領位"或子句中承前的"主語"）；而"所"就是在定語中或在被动句中專門指代"宾語"的。②在現代汉語，除成語和熟語格式外，"其"常改用"它的"或"它"，而"所"在部分的場合中就是"可有可无"的了。

---

① 参謝尔巴《論俄語詞类》，10頁。

② "所"字在"定語"中的用法，总結在《汉語語法教材》第二編104頁；在"被动句"中的用法，例詳同书834頁，理論則見同书的第三編。